

# 刊首寄语

吴潮海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又是一年杏花雨，甘苦谁知方志人？

好在开明时代开明人，如今，从上到下对地方志都非常重视。早在 2011 年，身为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就强调：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领导工作水平。

今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又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杭州市委一领导，到中宣部履新前，对杭州市志办负责人说：我敬畏杭州历史、敬畏杭州人民、敬畏杭州史官。

所有这些对我们史志工作者来说，既是鼓舞，又是鞭策。

杜甫在《偶题》中吟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千古事”是说写文章乃经邦济世之大业，在百转千回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承担着不可忽视的承启作用。文章如此，历来为文中之精粹、经典的志书岂非会有更高的期冀？身置中华民族兴起的伟大时代，有幸成为关乎“千古事”的史志工作者，要想做到不负盛名，就要切实做到“寸心知”，要有扎硬寨、打硬仗的精神，要有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态度，做到淡泊名利，铁心修志。

由于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加之编辑部上下齐心协力，市志（丛书）编辑部前些年取得了诸多成绩，赢得了诸多荣誉，包括《义乌方志》也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及社会的肯定，尤其是最近几期亮点频频，本期也如此，市政协原主席骆族法同志对旅游开发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国社科院的张宪博、杨海英也提供了有份量的文章。《明末东阳“许都之乱”探究》题目上看是写东阳的，其实不少是写义乌的；《唐将书帖》收集的大多是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南兵将士书信，包括义乌兵吴惟忠、王必迪，通过他们的亲历亲闻，复原了四百多年前这场战争的珍贵场景，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杨海英为我们提供的史料是鲜为人知的；从丝绸之路发祥地到丝路新起点，则是读志用志的一个典型案例，已引起省志办主要领导的浓厚兴趣。

由此可见，无论是身处喧嚣城市，还是身在清静乡野，如欲感受义乌古老的文明，领略义乌 2200 多年的繁衰沧桑，不妨读一读我们《义乌方志》。



2014 年第 1 期 (总第 56 期)

主 办：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辑：义乌市志编辑部  
主 编：吴潮海  
责 编：孙清土

地 址：义乌市南门街 213 号  
市政府行政二号楼

电 话：0579-85520550

传 真：0579-85521181

E-mail:

ywfz2014@163.com

邮 编：322000

# 目 录

## CONTENTS

### 刊首寄语

### 特 载

如何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二轮续志编纂  
..... 潘捷军 4

### 专题研究

历史的嬗变  
——从丝绸发祥地到丝路新起点  
..... 华 轲 吴潮海 10

“义乌兵”个体经商史料的发现及背景分析  
——“义乌兵”是如何成为义乌商业文化之源头的  
..... 金哲为 15

义乌明清建筑的装修与装饰 ..... 黄美燕 20

### 史料稽考

明末东阳“许都之乱”探究 ..... 张宪博 35

书《唐将书帖》后 ..... 杨海英 42

### 史海钩沉

明朝御倭援朝史纵横谈 ..... 丁颖生 55

回忆抗战时期的倍磊大成小学 .....	朱锦相	58
莲塘村小百货老加工户的回忆 .....	刘俊义 整理	60
义乌以数字命名过的学校钩沉 .....	金佩庆 整理	62

## 乌伤人物

尹庚的坎坷人生 .....	楼益圣	63
楼杏春印象 .....	骆华桂	65
王培根与“包产到户” .....	施章岳	67
王国良——民国时期研究长城第一人 .....	王稼秀	70

## 风物乡情

后宅风景旅游开发前景看好 ——净居寺、西岗寺、乌龙殿一日游有感 .....	骆族法	72
走下神坛的佛教（外两篇） .....	吴潮海	74
佛堂老城区内的“塘” .....	李邦林	78
商城红绿灯的变迁 .....	蒋英富 朱履生	79
殷殷嘱托寄厚望 .....	毅 志	80

## 简 讯

..... 80

市志标识设计：王建军  
封面摄影、设计：孙清土

### 声明：

1. 《义乌方志》所有内容包括图照，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转载和传播。

2.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授权本刊并包括本刊关联的出版物网站，本刊有权对稿件进行删节、修改；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声明。

3. 所有稿件均为署名的著作权人独创，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或其它权利；如有侵犯，由稿件署名者负责。

4. 《义乌方志》中所登载的图文稿件，均系出于学术交流和传递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本刊必然赞同其观点。

来稿请用电子文稿，并注明作者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

# 如何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二轮续志编纂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潘捷军

(2014年3月5日)

去年11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国当前和今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各领域中的重大改革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也是在对改革开放35年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的发展完善。由于目前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二轮修志工作,主要也是以改革开放35年为记述对象,因此,运用《决定》精神来指导二轮续志编纂,对全国地方志系统意义重大。今天,结合金华及各县(市、区)二轮修志的编纂实际工作,就如何学习贯彻《决定》和省方志办下发的《意见》,我谈几点体会和建议,谨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等两种形式,这是2006年国务院针对全国地方志工作和年鉴编纂工作的新情况作出的新部署。近年来,金华市及所属各县(市、区)方志机构在做好二轮续志编纂工作的同时,年鉴编纂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大部分县(市、区)续志编纂工作完成后,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年鉴编纂等方面,从而走在了全省前列。为此朝明主任要我同时也讲讲年鉴编纂工作,但对这块工作我不太熟悉,还需要向大家学习请教,我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讲。

## 一、如何在认识二轮修志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把握二轮续志的编纂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开展了两轮大规模的修志工作。第一轮各地一般从上世纪80年代始至上世纪末,普遍以编纂“通志”为主(当然严格意义上的“通志”一般是指贯通古今的省志,但历史和现实中均有市县级志书以此相称);第二轮一般为2001年至2020年,普遍以编纂续修断代志为主(相对于“通志”而言,“续志”一般是指以接续前志下限所“续修”的“断代志”),主要是记述

各地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历史(具体上下时限各地又有所不同)。相应需要把握好几个问题:

### (一)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志书有不同的记述重点

1.不同时期的志书有不同的记述重点。“不同时期”包括编纂时间不同(如我省民国时曾两修通志,而今又再修通志)、记述的历史时期不同(如一轮通志普遍涉及本地自古至今的数千年历史,而二轮续志则重点聚焦改革开放来数十年的历史),显然,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相应记述重点会不断发生变化。

### 2.不同类型的志书同样有不同的记述重点。

例如,横排门类、横不缺项是志书编纂的首要原则,通志编纂尤应注重这一原则。古人编通志时便曾说过:“志也者,志之天文,志之地理,志人事之成败,志世数之沿革,下及一民、一物、一草木、昆虫、鸟兽、鱼鳖,纤细必志。”<sup>①</sup>可见其涉及范围之广、记述事物之细的程度,这也是通志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但即便门类再多,涉及时限再长,篇幅规模再宏大浩繁,体量上总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无休止地洋洋洒洒,无限制地面面俱到,这种限制必然要求编者在记述重点上作出取舍选择。

而相对于通志,续志记述时间短暂,上下限均距现实较近,主题突出,主线清晰,其记述重点显然更好选择,至少不需太多考虑“略古”(或“明古”)的问题,主要侧重点在于如何“详今”,这也是其不同于通志的比较优势。但它仍然也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 (二)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志书编纂有不同的指导思想(或不同侧重点)

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志书有不同的记述重点,因此其指导思想显然有所不同。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志书编纂,指导思想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如通志往往涉及数千年历史,由于各历史时期情况千差万别,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中指组在《地方志书质量

规定》中，特别强调必须注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sup>②</sup>对通志编纂而言，我认为特别要注重用唯物史观指导编纂工作，对此我曾作过专门分析，因时间关系，今天不作详述。

那么，如何把握二轮续志的指导思想和编纂主线呢？如果说，一轮通志以记述“历史”为主（或需兼顾历史与现状），那么二轮续志无疑应以记述“现状”为重，这个“现状”对二轮续志而言就是改革开放。而且从形式上看，续志记述时间相对较短，所述历史关系也不像通志那样复杂，这就更有利于集中主题，突显主线。而作为“年度资料性文献”的年鉴更应如此。因此，二轮续志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地位，就应突显改革开放这条主线。这一点中指组在《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同样作了明确要求：“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sup>③</sup>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就二轮修志工作而言，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志书编纂，指导思想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必须把握好的关系是：一是承认不同志书编纂指导思想有不同的侧重点，是对不同时期（如数千年历史）、不同类型志书（如通志、续志）错综复杂、千差万别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反映。二是必须坚持两轮修志指导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一以贯之，即它们是同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不同侧重点，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不容否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三是特别要看到，这种分析更强调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即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不会中止，都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完善。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今后三轮修志以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还会用日益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指导不断发展的修志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思维和改革理念。

### （三）强调改革开放为二轮续志编纂主线的现实意义

今天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问题，还在于：一般认为，志书特点、地域特色、时代特征是志书编纂过程中应把握好的三个重点，应处理好的三方面关系。其中志书特点（即编纂原则和规律）是主体主干，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则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从两轮修志实践看，各地普遍较为注重“志书特点”，当然也会关注“地域特色”，但如何把握好“时代特征”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经过长期探索和一轮实践，在志书编纂方面，全国方志界已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固化模式，如纲目框架大同小异，遵循原则基本一致，文字语言风格更为统一规范，这同时也会使其形式较为呆板单调，容易令人枯燥乏味，无形会束缚志书的生动性创造性，因而编纂工作难有创新突破。例如，在二轮续志审稿时，我们就曾遇到过，有的地方、有的编者以强调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等编纂规律的特殊性为由，满足于在传统框架里按部就班对号入座，不愿越雷池一步，更不愿在续志中化大力气思考和突显改革开放这个主动脉和主旋律。这样，志书“横排门类”等传统规律反而成了一个无形框架，编纂者的创造创新意识不同程度地被约束在这个框框里，把各门类当成简单的“筐”，把各单位报送的材料不加选择、不分重点，机械呆板地按门类要求往里“装”，最终被动被形式牵着鼻子走。这样的志书容易支离破碎，难显时代特征，同时也缺乏特色活力。因此，如何既重视“横排门类”等编纂规律的约束，但又不能被它“框”住，这是当前需要特别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对续志以记述改革开放为重点有所认识，志书中也有体现，但认识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相应的记述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横不关联，纵不成线，或顾此失彼，轻重失当：一是内容的公式化和简单的同质化，忽视事物的多层面、不同阶段的异质性和结果的差异性；二是粗线条，大而化之，将改革开放的复杂过程简单化，将深层次的改革记述表面化；三是单体化记述，忽视改革开放是一个密切联系的系统工程，偏重单线因果关系，缺乏整体性、结构性；四是偏重事实的简单叙述和资料罗列，忽视对发展规律的总结提炼。<sup>④</sup>

如有编者曾敏锐地指出：“在第二轮修志中，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轻重有别。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记述浓墨重彩，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记述多有缺失、淡化、弱视，甚至忽略不记。显然，这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sup>⑤</sup>因此，即使以改革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就志书编纂而言，仍然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内容，防止倚重倚轻，顾此失彼。

同样，有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发生了以下几个显著变化：一是作者由个人著述走向了众手成鉴；二是记述内容由单一片面走向全面系统；三是著述风格由异彩纷呈走向平铺直叙。<sup>⑥</sup>但相应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地方综合年鉴的编修主要依靠政府主办、部门协办、地方志部门统筹成书，基本上在‘体制内’运行。这种编修机制保证了各地

年鉴的顺利发展，但也催生了四平八稳的‘懒人年鉴’，使年鉴看起来千鉴一面，少有活力。”“近年来，由于过分强调去空话套话，年鉴的综述、概况等综合性条目有越编越少之势，使不少年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削弱了年鉴资政、存史功能，也不利于年鉴作为修志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的定位。”并建议要“进一步增强专记、文献、调查报告、相关链接、课题论文等体裁入志的力度，必要时也可注明引文出处，以增强年鉴资料的完整性、丰富性、可信度和表现力。”<sup>⑤</sup>当然，上述意见未必要完全采纳，但其创新思路应予肯定借鉴。

由于二轮续志主要记述改革开放 35 年的历史（各地上下限又有所不同），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改革开放志”。因此，此时更应强调解放思想，以改革思维拓宽视野，以创新理念编纂新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决定》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所强调的那样：“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sup>⑥</sup>如果缺乏这种理念思维，因循守旧，胸无“大志”，那就记不好改革开放这段辉煌历史，也编不好这部宏伟“巨志”。

在这一点上，近年出版的《义乌市志》就很值得推崇借鉴。该志（第一册）专设了“卷三”，并从“经济体制改革篇”、“开放开发篇”和“驻义外国商人篇”等三个方面作了各有特色的详细记载，从而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了义乌的改革开放历史。

## 二、如何按《决定》精神记述改革开放的时代主线

### （一）注意把握国家改革开放的纵向时序和具体特征

我们说二轮续志是“改革开放志”，“系统”地“纵述史实”、“纵不断线”又是方志编纂的重要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需按历史发展顺序平铺直叙，平均用力，甚至简单地往门类框架里填充资料就能编好志书。

一方面，改革开放 35 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本身就有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和不同关键节点的历史时序（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政治建设，本世纪初的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2011 年的文化建设，等等），说明改革开放 35 年来，在力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即使是改革开放一条主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中央基本上是每十年左右重点关注并着手解决一个重大主题。而且这一过程无时无刻不贯穿着改革的意识，这一系列成就无一不是改革的成果，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决心之大，变

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即使“经济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同时也是续志编纂的重点，这 35 年的历程也非平铺直叙、齐头并进，同样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有的甚至是随着认识的深化周期性螺旋式推进，并朝着一个总体目标殊途同进。如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分别以“建立”和“完善”为重点，两次研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分别作出《决定》。同样，十五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也两次研究农村工作，并分别就“农业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和“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这样，我们在续志编纂过程中，在牢牢把握住“改革发展”这个中心的同时，还要善于在本地续志上下限特定时段中，按上述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时序和各项改革的具体进程，在入志材料取舍和各部类比例安排上，因“时”而异——对何“时”重何“时”轻，何“时”长何“时”短，何“时”详何“时”略，一一进行分析，分时段有侧重地选择入志材料，并在时间比例上进行合理分配。

### （二）善于在处理发展过程的点、面、线过程中把握编纂方法

从各地编纂实践和专家指导工作看，志书编纂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辩证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点”、“面”、“线”的相互关系。同样，有人从牢固树立“辩证统一”、“普遍联系”和“与时俱进”三个观点（其实就是本文所说的点、面、线关系）方面，阐述了年鉴条目的撰写与编纂。<sup>⑦</sup>与因时而异一样，我们同样要因“地”制宜，善于结合各地各领域的发展实际，在材料取舍和各部类比例安排上，对何“处”重何“处”轻，何“处”长何“处”短，何“处”详何“处”略，一一进行比较选择。近年来，各地在续志编纂过程中，都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创造了一些好方法，可归纳为用点、面、线的方法。

1. 从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各个特定的“点”来看，要善于“历史”地看问题。

“点”是构成历史事物最小的单元细胞，也可视为是志书年鉴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所以在编纂过程中要善于以小见大，以点带面。

一方面，按方志“横排门类、横不缺项”的要求和年鉴“条分缕析、一事一记”的特点，志书和年鉴中都要注意“布点”要全。如江苏省在年鉴评奖时就发现，不少年鉴在框架设计时忽略了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内容，因而成为失分的重要内容。<sup>⑧</sup>

另一方面，要注意方法，从具体运用上看，各地在志书编纂中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有：适度“升格”，加大“专记”、“附录”、“特载”的比重、改革大事记述方法

等，以起到见微知著的效果。

如《衢州市志（1985~2005）》中，“专记”有88篇之多（不含“附录”），这一时期当地具有地域特色的人和事几乎都有专记。这种形式开口较小，主题集中，内容鲜活，风格多样，手法上还可不受“述而不论”等原则的太多限制，所以从这一个个鲜活具体的“点”中可画龙点睛，见微知著，起到正文所起不到的作用。当然也要注意按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十一条要求：“以志为主”，“专记设置因事制宜，选题严格，数量适度。”不能喧宾夺主，这是需要把握好的另外一个问题。

例：《义乌市志》把历史大事分为“史事纪略”和“大事年表”两部分，分别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加以记载，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前者涉及的面更广，历史延续更长，社会影响更大，因而所记历史事件更为突出，更引人注目。

即便是年鉴编纂，有人也建议要“进一步增强专记、文献、调查报告、相关链接、课题论文等体裁入志的力度，必要时也可注明引文出处，以增强年鉴资料的完整性、丰富性、可信度和表现力。”<sup>⑩</sup>

2.从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各个“面”来看，要善于“联系”地看问题。

在发展的同一环境条件下，各个“点”除具有自身特点外，相互间还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绝非孤立存在。这就要善于构建各事物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进而形成整个社会“面”的“合力”。

从具体方法运用上看，对一个特定行政区域这段时期一些相互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事物“面”，可通过篇前概述、章节前无题小序等编纂方式，串联起全志各部分相互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从而通过各个系统行业、不同事物的“面”，从总体上更好地体现一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等新时期的总体特征。

例如，我们在评审《嘉善县志（1989~2008）》时发现，志书中有大量记载该县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内容，但大都记载了企业、项目、资金数额等单一信息，相互间关联度不大，更难以看出这一过程从单纯追求速度规模到注重质量效益即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重大变化。通过查阅县委县政府近20年重要文件发现，其实作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抓的一个试点单位，也是当今全国唯一的科学发展县级示范单位，该县改革开放历来走在各地前列，科学发展的决策意识早已萌芽，并逐步出台了一些重大战略和具体发展举措。只是由于具体部门（单位、乡镇、街道等）和编纂人员角色和职责所限，他们往往只能从局部角度出发，大多限于报数据、材料，难以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此我们提出，不必

苛求基层的同志，他们也未受过系统训练，这实际上是志书编辑部特别是总编、总纂的职责。鉴于各单位前期已做了大量工作，志稿已到评审阶段不宜再大动干戈，于是我们建议在各篇章前的无题小序中，适当记述或突出体现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实践的大事要事和关键环节，而且这种写法相对也比渗透到具体章节中去好写、好改，从而以这种方式把该县各方“面”的联系有机串联起来，以更好反映当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发展轨迹。这些意见已被编辑部吸收采纳。

3.从改革开放发展过程的总体曲“线”看，要善于“发展”地看问题。

各个“点”构成了某一时期丰富的“面”，但这个“面”不会静止不变，停滞不前，“面”的积累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历史发展的“向度”，三者有机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所以除了注意事物“点”的特征、“面”的联系，还要注意“线”（即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的脉络。这也就是志书编纂纵述史实、纵不断线的系统性原则。

从具体方法运用上看，对某一特定行政区域这段时期的总体走“线”路，可通过强化卷前“概述”等方式，以重点探寻这段历史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规律。

霍宪章总结了目前续志概述的几种常见写法：一是以时为序，即纵述史实的“史志体”（如《义乌市志》的“经济体制改革篇”概述）；二是常见的按内容切块分割（如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几大块）；三是以突出特色为主体，特色鲜明但写不好容易以偏概全；四是全面记述与突出特色相结合，“述”而又“论”，这种写法水准高，难度也大，但最值得推崇效仿。<sup>⑪</sup>这说明，志书编纂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更不能墨守成规，循规蹈矩，而要善于结合自身特点，以改革思维进行探索创新。

例如我们在评审《德清县志（1986~2005）》时发现，该志卷前“概述”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要求，对该县这20年的历史作了罗列式介绍，但问题是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总体规律提炼不够，改革开放的主脉络不够清晰。为此我们从三个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一是从志书记述的历史时期和起点看，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4年的县城搬迁，标志着该县新时期行政区划战略从相对封闭到融入开放大格局，是当时影响全县上下的主流形态，是20年历史巨变的思想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开端。二是从这20年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看，以“招商引资”为主要特点和重要标志，是始于改革开放并一直影响至今的经济发展主体战略，而且这一主体战略还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发展，标志着德清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三是从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看，始于2003年的“开放带动，接

轨沪杭”的发展思路，已成为引导该县全面小康及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主导趋势。这三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还逐层递进；既承接过去，又展示现在，还预示未来，从而构成一条反映德清 20 年发展的主动脉，也是这部续志的时代特征。这个建议引起了与会县领导、县志编辑部和各方面专家的普遍关注。

就年鉴编纂而言，注重“连续性”特点是体现纵述史实、纵不断线系统性原则的重要途径。如颜越虎在《论年鉴的连续性及其强化途径》中，在问卷调查基础上，从年鉴框架结构、条目记述、提供数据和附录索引、版式设计要素等几个方面，对强化年鉴的连续性问题作了重点阐述，值得关注。<sup>⑬</sup>

### （三）善于不断更新理念，探寻规律

《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同时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是《决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所倡导的改革新方法。在二轮续志编纂过程中，我们要善于领会这一精神，在遵循志书传统编纂规律的同时又要不为其所困，不断探索新编纂方法，以使改革开放这部宏伟“大志”更出彩，更具时代特征。

例如，梅森曾对城市化入志问题作过独具匠心的探索：他把城市化比作一个同心圆结构，按逻辑因果，由圆心发起由里向外、一圈圈扩展：圆心就是有关城市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与政策，第一圈是产业与市场，第二圈是人口、劳动与就业，第三圈是城乡建设房地产与流通，第四圈是公共服务资源与服务，第五圈是劳动保障与社会生活，第六圈是社会组织。这六个“圈”相互间的关系是：改革政策导致产业调整市场形成，产业市场导致人口流动和就业，人口城市就业带动城市消费和城市建设与房地产业，人口的城市集中带来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新分配，城市化不同层次的发展则又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活动。”<sup>⑭</sup>这样，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一个看似十分普通常见的问题，在他的思维和笔下令人耳目一新，既具深邃哲理又富新颖创意，这种创新意识和编纂方法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同样，有人总结了我国年鉴编纂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各类单一，发行面窄，实用信息含量少，使用率低，特别是走向不明：即是继续成为“官书”还是与西方一样，逐步走向市场化、大众化。并明确提出要消除“官书说”、“逐利说”和“工具书说”三个认识误区。<sup>⑮</sup>当然，意见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说明年鉴编纂同样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在实践中探寻创新规律。

（四）善于以探索“深水区”，明确“攻坚期”的原则方法编纂续志

《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改革发展，从而对全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对待改革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还强调指出：“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从而集中概括了全国改革开放 35 年来所存在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既是目前改革面临的“深水区”，也是续志记述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说明”同时还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存真求实”是《条例》为志书编纂作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说“存真”主要针对历史而言，那么“求实”则主要针对“现状”而言。按“详今明古”的要求，新编地方志大量资料来自于现实，反映的主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如果说一些早期史料难以甄别尚有可原，那么相对而言，当代入志资料的鉴别难度显然要小得多。其实，问题可能还不在于对史料真伪程度的鉴别难度，而在于对当代资料的入志把关。关键在于当代方志人能否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入志事物的真实面貌，否则很可能因为编纂者的主观失误将谬误留给后人，也不符合志书“客观”的本质特征，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志。

为此，在省方志办下发的《意见》中，我们按中指组《若干意见》中要求“客观反映本地的劣势、不足和教训，不溢美，不谀过”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出，既要充分关注本地区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又要客观记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采用“述而不论”等原则方法加以处理，为后人保留珍贵的历史资料，以体现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历史使命。

例：《舟山市定海区志（1988～2007）》中《定海旧城改造与保护》的“专记”，不仅系统记述了“古城概貌”、“旧城改造”和“旧城保护”等内容，而且客观记述了“在《舟山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编制、通过审查、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几年中，旧城大拆大毁达到高潮……”的历史过程，记载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批评报道和中央及省有关部门

对此所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性制止措施。最后,在大幅转引当时省政府《关于舟山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通报》后,编者毫不隐讳地写道:“定海历史文化名城失去完整、典型的传统民居生活街区和历史建筑群,名城风貌大伤元气。”“进入21世纪以后,当人们回顾起在这场旧城改造风波时,无不感到惋惜。”<sup>⑩</sup>显然,这样的记述无论对当今资政教化,还是存史于后世,都具有重大意义。

(五) 善于“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与时俱进改革和创新方志编纂工作

“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所强调的最后一个问题,说明“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同时二轮续志编纂同样既是一个回顾总结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分析现状而指导当下并探索未来趋势规律的过程。这也提示我们:既要善于在回溯历史中总结经验(我们已做到了),在正视现实中解决问题(我们已做到或将要做到),同时还要善于在现有事物的萌芽端倪中探求本质,从个别现象中发现普遍规律,在相对静态中把握动态趋势。如果只关注过去,不关心现状,更不关心未来,很多问题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特别我们强调二轮续志是改革开放志,可以“述而适论”,所以如果把握不好实质,把过去和当前、未来人为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那肯定编不好二轮续志。但认真学习《决定》,就会有蓦然回首、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能这也是这几年我们有所忽视欠缺的,同样需要认真领会把握。

例如,就如何“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条主线”的问题,王铁鹏较早撰文强调,既要关注发展规模速度,更要关注发展质量和方式的转变;既要关注GDP、CPI、恩格尔系数等传统指标,也要关注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新兴指标,并以浙江《建德市志(1978~2005)》为例,进行了系统分析。该志在“经济总情”篇中专设了“经济质量”章“节能减排”节,记述了规上企业(下同)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和工业废水、废气、烟尘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情况。<sup>⑪</sup>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志已早于几年前出版,因而更体现了编者敏锐的前瞻思维和创新意识。例如,前面提到的江苏不少年鉴在框架设计时忽略了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内容因而失分,其实也是这个问题。

还有,对以“资政,存史,教化”为重任的方志系统来说,我们能否在详细占有和严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对有些问题作一个咨询分析甚至预判,以为各地改革的“攻坚期”提供服务。这些问题不一定都体现在志书中,可以作为衍生产品(如金华市的“市情卡片”就是在读志

用志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实例)。因为“资政”同样是方志界的重要职责所在。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但这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总之,《决定》博大精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特别要善于把全会精神真正结合到二轮续志编修工作中去,不断推动全省地方志工作科学发展。

①李珣:《康熙畿辅通志序》,引自谢保成:《中国史学史》第3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106页,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③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99页,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④孟庆斌:《新方志如何记述改革开放》,《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8期。

⑤伍常安:《政治体制改革立篇记述刍议》,《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9期。

⑥姚敏杰:《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规范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⑦陆瑞萍:《对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⑧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11.16。

⑨何喜清等:《简论年鉴条目撰写与编纂》,《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⑩陆瑞萍:《对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⑪陆瑞萍:《对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⑫霍宪章:《关于如何写好二轮志书概述的问题》,《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3期。

⑬颜越虎:《论年鉴的连续性及其强化途径》,《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⑭梅森:《城市化是第二轮志书记述的重点与背景》,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集。

⑮唐宏辉:《年鉴演变的狭窄与还原的宽广》,《中国地方志》2010增刊。

⑯参见《舟山市定海区志(1988-2007)》(送审稿)。

⑰参见王铁鹏:《经济部类志书应反映经济方式发展这条主线》,《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8期。



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密密桑林中发现了一群蠕蠕而动的“天虫”，经过不断驯化，将这种野蚕变成家蚕，从此，栽桑、养蚕技术一直传承至今，造福人类。

蚕蚕丝织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在上下 5000 年铺就的文明之路上，丝绸以一袭柔美的力量折服世界。四年前，“中国蚕桑技艺”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难怪人们要对它顶礼膜拜。然而，意想不到的，几千年来，最草根的、来自坊间最美的丝绸之歌，竟源自义乌。

### 蚕神故乡，丝绸发祥

《中国丝绸文化》记载了流传在杭嘉湖一带的民歌《马明王》，歌词唱道“马明王菩萨到府来，到你府上看好蚕。马明王菩萨出身处，出世东阳义乌县。爹爹名叫王伯万，母亲堂上王玉莲。马明王菩萨净吃素，要得千张豆腐干。十二月十二蚕生日，……”

一首民歌决定一种文化，一种底蕴。有道是“山歌无假戏无真”，这些桑蚕歌谣作为地域文化不可磨灭的胎记，经千百年来口碑相传，积淀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那么，作为如今桑蚕业最为兴盛的湖州与嘉兴一带的蚕农称蚕神马明王（马鸣王）菩萨出身地在义乌，必定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作为蚕神的故乡义乌会是丝绸的发祥地吗？

有关蚕神，甲骨文中就有“蚕示三牢”的记载，即殷商时期需要用三鼎盛牛、羊、猪三牲来祭祀蚕神。民间的蚕神有蚕女、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等多种称

呼。

在物质世界中踉踉跄跄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有“欧（欧同呕，吐也）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是蚕神的雏形。《荀子·赋蚕》云：“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言蚕身柔婉而头似马。干宝《搜神记》记载一女言嫁马而反悔，后弑马揭皮，暴皮于庭，马皮卷女，尽化为蚕的故事。至宋朝戴埴《鼠璞》云：“俗谓蚕神为马明菩萨。”

蚕神马明王年画

南朝宋东阳无疑（古东阳郡乌伤人）的《齐谐记》就出现过蚕神，云：“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是蚕室（疑为‘神’字），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后来南朝梁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正月半作白粥泛膏于



蚕神马明王年画

上祭蚕神，这种习俗延续至今。金华为婺女星分野，婺女也为须女、织女。崇祯《义乌县志》（卷二）称本地“民间专祠婺女（织女），彼或有取尔也，以事验之”，还列举大量事例来证明婺女的灵验，并引晋书和正义等书说明婺女“主泉布裁制嫁娶”，“果蔬丝布珍宝”。旧时义乌祭祀婺女祠庙在朝阳门附近。

蚕神马明王菩萨的原型是否跟婺女有关不可考证，其原型到底是谁也已无从追询，但肯定有一位心灵手巧的织女，马明王菩萨出世东阳义乌县，至少说明杭嘉湖一带的蚕神是从义乌请去的，也就是说，海宁湖州一带的丝绸业技术极可能从义乌传入，虽没有文字依据确认义乌是桑蚕业的起源地，但作为桑蚕业的发祥地之一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丝绸通史》著者赵丰认为，原始先民崇拜桑蚕这一文化背景，才是我国丝绸起源的主要原因。现有资料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人工养蚕，崇拜桑蚕的文化土壤滋养了丝绸的兴起与繁盛。

1958年，浙江吴兴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竹筐中发现一块平纹残绢。经鉴定，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它证明我国丝绸业至少有4700年的历史。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件绘有几条蠕动着蚕的象牙杖饰（图一），表明我国饲养家蚕的历史，至少有7000年。

专家认为，浙江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有着家蚕生长的良好生态环境，而且出土了大量有关蚕桑业的实物，最有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祥地。位在浙江中部的义乌无疑是桑蚕业的发祥地之一。

作为耕织社会，人们居然把纺织的源头追踪到这里，义乌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

### 罗被天下，鸣机万家

“夹岸桑树数十里，果然蚕事此邦多。”作为蚕神的故乡义乌，蚕桑业的历史非常悠久，《述异记》称春秋时期，“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魏晋时期就已广泛植桑养蚕，以至有“縠巾取于邱岭”之说。在唐朝杜佑的《通典》第六卷里已有婺州纤、纴、锦等列为贡品的记载。锦是指用联合组织或复杂组织织造的重经或重纬的多彩提花丝织物。“锦”字由“金”和“帛”组合而成，《释名》中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尊者得服之”。要织锦，就必须有相当高的技术。义乌在唐武德年分置为稠州（后改稠州）和绣川（又称华川），其命名都与丝绸相关，恐非偶然，极有可能当时义乌已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五代时中原战乱频繁，而义乌处于吴越王国相对安



（图一）河姆渡出土蚕纹杖饰

定的腹地，再加上南宋王室南迁造成大批工匠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丝绸业重心南移，又因西北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唐朝桑蚕业发展已有较好基础，这都使得义乌桑蚕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另外，作为木雕之乡的东阳木雕工匠雕造精美细致的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纈，印染技术比前代有所提高，使得东阳义乌一带丝绸印染技术列入全国先进行列。

北宋中叶社会改革家李靓曾介绍：东南之郡“桑柘甚盛，蚕女勤苦，……茧簇山立，操（纴）车之声，连户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罗縠之衣，名状百出，弗可胜穷。工女机纤，交臂营作，争为纤巧，以渔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义乌东阳一带蚕桑业生产已相当发达。丝织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当时民间丝织业“万室鸣机杼，千艘隘舳舻”。金华“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欧阳修在景祐元年《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一诗中描绘东阳县“千室夜鸣机”的景象，当时刘子翥的《过东阳》诗描绘的更是“小箔鸣机几万家”，说明当时纴丝和织绢已分为二业（见余也非的《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3月592页），在颇有商业意识的义乌县“有山谷之民，织罗为生”，产品由城其中的“柜户”收购兴贩，已是产销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了。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这一带丝织业的盛况。

上苍造就了浙中这片风土吉壤，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崇祯《义乌县志》（卷七）记载了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义乌向朝廷进贡及朝廷向义乌和预买丝绸的品种与数量，“岁贡含春罗三十匹，花

罗一百匹”，以及大量丝绵等。宋淳化中，朝廷向义乌每年和预买婺罗四千匹，花罗五百匹，平罗两千七十五匹，绢六百七十八匹及绵、丝等。之所以能成为贡品，表明义乌在宋初就已经有相当好的质量，而和预买的情况则直接反映本地区丝织品生产情况。据《中国丝绸文化史》（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 年 4 月）一书称：“婺罗闻名全国，区区一地每年交纳婺罗数万匹，占全国总数的九成以上。”义乌一县的和预买的丝绸量就已将近一万匹，足见当时义乌丝绸产量之多、规模之大，义乌已是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地是不可置疑的。比较明清时丝绸业最为兴盛的桐乡县，在南宋夏税征收时仅有 3196 匹（光绪《桐乡县志》），而义乌县达 11544 匹（康熙《金华府志》），远远超过桐乡丝绸的纳税数。

### 出土的宋代罗

《挥麈后录余话》（宋·王明清著）记载了南宋时，金华百姓不堪重负，婺州知府苏迟向朝廷请求减少上供罗的年额一事，提到当时婺州交纳平罗、婺罗、花罗（图二）等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之巨。高宗曰：“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者，为永法。仍令本州及转运司每年那融应副本钱足备。”则婺州交纳罗三万余匹，义乌约占三分之一，当时义乌可称得上是



图二 宋代花罗的纹饰

“罗被天下”了。

### 海上丝路，义乌起步

宋代丝绸之乡义乌丝绸生产的数量多，质量上乘，无疑也兴起了以丝绸为核心的商业文化。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提到婺州出产婺罗、清水罗、细花罗、暗花婺罗、红边贡罗、东阳花罗，而明州（宁波）出产的恰是平罗、婺罗、花罗（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台湾稻禾出版社）。明州出产的婺罗，自然要么来自婺州，要么冒名婺州，这恰恰说明了婺州罗是通过明州港出口海外的。当时的丝绸之路，陆路从义乌东阳出发，经嵊州、奉化到明州，水路从东阳义乌出发，经兰溪、桐庐，到杭州或经浙东运河到明州，过市舶司通关，北行朝鲜，东行日本，南下南洋、及大食阿拉伯。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9 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丝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中日文化交流史》统计，日宋间商船往来几乎年年不绝，淳熙十二年，便有绫、绢、罗百十端运往日本，献给白河法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提到朝鲜“不善蚕桑……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宋人赵汝适则记载宋丝绸输出东南亚各国情况。

婺州罗质量精美，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婺州丝织品在销量上的大增和市场的扩大。因丰厚利润的刺激，大量农民脱离农业，纷纷从事丝织品买卖，“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因而也导致了“南方之刷郡，泉山，婺女（指婺州）并为称首，其民机巧取利，故多富室，而讼牒示繁”的场面。吕祖谦在淳熙元年（公元 1174 年）从婺州经义乌到会稽，就描绘了沿途地主小农乃至乡村小户都经营丝织，把包括布帛在内的商品投入市场交易的见闻。

南宋时，义乌县有山谷之民，以织罗为生，在小作坊主巨户的组织下，统一生产收购，再经由中介商人收购买卖给彩帛铺，或售给客商，由客商运销外地乃至出口海

外。当时县衙认为这种任由民间自由贸易的方式，会导致偷税漏税情况发生，为此，一度采用强制手段，把八个乡的柜户全部抓来，登录姓名，还将他们所织的绫罗绸缎尽数搬来，强制缴税。结果影响了自由交易，山民柜户苦不堪言。这种不问是否已进行买卖，一律收税的办法，必然打击织户的积极性，导致产量降低，反而减少商税收入。以至于宋孝宗下诏，要求义乌县“放散柜户、牙人，任其买卖，依条收税”，不允许在离县城五里以外的地方巡逻拦截、勒索村民，并令其他州县，“不得私置税场，邀阻客旅”。宋代牙人在丝绸交易中所起的纽带作用，可见一斑。

金华唐仲友开彩帛铺，往来义乌金华间，一次交易暗花罗、瓜子罗等丝织品达三四百匹。处州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贩货于衢婺间”，渐至巨富。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富阳民蒋法等捉到客人沈赞，罗一百八十二匹没纳入官”，而且明文规定，“婺州罗帛客旅沿路偷税尽纳官”。罗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丝织品，沈赞能一次性经营罗一百八十二匹，足见当时经营丝织品的一些商人手中已握有相当数量的资金。

义乌水陆交通便利，水路船帆如织，陆路长枪（挑担）如流，对婺州丝织品的贸易和销售极为有利。来义乌收购丝绸的客商云集，崇祯《义乌县志》称：“宋兴，以主客分户，至详细矣，然转徙无常，反恣影射。”意谓宋朝时，义乌因许多流动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在城市或市场经商，蒙混户口，致使编户困难。

明代义乌仍继承宋元经商风气，这在万历《义乌县志》上有载：“男子服耕稼，妇女勤织纺，商贾鬻鱼盐，工习器械以利民用。”可见明代义乌的商人应有一定比例，如下骆宅骆氏第四十四世骆得源家甚富，次子骆征信做粮食生意，经营南粮北运，于洪武十五年（1382）运粮北上亡于南京。又骆崇辉亦是行商，嘉靖二十七年（1548）经商亡于广东。（注：新编《下骆宅村志》，下骆宅村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97年，第56页。）又《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风俗》解释“东亲戚不如乌相识”时说：“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著籍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每当冬春之交，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不啻数千人，其迁居著籍者，又不胜数也。”说明在明朝义乌商人世居他乡者比比皆是。

在这些经商的义乌人中，有多少曾经顺着丝绸之路，去过海外，已经难以考证，只有赤岸有名冯允奇的，曾至西洋贸易，“波斯珍异，载满归船”。黄山八面厅有一块木雕正是按照义乌商人下南洋经商生活为蓝本所雕刻（图三）。唐宋义乌有多少丝绸经宁波运往东洋、南洋、西洋各国，也无法考证了，但多少年后，义乌敲糖帮（图四）



图三 黄山八面厅木雕下南洋图



图四 货郎担图

走的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始线路，然后逐步扩展。“敲糖帮”贸易的路线主要有3条：南路、中路和北路。南路从义乌东乡的廿三里镇出发，到达衢州后继续进入江西和湖南；中路是到达衢州后往北进入皖南，再取道建德和兰溪回来；北路则从义乌北乡的苏溪镇出发，到达杭州后继

续往北过嘉兴、上海、南京一直到徐州为终点站，或从杭州转向绍兴、宁波方向，再从嵊县、东阳折回。（胡琦：《义乌的“敲糖帮”》，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义乌丝绸之路和后来的鸡毛换糖路线之间不无渊源。

海上丝路和“敲糖帮”在历史上形成的3条路线，就很清楚地勾勒出了由义乌独特的交通区位形成的一个巨大商业网络。而义乌的市场规模迅速兴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义乌是沿海与东南内陆地区的陆上交通枢纽，随着沿海商业的发展，通过行担组织而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义乌商业的发展。这些行担组织随着现代陆上交通技术的改进，其规模迅速扩大，最终为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从蚕神出生地，到丝绸之路新起点，颇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文明就这样以其偶然而又必然的方式露出笑脸。

### 丝路新启，再绣华章

采桑陌上的风情，最是农耕时代妖娆景致，沧海桑田的历史，那是一段曾经华丽而优雅的古典；古老的花罗已渐渐飘舞成一段华美的背影。义乌，蚕神的出身地，丝绸的发祥地，海上丝路的启程处，鸡毛换糖的策源地，曾因丝绸而繁华。曾用丝绸命名的义乌，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古代海上丝路举足轻重的一站，如今，义乌将如何定位？又将走向何方？

央视纪录片《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里这样界定义乌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起点在西安；今天，义乌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通达于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再度崛起，义乌已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丝路新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人凭着自强不息、甘于吃苦的精神，继承义利并举、以义取利的文化传统，勇敢地跳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自谋生路，走南闯北，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以高质量、多品种、低价位的小商品，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奇迹，使义乌成为全球最大的“超市”和“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引起世界瞩目。如今，义乌已成为世界小商品贸易中心，在这里经商的国内外客商人数众多，他们形成了较多的合作群体，这种情况与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的主题极为相似。昔日，由于中亚、欧洲人对来自中国丝绸的挚爱，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找到了最好的切合点；今天，购物者的天堂，让世界地理大发现由此才得以开启。显然，历史已在重现，义乌是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当之无愧。这里，有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被称作“世界超市”；这里，义乌发展经验曾为浙江省委、省政府总结、推广，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

试点的桂冠闪耀着奇迹的光芒；这里，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0余名外商，常驻义乌采购商品，年出口65万标箱；这里，常驻义乌的外商机构达到了2800多家，占浙江省总数的二分之一；这里，为全球供应170多万种的小商品，辐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有100多万的外来经商者和外来建设者，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和谐共处……

站在历史的纵深回望，挖掘历史人文积淀，梳理文化发展脉络，义乌丝绸文化孕育了勤劳、务实的义乌品格，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质的“鸡毛换糖”敢闯敢创商贸精神，为义乌的创业创新和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张力和精神动力。义乌要充分发掘区域内的工商文化传统，以商贸业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引擎，拓宽市场发展空间，扩大市场的辐射功能，寻找城市发展新动力；站在世界的高度远眺，瞄准现代化国际都市建设，义乌要扎根长三角，接轨上海自贸区，契合中共十八大确定的我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角色，全市上下统一思想，重燃创业激情，敢于打破框框和思想束缚，破除旧的体制、机制，开拓新的领域，寻找新的奶酪，追求新的高度，发动新的超越，转型发展，建立符合义乌发展的新机制。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不断探索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

万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使我们振奋鼓舞，这条新的丝绸之路，必将以更纵深的指向性、更有力的辐射性，为义乌、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谋福祉。而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的义乌，海陆对接，汇通天下，又将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战略节点，瞻望未来，义乌必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领域的高势能港口，不仅以“买全球，卖全球”的商品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还将对世界精神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千百年来，义乌人的勤劳智慧抒写了丝绸之路的传奇鸿篇，如今，站在新丝路的起点，义乌必将会有更多的期盼，更多的追求，一定会有更多的传奇，更多的精彩，更多的锦绣，更多的辉煌。

重温人生历史发展的曾有之路，旨在重现曾有的辉煌和荣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数十年市场发展经验，已使我们形成了超越以往、不可替代的优势，如今充分利用丝绸之路新起点，打造经济升级版，其势已成，其时已至！响应中央号召，抢占新丝绸之路的桥头堡，要敢于亮剑，勇于担当！

# 『义乌兵』个体经商史料的发现及背景分析

『义乌兵』是如何成为义乌商业文化之源头的

金哲为

随着对“义乌兵”研究的深入，学界提出了“义乌兵”是以“敲糖帮”为代表的义乌商业文化的源头之论断；认为义乌能有今天的市场规模与经济成就，“义乌兵”所创造的商业文明功不可没。“义乌兵”个体经商史料的发现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本文通过目前仅有的“义乌兵”个体从事商业活动的史料分析，试图给“义乌兵”的商贸活动以合乎逻辑的还原并对其从商的背景、条件及影响进行分析。

## 一、问题的提出

丰富的史料发掘证明：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麾下的“戚家军”是以“义乌兵”为主体的。如今，这一结论已被学界认同并广为人知。随着对“义乌兵”研究的深入，“义乌兵”与近代义乌商业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实际上，“义乌兵”卸甲回乡后置办田产、屋宇，从事商贸活动发家致富的传说在义乌当地及其周边地区自古至今就一直在坊间流传。对此，学术界近些年也相继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推测，证明“义乌兵”与“敲糖帮”的产生、“义乌兵”与义乌传统商业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或明或暗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义乌今天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和“浙江现象”的典型代表，“义乌兵”所创造的商业文明功不可没。但是，苦于找不到直接的相关史料，不能令人信服地还原“义乌兵”从事商贸活动的真实面貌，也削弱了“义乌兵”经商是义乌传统商业文明的源头这一结论的说服力。怀着对这一问题的好奇，笔者多方查找资料，终于在《稠州石楼陈氏宗谱》中找到了关于“义乌兵”个体经商的记载。

据2003年重修的《稠州石楼陈氏宗谱》（下简称“宗谱”）中撰写于明朝万历二年（1574）的“石楼陈氏宗谱序”及世系记载，该陈氏一系最早（大约在宋末或元初）由常四公陈闲郎（字大猷）自东阳迁至乌伤之东二十里许（疑为石楼山下）。之后部分世孙分迁各地，包括迁回东阳。明朝永乐年间，陈姓始祖大年公迁居楼山塘（此塘名也应与石楼山有关）周围繁衍生息。由于人口迁徙比较频繁，目前的陈姓后裔主要集中在廿三里街道的东陈、楼山塘等行政村。东陈即塘东之陈、楼山塘村则以塘为名。

受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族人从事商贸活动的记载极少入谱，其它地方志书中此类史料的记载也很少或多已亡佚。因此，陈氏宗谱中发现的“义乌兵”经商的史料显得弥足珍贵，是目前义乌本地发现的唯一可以直接证明“义乌兵”个体与商贸活动相关联的文字资料，为“义乌兵”经商问题的研究开阔了思路和视野。

## 二、“义乌兵”经商史料的发现

查阅“宗谱”，曾在戚继光麾下效力的“义乌兵”有三

位陈姓。

第一位叫陈景祥（字左泉），1553年出生，青年时投身戚家军成为众多“义乌兵”一员。由于他长相秀气、反应灵敏，在戚继光总督营帐担任掌案书记一职多年。后来得到恩准辞去军职回到故乡。他以从军期间积累的兵饷收入为原始资本，在家乡逐步购置大片田地、建造高大庭院楼宇，成为地方富绅。

宗谱中这样记载陈景祥：“玉四十七幼子。尚六十四，讳景祥，字左泉，以英敏之才久于戚总督军门掌案书记，承恩辞选归家，广置庄田，创造大厦，诚豪俊人也。生于嘉靖癸丑（1553）正月十九日，卒于万历戊子（1588）七月廿九日戌时。”

按照谱中记载，陈景祥享年只有35岁。结合其妻妻生子的情况分析，卒于万历戊子（1588）年记载应该是后代做谱是卒年报错或在历次修谱的抄录过程中发生错误，实际年龄远不止35岁。理由如下：

陈景祥娶的第一个妻子是九里江王氏，夫妻同年（1553）出生。由此推断陈景祥的出生年份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王氏卒于崇祯庚午（1630）、享年77岁，属于很长寿了，她只育一子名文彩。可能因为王氏生下文彩后数年未育，所以陈景祥又继娶一房，也姓王，生于隆庆辛未（1571），卒于顺治壬辰（1652），享年达81岁，但未生育；可能因续妻婚后未生育，于是乎他又娶了侧室。该侧室虽然姓氏、生卒都不详，但却生了四个子，谱中详载有名字。家境富裕、又有着从军习武的经历，能娶三房夫人、生育四个儿子，陈景祥身体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且谱中记载他死后与其合葬的不是与第一任妻子而是81岁的续妻。毫无疑问，他的卒年应该在侧室能够完成生育以后。考虑到后人如果无法回忆先辈的生卒年，所处的皇朝年号是会记得的吧，故迟于万历末年（1619）的可能性不大，其享年应该在36到66岁之间。

第二位叫陈文科，出生比陈景祥早，但辈分比陈景祥小，生于1549年。文科从小有抱负，才气过人、体格健硕。年轻力壮之年去京师投奔戚继光麾下，担任了戚总兵标下的哨总一职。他做事勤快、不惜力气，为人豪爽，在军中名望很高，立下军功，职务晋升至水陆总练及负责镇守边防的千总官。每月的军俸增加了三石，积累了军饷达万两银子。荣归故里后，大量购买房屋、上好的田地，并迁居到楼山塘之角。

宗谱中这样记载陈文科：“尚七十七公长子。端四十四讳文科，为人自幼志气骄傲，才力过人。壮年去京投用戚总兵标下稍（哨）总。勤劳名重，有功，职授水陆总练，操边方镇守千总官。每月加俸三石，官囊积在万金。荣归，广置庄田沃土，迁居楼山塘角。真豪爽之士也。生

于嘉靖己酉十二月初六日（公历应为1549年1月2日），卒缺。”

总督旧称军门，为明代朝廷临时授予文臣监督军事的一种官衔，带有军事巡查性质。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总督总兵》卷8曰：“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督与总兵一样都是没有品秩的差遣。明正德年后，总督开始兼掌民政，成为地方军政首长。在明朝，掌案一般是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文职僚佐，掌管案卷或掌办文书。哨总是明朝水军总备官下面的官职，总备下面设把总、哨总、哨官、水兵。由此看陈景祥的掌案书记一职，虽无品秩、级别不高但身处军事机关的核心，有实权；陈文科的哨总职务已经处在军队的中上层，待遇应该是可以的。

第三位叫陈文庆，1555年出生，家中老二，陈文科的弟弟。他秉性公正无私，从小随大哥到他任职的京师之地，在大哥军中担任旗总官。卸甲回乡后，买了房屋土地，过着逍遥的日子。享年75岁。

宗谱中这样记载陈文庆：“尚七十七公次子。端五十一讳文庆，秉性公直无私，自幼随亲兄文科任所听用旗总，后隐林泉之下，笑傲山水之间，广置膏腴。此吾族安逸之民也。生于嘉靖乙卯（1555）十一月六日亥时，卒于崇祯庚午（1630）正月十九日。”

还有一位人物虽不是戚继光麾下“义乌兵”之一员，但与戚家军有联系，值得关注。此人叫陈文凤，陈文科的三弟。他追随大哥前往京营，利用大哥的地位和人脉开店铺，挣了不少钱回家继续创业，事业非常红火。谱中称其为“光前裕后”。

宗谱中这样记载陈文凤：“尚七十七公四子。端六十二，讳文凤，气质刚强，人才魁伟。随亲兄文科往京营，开肆数年。所得利归家，创业广置，以为光前裕后也。生于隆庆戊辰（1568）十一月廿四日戌时，卒于崇祯辛巳（1641）六月二十日。”

历史上，沿楼山塘边连接今天东陈、楼山塘两村的古道是东阳、义东的廿三里连接苏溪到杭州的交通要道，是商贾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据当地老人介绍，清末、民国时楼山塘村东靠近塘边的道路一侧一直都开有歇店（旅馆）、酒肆、当铺，生意很火。身处这样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拥有经营资本又见多识广的“义乌兵”陈景祥、陈文科和从商经验丰富的陈文凤等人回乡后继续从事商贸经营是顺理成章的事。

### 三、“义乌兵”经商形式的研究及其成因

由“宗谱”中的记录可以发现，陈景祥、陈文科在戚家军中颇有些官职，陈文庆也担任过军中小官；陈文凤则

是京城期间就从事经商并颇有收获，他们归家乡后利用先前所得，进行创业。可见部分“义乌兵”回乡后是有一定资产的，这也为他们创业提供了经济基础。事实上，由于“义乌兵”战功累累，明代一朝因军功被授予平章元帅、将军、副总兵、参将、千总、把总、千户等武职的就有数百人。部分“义乌兵”也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有的甚至相当雄厚。如“宗谱”中记录陈文凤之兄陈文科“官囊积在万金”。

然而，在先后征募的约二万六千“义乌兵”中升官发财的毕竟只是少数，当兵的远比为将的多。这些“义乌兵”回乡后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是否也从事经商活动？笔者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后万历年间，率多习兵应募，已而罗募营废，皆散入江干，徙为他业，如肩挑买卖不等。每当冬春之交，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不啻数千人。其迁居著籍者，又不胜数也。”这一史料看似并没有记载回乡后“义乌兵”的活动，但细细推究便可发现其中联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时义乌的整体状况。义乌的农业区位优势并不显著，属于丘陵地形，良田缺乏，许多地方的农田严重偏酸性，农产一直不丰，自然灾害此时也频频发生，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大旱，颗粒无收，民食草木，饿殍遍野。后来由于大量征募“义乌兵”，以致“乌民户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庆五年，共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丁，万历九年户口仅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致亏失原额。”本就不太景气的家园因人丁锐减的影响而更趋凋敝，据李鹤鸣《义乌县丁田实征序》中记载，“其间可畝亩耕稼地复不能十之三，无草夷材嘉果之产，无佃渔数泽之利，无商贾工巧器服之资料”。另一方面，由于“义乌兵”的征募，义乌尚武轻农渐成风气，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义乌兵）以军功显而子弟多食衣税悬金以诧闾里，人益鹜于战功矣。”当地的青年男子们不愿意从事农耕而梦想建立军功，效仿前人，然而由于征募的停止，这些年轻人为了生存，很多便做起了《新修东阳县志》中所说的“肩挑买卖”的行当。从《新修东阳县志》中的描述可以看出这种“散入江干，徙为他业，如肩挑买卖不等”的情状更像是当时义乌民间的潮流，久居本地的年轻人尚且如此，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卑微的“穷”“义乌兵”们长期当兵在外，不习农务，只善游走，回乡后的他们面临着生活上的窘境，为了生存，跟随大流“（弃农）徙为他业”，做“肩挑买卖”是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由此可见，回乡的“义乌兵”们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商业道路。一种是以多有积蓄、混有一官半职的“义乌兵”为代表的大商人，他们人数相对较少，凭借充足的资本主动创业，其性质类似于明清之际徽商、晋商；而另一种则

是以往参军却未被招募的“义乌兵”和积蓄不多、职位低微的“义乌兵”为代表的小买卖人，他们人数众多，迫于现实的生存压力和自身的问题，弃农从商，走街串巷做着“肩挑买卖”，这便是义乌后来兴起的“敲糖帮”的前身。无论“义乌兵”回乡后从事哪一种商业道路谋生，都具有两点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有过南北奔袭的从军经历，见多了自然识广；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倭寇的交战以及与东南沿海渔民、商贩的接触中深知，经商做买卖比耕种来钱要快得多、利润要丰厚得多。

#### 四、两种商人群体弃农从商的共同历史背景

虽然二者的经商道路不同，但都是弃农从商，逐渐改变了义乌务农为主的历史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现实局面，这一切除了上述他们各自的原因外，仍有其他共同的历史背景。

##### （一）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经济一直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商业经济的发展却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宋代以后，商业经济在社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明中叶更是进入了全面兴盛时期。义乌商业经济在明清之际的繁荣，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镇的兴起。台湾学者刘石吉就曾提出，在宋代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商旅往来懋迁，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作为固定地名、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是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技能为主的城镇，也蜕变为商业及贸易的据点。宋代以降，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现代型的市镇已经开始萌芽成长。而到了明代，江南市镇已经非常繁荣，这是时代的大背景。据万历二十四年（1596）《义乌县志》记载，义乌此时共有16个市，较万历六年（1578）多了四个市。然而市镇的影响范围只限于少数经济较发达地区和部分乡村，交易日期也有间隔，难以满足广大乡村百姓的日用需求，这正为走街串巷的小生意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又因为他们卖价公道，态度又好，所到之处深受欢迎，生意兴隆，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义乌本地人加入其中。渐渐地，这些走街串巷的小商人形成了颇有组织和规模的“敲糖帮”。

##### （二）相对开放的地域文化和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影响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义乌虽处于浙江中部，但历史上学术界却把它划归浙东地区。浙东地区的文化受海洋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人们相对的开放、勇于冒险与创新。南宋时期著名的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就对利、义关系有着不同于传统看法，他提出“利者义之和也”，这种学术的氛围和倾向无疑对当时整个浙东地区产生了影

响,后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就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

### (三) 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明代中后期,南有倭寇之乱北有鞑靼、女真之患,后来在全国又相继爆发了数次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付内忧外患,对商人的压制也渐渐减轻,传统的“抑商”政策受到削弱,这无疑给人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祸乱连年不断的情况下,明朝廷国库空虚,以至于崇祯之际征收“三饷”,大失民心,普通农民不堪重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像中国古代的众多王朝一样,明王朝最后迫于无奈,也采取和一些大商人合作,这个在客观上也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 (四) 义乌人较强的主体素质

义乌在中国古代非常贫穷,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义乌人养成了不屈不挠、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这从戚继光听闻义乌强悍的民风而前往义乌招兵以及“义乌兵”在历史上的表现都可以看出。面对日益残破的家乡,富有冒险精神的义乌人不消极等待,积极走出家门闯荡,不惧世人的冷嘲热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从事鸡毛换糖的生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

### (五) “义乌兵”回乡带来了良种、技术和新的观念

上文多次提到明代以前的义乌由于资源贫瘠、耕地匮乏,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由于征募“义乌兵”,无数义乌人走出农村到过相对开放和发达的福建、浙东沿海,后来又有部分“义乌兵”随戚继光进京,后又镇守蓟辽。由于“义乌兵”人数众多,在外多辗转多年,完全称得上是人口的迁徙,这种人口的迁徙势必带来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技术的交流和物种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甘蔗的引进。当时的义乌并没有甘蔗的种植,就连金华也没有,义乌榨红糖的甘蔗正是明末引自福建。福建是当年戚家军将士保卫的地方,在福建,甘蔗种植非常普遍,著名的蔡丕岭战役就是在福建的甘蔗林中进行的,骁勇的戚家军将士将倭寇杀得大败。从戚家军的时代义乌人就已经很熟悉甘蔗,过了几十年,糖工从福建引种到义乌,水土非常适宜,产量很高,民间甚至有甘蔗是“义乌兵”最先在义乌种植的传说。这也是后来义乌制糖产业和“敲糖帮”兴起的原因。同时,“义乌兵”历经商业相对发达的福建沿海、京城等地,见多识广,亲眼目睹了从商获利远远优于务农,这改造了他们传统的务农为先的观念。

## 五、“义乌兵”在经商过程中的特点与优势

以创业经商活动的“义乌兵”人数虽然不及做走街串

巷的经商行当的“义乌兵”,即后来的“敲糖帮”,但他们资金雄厚,产业规模大,是义乌商人的头牌兵。而所谓的“敲糖帮”闯荡各地,他们人数多、范围广,是义乌商人的主体和形象标兵。这些“义乌兵”退去戎装却在商界的战场上屡战屡胜,自有其特点与优势。

### (一) 分工明确的组织结构

戚家军的统领戚继光不仅是一位善于领军作战的优秀将领,更是一位练兵大师。他先后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录》,这都是他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在抗倭援朝的战争中,戚继光早已去世,他的前部下义乌人胡大受就重新印制《纪效新书》,将它们分发给“义乌兵”将士,并照之以训练朝鲜八道的兵士。而在戚继光第一次来义乌招兵后,为了能在接下来的募兵中被选中,当地的年轻人纷纷照着在部队里的亲友带回来的《纪效新书》学习、训练。戚家军在军营里分工合作,天天操练需要长短兵器互相配合的“鸳鸯阵法”,这种分工合作的习惯也被回乡的“义乌兵”带了回来。可以说军队里的磨练和兵书学习使“义乌兵”在经商时具有了较强的纪律和组织意识。这从“敲糖帮”的组织结构中就可以看出一二。其组织结构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担头,即挑糖担走街串巷者;二是坐坊,即为担头提供各种服务者。因从业能力不同,担头又分为四个级别:老路头、拢担、年伯、糖担,四者各有其分工。因经营业务不同,坐坊又分为四类: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他们的任务与分工也不同。这一组织结构保证了货源,促进了流通和销售,利润也大大增加,使其成为颇具专业性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组织。

### (二) 独树一帜的“义乌兵”精神

这些“义乌兵”大都南征北战,在军营里天天严格训练,作战时则勇往直前,配合戚继光的卓越指挥,故而所向披靡,被世人称为“兵样”,其天不怕地不怕,敢闯敢拼的勇气与精神可见一斑。事实上,历史上金华民间就流传着“义乌拳头”的说法,意指义乌人刚一强悍的性格。经过军队的洗礼,他们练就了一身胆识,敢闯敢为,不惧风险,这对后来义乌民间形成外出闯荡谋生的风气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义乌市倍磊镇是明中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所兴起的商业集镇,史称倍磊街,它也是义乌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商业古村落的代表。在倍磊街街心的龙皇亭上“福”字下面一个“忍”的装饰,是其独特的文化表达也是义乌商业文化、“义乌兵”文化、义乌农耕文化的生动写照。“忍”被视为“福”的前提,这正是义乌精神的最突出的体现,在明代,倍磊出了六个大将,70多位武官,800多人从军,皆坚忍不拔,能忍受各种磨难而成为“义乌兵”的中坚力量。而这一精神被运用在商业上,代表着为获取最大利益而忍一时之苦一时之委屈,这也是义乌人

在商场上无往不利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这些经商的“义乌兵”们的精神可以总结为：自力更生、坚忍不拔、勤劳务实的拼搏精神和敢闯敢为、勇于开拓、勇为天下先创新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支撑，义乌人在明清之际，就在商界打出了一片天。

### （三）较为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

“义乌兵”走南闯北，足迹浙江、福建、京城等地。而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中国商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退役的“义乌兵”把他们所见到的当时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带回了义乌，并付诸实践。

## 六、由“义乌兵”经商引发的对义乌当代商业发展的一点思考

从明末的兴起、清代的繁荣和建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坎坷，以鸡毛换糖为主要内容的义乌商业经济在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沧桑后终于迎来其崭新的生命。鸡毛换糖已不再限于其字面的涵义，义乌人的糖担里有了针线、手帕、发夹之类的货物，改变了单一的鸡毛换糖经营方式，增售日用小商品，并逐渐以此为主业，形成了一支小商品采购、销售大军。一个自发的小商品市场悄然形成。1982 年 8 月，在改革开放的指引下，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终于呱呱坠地，而如今的义乌更是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城。贫瘠了千年的土地上汽车穿梭如行云流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曾经的贫穷小县城已长成“华夏第一县”。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商业高度繁荣的时代，回首历史，秦代舍身葬父的颜乌、初唐传檄勤王的骆宾王、宋代临终犹三呼“渡河”的宗泽都是义乌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人文精神的见证，他们更是义乌经济背后的文化作用力。而散发着最耀眼光辉的却是一群保家卫国、弃农从商的“义乌兵”的身影，他们代表了义乌悠久的商业传统。虽然时过

境迁，当年的走街串巷的叫卖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流淌在当代商场上新的“义乌兵”血脉中的“义乌兵精神”却是亘古不变。正是凭借着这股独树一帜的“义乌兵精神”，义乌人才能在明末、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如今这个多变的商品市场上，能否继承和发扬“义乌兵精神”是义乌市场能否继续繁荣的关键。尽可能的挖掘和还原义乌的商业文化与传统的原始面貌，为众人重新展现贯穿数百年的“义乌兵精神”正是笔者此文的目的与期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 2011 级历史基地班义乌籍学生）

### 参考文献：

1. 万历《义乌县志》卷八《矿防书·民兵》
2. 《稠州石楼陈氏宗谱》（2004 年重修）卷一、卷四
3. 《戚少保年谱耆编》中华书局 2003 年出版
4. 明代李鹤鸣《义乌县丁田实征序》
5.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风俗》
6. 《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
7. 张金龙《义乌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8. 《小商品大市场》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9.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0. 陈学文《义乌小商品市场、“敲糖帮”、“义乌兵”三者的关联》2008 年 12 月
11. 傅慧敏《古村落的文化表达》2007 年

（上接第 73 页）多，在永宁塔下，遇到一批上海的游客，我问其中一位游客“你们怎么那么远到这儿来啦？”他说：“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另一位中年女性游客主动搭话说：“现在大城市污染很厉害，这里空气多好，我们是到天然氧吧里呼吸清新空气的。”啊，讲得多好，在许多义乌本地人还远未认识这个天然氧吧的巨大价值的时候，敏感上海人却已经从几百公里外远道而来在这里捷足先登了！

要使这个景区加快建成，真正成为一日游的线路，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冒昧提出以下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

首先是要加强宣传。要叫响一日游。按照一日游线

路的要求进行整体策划。这里既是朝拜圣地，又是休闲胜地，是养生健康的天然氧吧，也是义乌城郊的极佳观景台，要把有关资料汇编成册，让更多义乌人、外地人知道和吸引游客。同时要收集整理历史资料、民间传说，以充实景区的文化内涵。

其次，在每个景点要增加标记，设制简介的碑文，增添必要的配套设施。

再次，青山水库施工阻断了通道，要有引导的标记，并加快恢复原有的石板路。

又次，景区卫生总体上是好的，但有的景点垃圾乱堆放，很煞风景，应该规范景区的垃圾堆放和处理。

# 义乌明清建筑的装修与装饰

黄美燕

古建筑装修有别于现代建筑的室内外装饰概念，现代建筑室内外装饰不分装修与装饰，统称装潢，而古建筑装修与装饰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古建筑装修也称为小木作，是相对大木作而言的，在营造过程中几乎是相对独立的。大木作是对木造建筑的结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而装修尽管对建筑的局部结构起一定的连接等作用，但与受力因素影响不甚大。以柱梁木框架为承重结构的建筑体系中，墙体只起隔断和围护作用，其门窗的大小和形式并不影响承重，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安装和拆卸，这些门窗榻扇在古建筑中就称为装修，古代工匠称为装折。装修的主要功能是对建筑物外观及建筑各部分进行美化修饰，或是根据一定的功能要求对建筑空间进行分割，它是最能体现义乌民居审美特色的部分。

古建筑的装饰是运用一定的工艺和艺术表现形式对建筑的结构构件本身或是建筑的各部分施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和美化，使之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古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古建筑的风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筑装饰，装饰手法的运用不但铸造了古建筑富有特征的外观，更让建筑艺术具有思想内涵和地域文化特性，表现出建筑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征。

建筑装饰大体包括大木作装饰、小木作装饰、墙体装饰、门脸装饰、台基装饰、屋面装饰等内容。大木作装饰又可称作梁架装饰，是对建筑的柱、额、梁、枋、桁、椽、斗拱、牛腿、雀替等大木构件进行雕刻或艺术加工，而且与结构的力学性质相适应，达到结构与美学的统一。小木作装饰实际上就是对建筑装修的部分进行雕刻和美化加工，而且义乌传统建筑装饰的重点在于梁架与装修部分的装饰，体现装修与装饰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 一、明清建筑装修与装饰的特色

从明清建筑的实物调查分析，义乌民居的装修与装

饰重点在厅堂梁架、门面、门窗榻扇以及外檐廊等部位。由于外檐廊是古建筑对外的重要连接通道，也是日常生活、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从欣赏角度看，外檐廊靠着天井采光，光线好，门窗榻扇正对人的视线，视距适中，便于近距离欣赏观看。外檐廊的榻扇门窗，可以随意拆装，居住者可以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阴晴明晦，对温度、通风、采光等不同需求进行自行调节，灵活运用。因此大部分民居限于财力，对檐内装修较为简单朴素，仅对建筑外檐廊的月梁、牛腿、琴枋、雀替、门窗榻扇等作适当的木雕装饰。

从建筑的装修与装饰特点看，义乌传统建筑着力表现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石库台门天井院，木雕榻扇冬瓜梁；镂空牛腿浮雕廊，山水人物雕满堂”。装饰手法是以雕代绘，即以东阳木雕的“清水白木雕”为特色，同时融合砖雕、石雕、堆塑及书法、绘画等工艺美术形式，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地气候、生活、生产和重要资源条件的装修与装饰模式。

### 1. 明清建筑装修与装饰兴盛的原因分析

建筑的装修与装饰古已有之，然其兴盛始于明中晚期，清代达到顶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装饰风格。从总体上分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①木结构梁架建筑体系的成熟为建筑装修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工匠在装修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建筑空间进行随意的自由分隔，并且采用丰富的内外檐装修形式，而不必考虑墙体的承重要求，而且一些原先起结构作用的木构件受力功能退化，几乎变成纯装饰性的构件，比如斗拱。

②木雕技艺的发展为建筑装修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元明以后，大量从事雕版刻画行业的雕花工匠转而从事建筑木雕，并且获得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清水白木雕”为特色的建筑装饰风格。

③工商阶层的快速崛起，为建筑装修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义乌建筑的装修风格中，集中体现为东阳木

雕、门面砖雕、石雕和楹联、壁画等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这也许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斗拱、彩绘、藻井等装修形式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商贾士绅日渐上升的经济地位和富而不贵的政治处境矛盾冲突的平衡，婺州民居这种华而不艳、超凡脱俗的装饰风格正好迎合这种需要。封建制度下士庶阶层普遍要求光大门楣的潜在欲望，在他们营造华堂时借以上述各种表现形式，尽情地宣泄出来，大肆挥霍装修、精雕细刻，留下一幢幢精美的建筑杰作。从义乌现存的明清建筑实物来看，明万历、嘉靖年间是一次建筑的高潮，义乌明代建筑中绝大多数为这一时期的建筑，这与明中叶以后市镇工商业经济繁荣有很大关系。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许多建筑毁于兵燹。直至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随着经济的繁荣，建筑营造业达到鼎盛时期，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装修精致，堪称精品杰作。

④明清民间艺术文化的高度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建筑装饰艺术的题材与形式。建筑被视为一门综合性的技艺。从宋元开始，宗教、文学、绘画、戏曲、雕刻以及园林艺术均获得空前的发展。从元代戏曲、绘画所表现的美学特征看，元代市井文人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而且亢奋，义乌当时也涌现出许多大家，如黄滔、石一鳌、刘应龟等。由于文人写意画的创作与发展，加之元曲中对于故事环境的铺陈，对元代园林风格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元代的园林艺术完全有可能继承前代并较宋时有更新的发展。义乌宋元时期较为著名的私家园林就有宋何恪在官塘南湖营建的西园、宋代喻良能在香山营建的馨园、元代王日煊（1297~1307）在蜀墅塘滨的后塘田心一带建的毅园、胡伯器在苏溪畔建的水竹洞天。这种融园林与建筑于一体的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朝初年。

明洪武元年（1368），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谕中书省：“近代风气相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宜明立禁条颁示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明初厉行礼法统治，对建筑的等级礼法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窒息了艺术创作，园林和建筑装饰的艺术创作氛围受到遏制。明中叶以后，随着市镇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力量的勃兴，统治者对民间文化艺术的禁锢渐渐有所松动，因而在建筑和园林艺术中表现为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形式，江南造园艺术蓬勃兴起，名园迭起，高手辈出。许多名门望族纷纷营建花园别墅，建筑与园林融为一体渐成风气。同时这种清新自然的园林艺术创作很自然地就成为明清建筑雕刻中山水亭阁小景的表现题材。另外像佛道人物、神话故事、文学小说、戏曲典故以及传统的博古吉祥图案无不入画，成为建筑装饰的表现题

材，并以更自由丰富的形式加以表现，从而创造出以粉墙黛瓦、马头错落为外观形式，以黑白灰为色调，将石雕、砖雕、木雕“三雕”艺术和书画楹联等艺术熔于一炉的、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建筑装饰风格。

⑤明中叶以后实施的匠役制改革使工匠获得人身自由，为建筑装饰释放出巨大的创作潜能。工匠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拥有过硬的手艺才能揽到更多的活计，这样就促进了建筑质量的提升，从而在经历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后，涌现出许多不计工本、精雕细琢的建筑精品。

## 二、装修的主要形式与分类

### 1. 装修的主要形式

按装修所处的空间位置来分，大致分为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外檐装修一般是指处于室外或是分隔建筑物内、外两部分的分隔物，如门、窗、户、牖等，具体包括大门、随墙门、屏门、榻扇、帘架、风门、槛窗、牖窗、什锦窗、横披窗、栏杆、挂落、楣子罩、门罩等多种形式，起到防护、通行、采光、通风和分隔空间等作用。外檐装修应用于室外，易受风吹日晒，雨淋虫蛀，故在用材断面、雕镂、花饰、做工等方面均要考虑这些因素。内檐装修应用于室内，是建筑物内部若干部分的间隔物，如碧纱橱、博古架、屏风、太师壁、护壁板、几腿罩、圆光罩、八角罩以及天花、藻井、牌匾等都属内檐装修。内檐装修不是用以避风雨寒暑的，要求尽量与家具陈设搭配协调，风格一致，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因此在用料、做工、雕刻等方面要更加精细。

按装修所用材质来分，包括木作装修、石作装修和砖作装修。其中木装修是重点，是指建筑结合构架和构件的形态，利用木材质感进行雕刻加工、丰富建筑形象，或是根据一定的使用功能，对建筑的空间进行分隔的一种装修门类。砖、石装修多用于建筑立面的门窗等部位，一般采用石雕和砖雕工艺。古建筑木装饰除了有装饰性强的特点外，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柱间可任意分隔，装修形式自由灵活，既可以作满装修，也可不安装修；二是木装修可任意拆装移动，不影响结构受力。

### 2. 装修的种类

装修的种类品种繁多，按装修的功用来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7类：①板门类，包括实榻门、棋盘门、屏门；②榻扇类，包括榻扇、帘架、风门、碧纱橱等；③窗类，包括槛窗、支摘窗、牖窗、漏窗、什锦窗、横披窗、楣子窗等；④栏杆、挂落类；⑤花罩类，包括几腿罩、落地花罩、花牙子罩、落地罩、栏杆罩、床罩、门罩等；⑥天花、藻井、船篷轩类；⑦其他类，包括板壁、太师

壁、屏风、博古架及楼梯等。

结合义乌现存的建筑实例，按工艺性质和特点对建筑木装修重点介绍如下：

### (1) 板门

板门分好几种，常见的有实榻门、棋盘门、撒带门、屏门等形式。

实榻门常用作大门，一般为双扇对开。义乌本地作法通常不用边框，里外均用同一厚度（5~7厘米）的杉木板，打眼穿暗梢固定拼装组成实心门。也有少数用外作边框、两面包镶铁皮、用门钉固定的作法。门钉采用7路，安七七四十九个门钉，门上安铺首、门钹、门环之类的铜铁饰件。

棋盘门也叫攒边门，门的四周边框采用攒边，装板心，背后穿带，多用作屏门或室内外隔断门，分双扇、四扇或六扇安装，在厅堂、祠堂类建筑装修中很常见，一般厅堂明间装修用6扇，次间4扇，梢间或尽间用2扇。

撒带门通常也称板门，单扇，由门心板和门轴带一门边组成，门的一边连着门轴，没门边的一头，穿带均撒着头。多用于普通民居的屋门、房门或临街房屋的街门。

屏门也称镜面板门，是一种用较薄的木板拼攒起来的两面光、不带门轴和门边的板门。通常板厚约1.5寸，板缝拼接采用企口，看面为镜面板，背面用4根穿带固定后，将穿带高出门板的突出部分刨光，使门板表面平整。屏门的安装方式与实榻门、撒带门等有所不同，它是从门口内安装，因此上下左右都不加掩缝，屏门装修依建筑面阔大小分每间4扇或6扇，门扇尺寸较窄，门扇尺寸按门口宽均分四或六等份，门扇高同门口高。屏门常安装于明间金柱间用作太师壁，或用于厅堂、祠堂的外檐，边楣的板壁，作为室内外隔断，可根据需要任意拆装，其作用是遮挡视线，分隔空间。

排门，也称街面门，是一种类似屏门的用木板拼攒起来两面光的板门。两边不带门轴和门边，可从里面拆卸或安装，多用于临街店铺的店面门，一般与撒带门配合使用。门板尺寸较窄，但门板厚度较屏门厚。店铺开张营业时，从撒带门出入，再从里面撤下排门，摞放于一起，根据开间大小用4扇或6扇。

### (2) 槛窗、榻扇

槛窗、榻扇普遍用于外檐装修，一般配套使用。榻扇又称榻扇门、格扇门或隔扇门，是指镶嵌通花格子的门，宋代叫格子窗。榻扇是由古代称闾扇的木门、竹门演变而来的，原来并不是指格子门。《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闾扇。”注云：耕事少闲而治

门户也，用木曰闾，用竹苇曰扇。闾扇发展为榻扇，是因为古建筑的门兼有窗的功能，糊上纱或纸的通花格子既能挡风又能透光。古代室内采光主要靠门而非窗，榻扇是为取得透光效果而创造出来的门窗形式。

榻扇主要由边挺、抹头、格心（花心）、绦环板、裙板等基本构件组成。装修时根据开间大小，每间可做2扇、4扇、6扇或8扇，榻扇2扇为一椽，即每间一椽、二椽、三椽或四椽。普通民居每间的装修一般分为2椽或3椽，4椽多用于开间较大的厅堂明间外檐装修，而且一般采用落地长窗，各椽之间由间框隔开。安装榻扇的立框，宋代叫棂子，清代叫边挺，横的叫抹头，边挺和抹头构成榻扇的框架。边挺和抹头的长度比例大约为1:3或1:4。榻扇抹头分二抹、三抹、四抹、五抹和六抹，抹头的数量代表榻扇的形式。榻扇通常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安装透光的通花格子，称为格眼或者花心、格心；下段多半装实心的木板，宋时叫障水板，清则叫裙板。若榻扇很高，在花心和裙板之间再另加一条腰带，宋时称腰华板，清代叫绦环板，有的还在格心上面或裙板下面再加绦环板。当地工匠称绦环板为索腰带，是指安装于两个抹头之间用于填补榻扇空当的长条形花板，一般浅浮雕或薄浮雕花鸟或人物故事等。义乌民间最普遍的是五抹和六抹榻扇。有的明代建筑，上下整片全部用方格子的格心，称为落地明造。裙板多为素面，但也有带雕刻的，如朱一新故居榻扇裙板采用烫漆画工艺装饰文人诗画，多为他本人的作品，押“一新”方印。格心是榻扇上透明的部分，在边挺和抹头内再安仔边，仔边内安纵、横两向的支条，组成格心图案的木条或雕刻就称为棂，清代叫棂子，因而整个图案就叫窗棂。窗棂的形式和图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通常有两种作法，一种叫平棂，就是用矩形木条构成各种纹样；另一种是菱花，即采用木雕工艺雕刻出菱花、槐花、迷文等花纹。义乌明清民居中最常见的是平棂窗，也有做工考究的破棂子窗，是较早期的作法，但在明清建筑中均有所见，是一种做工更考究的直棂窗，是用整块木板剔挖掏空雕刻而成的。它的特点是纵向支条的断面是矩形木条，做成中间起楞的棱形断面。早期建筑普遍的用一码三箭直棂窗。除了棂窗，还有采用木雕或用细棂条拼斗成卍纹锦、灯笼框、步步锦、三交六椽、双交四椽、迷文等各种图案，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为透明又能防尘，榻扇内常做成纱屉，用作糊纸或夹窗纱；有的做成内外夹椽的形式，外面镂空雕榻心，内椽用上下可推卸的板窗；民国以后也有在纱屉内安玻璃的。在边挺与中间抹头相接处常钉上看叶和带钩花的钮头。榻扇一般向内开，在边挺上下要安装转轴，分别与槛框上的连槛、栓斗交待，以便开关。

古建筑装修中，槛窗是用槛框安装在槛墙之上的窗，多与榻扇门共用，或用于楼上的外檐装修，下面采用板壁，上面装槛窗。槛窗相当于把榻扇门的裙板去掉，安装于槛墙之上。槛墙是指窗下的矮墙，槛墙的高度由裙板的尺寸定。槛墙上的窗台板叫榻板，宋时叫槛面板。榻板之上加风槛作为窗框，风槛宋时称为腰串。槛墙有用板壁的，也有用青砖混水墙砌的。一些大户人家的厢房走廊正对天井的外檐装修十分讲究，金枋下装修采用2棹或3棹榻扇门，檐枋下装修采用镂空棂花的槛窗，槛墙采用磨砖干摆或丝缝砌筑的清水墙，有的采用青石板砌筑槛墙，十分精致豪华。

槛框是从古代木骨泥墙の木骨架——壁带演变而来的，是用于安装门窗、榻扇、槛窗的框架，处于水平位置的横向构件叫槛，上接檐枋或金枋的叫上槛，下贴地面的叫下槛，位于上下槛之间偏上的跨空横槛叫中槛。左右竖立的垂直构件叫柱或框，紧贴柱边的边框叫抱柱或抱框，大门抱框多用石材，最常见的是用青石抱框，也有用猪血石抱框。用于室内外的榻扇抱框一般用木材。在面阔较大的开间中，还有分间的间柱。槛框当中，下槛是紧贴地面的横槛，是安装大门、榻扇的重要构件。中槛一般位于门扇的高度上，安装门窗时，要根据门窗的宽度安装两根门框或窗框。为安装能水平转动的门扇，需在中槛里皮附安一根横木，在上面做出门轴套碗，称为连槛。在连槛安装大门时，还需要用栓木将中槛和连槛锁合牢固，用于锁合连槛和中槛的栓木构件就称为门簪。门簪都是成对使用的，民间俗称户对。由于门簪的数量往往与大门的大小和重量有关，普通的大门一般用一对门簪或不用门簪，较大的门一般用2对，因而成为屋主身份地位的象征。门簪用于建筑的大门上，往往在其表面做些雕饰，一般呈六角形或梅花形，看面上雕四季花卉、福禄寿喜等吉祥图案或文字。

### (3) 支摘窗、风门、横披窗

支摘窗一般用于普通民居的外檐装修，在檐墙上居中安装间柱，间柱上端交于上槛，下端安在榻板上，抱框和间柱之间安支摘窗。支摘窗分上下两段，上段为支窗可支起，下面为摘窗，可以取下。支摘窗在义乌民居中不多见。

风门是指住宅居室或厨房门外用于遮挡鸡鸭狗等畜禽出入的辅助性门，一般门高仅有榻扇门之半，单扇，一侧安门轴，另一侧安门环搭扣。

竹箬是一种竹编的簾子，义乌民间常用这种竹箬代替风门，俗称簾门，上面还装饰各种图案或文字，最常见者有“满江红”、“团结”、“东方红”之类，一般用竹箬编成细密的带小孔的网状，其功能类似风门，一般

在夏天使用，上面安两个钮，可以悬挂在钩上，可随意装卸。挂上簾门时，里面的门可以完全打开，用于遮挡外人的视线或畜禽出入，同时又具通风采光的功能，夏天用较为凉爽。

横披窗是安装于上槛与中槛之间的窗扇，往往与榻扇门配合使用。明清时的横披窗，通常为固定窗，不开启，起亮窗作用，由外框和仔屉两部分构成，一些讲究的横披窗仔屉内外两层，里面安装镂空网纹的竹编，外面装镂空无限纹锦的窗棂，如廿三里街道陶店村慎修堂正厅前檐用于遮挡阳光的横披窗。横披窗在一间里的数量，一般比榻扇与槛窗少一扇，通常为3扇，仔屉间由横披间框分开，也有不分仔屉的长条形单扇横披窗。有些古建筑的外檐装修，门头和榻扇以上用固定的走马板，上面阴雕文人画，多以梅兰竹菊题材为主，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如新南山民居内的阴雕烫漆文人画：兰花和书法诗句）。

### (4) 什锦窗、牖窗

古代窗写作窗。《说文》释曰：“在墙曰牖，在屋曰窗。”据考证，古代开在墙上能开阖的叫牖，在屋面上不能开阖的叫窗。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窗，古代都称为牖。古代的牖一般都很小，相当于气窗，通风采光主要依靠户或说“阖扇”来承担。《淮南子》曰：“十牖之开，不若一户之明。”书中又说：“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受光于户，照室中无遗物”。直到后来，榻扇发展为落地长窗。

什锦窗又称漏窗，大致可分为镶嵌什锦窗、单层什锦窗及夹棹什锦窗三种形式。镶嵌什锦窗是镶在墙壁一面的假窗，不能开启，不具备一般窗户的通风、透光功能，只起装饰墙面的作用。义乌早期建筑中还有一种不能开启的盲窗，类似直棂横披窗的形式，如义亭镇何店村何桐生民居楼上的单扇直棂盲窗，固定安装于檐墙上，起通风采光的作用，但不能随意拆卸。单层什锦漏窗是用于庭院或园林内隔墙上的装饰花窗，通过在隔墙上设置这种漏窗，使隔墙两侧的景观既有分隔又有联系。什锦漏窗本身又是一种装饰性极强的装修，且有框景的作用，义乌厅堂民居的院墙和照墙上常安装这类漏窗，漏窗的花心常采用石雕或砖雕装饰，十分精美雅致。如大岭蓉竹公厅立面檐墙上的青石漏窗、大陈凰升塘村一木厅的砖雕漏窗、后宅前傅村承吉堂分隔中路厅堂与两侧厢院照墙上的砖雕漏窗。夹棹什锦窗在窗框内安装两层仔屉，仔屉内镶嵌玻璃或糊纱，其上题字绘画，仔屉贴墙的两个面安装，中间安装照明灯，故又叫灯窗。牖窗在厅堂民居的照墙、院墙和立面墙上运用较多，是设置于房屋壁面上的装饰性窗，常见的有方窗、圆窗、六面

窗、八面窗、扇面窗、海棠窗等，一般设内外两层，内层用榻扇或小推窗，可以启闭，外面用石雕或砖雕漏窗（如黄山八面厅、培德堂等建筑的漏窗）。

#### (5) 栏杆、挂落

栏杆古作阑干，阑干者，纵横也，纵木为阑，横木为干。阑是指门遮，也含拦阻的意思，横木的干古代又称为楯和杙，在汉魏六朝时期，栏杆多用槛或阑槛称呼，槛的本义是指牧场中圈养牲口的畜圈，后来借用作称呼房屋住宅中纵横围护的阑干，古代栏杆分阱槛、轩槛、槛椳及阶槛，分别代表栏杆的不同形式。阱槛是指用方格子通花图案的栏杆，轩槛用的是实心栏板，槛椳是指直线组成的框格，阶槛是阶梯两侧的扶手栏杆。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清平调词三首》中有“春风拂槛露华浓”及“沉香亭北倚阑干”的诗句。从诗意上分析，槛与阑干均指栏杆。从浙中地区出土的婺州窑青瓷明器来看，栏杆在东汉时期就已在住宅中使用了，开始多用于院落和台基四周的围护。据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载，唐大和年间（827~835），东阳冯家楼村的冯宿、冯定两兄弟曾分任吏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其宅院“高楼画栏耀人目，其下步廊几半里”，可见唐代豪华宅院中已采用“画栏”作为楼上外廊的装修。

栏杆的基本构造是由望柱、寻杖和地袱构成的一个横向槛框，最初纵向的阑渐渐演变成望柱，称为干或楯的横杆用作扶手就发展成为寻杖，位于底下的横杆就成为地袱。望柱、寻杖和地袱构成了栏杆的主要边框，所有栏杆的形式变化主要反映在栏杆框格内的图案变化。工匠对于栏杆图案和虚实的变化主要是基于建筑立面的构图配合、使用要求和当地装饰趣味等方面的考虑。

栏杆作为古建筑外檐装修的一个类别，具有围护和装饰功能，在明清、

民国时期建筑中均有应用。按位置分，有一般栏杆和朝天栏杆两种；按构造作法分，有寻杖栏杆、靠背栏杆、花栏杆等种类；按材质可分为木栏杆和石栏杆等种类。从历史上看，木栏杆早于石栏杆出现，石栏杆起初是仿木构的，到清代就逐渐改变为更符合石结构材料的应有形式。

义乌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是一般栏杆，朝天栏杆在古建筑装修中用得不多，是指安装在建筑平台屋面边缘的装饰性栏杆。义乌传统建筑用坡屋顶，因此一般不用这类朝天栏杆。从现存实物来看，寻杖栏杆在明代建筑中用得较多，一般用于建筑的外檐廊装修，安装在楼上檐柱间。石栏杆一般用于桥、亭或墓葬的碑亭两侧等部位。

寻杖栏杆在宋代称为勾栏，也作构栏、钩阑、钩栏、钩肆等，今称栏杆，分单勾栏和重台勾栏两种，有石造和木造之分。重台勾栏是指上下作两重华板的勾栏。《营造法式》中写作重台钩阑，其构件由望柱、寻杖、瘦项云拱、盆唇、束腰、地袱、蜀柱、大小华板、地袱等构件组成。在地袱之上、束腰之下的地袱间安小华板，在束腰之上、盆唇之下的蜀柱间安大华板。其中地袱是位于栏杆最底下贴着地面上皮安装的一根横木，宽度等于或略大于望柱尺寸，两端交于檐柱根部。望柱与栏杆均安装在这根地袱上，地袱贴地面需做出水口用于廊内雨水排放。望柱是寻杖栏杆的龙骨，是附着于檐柱侧面的小方柱，柱径约为13至16厘米，或以檐柱径 $3/10$ 定分。望柱高约1.3米，栏杆的水平构件都安装在望柱内侧。寻杖扶手是安装于寻杖栏杆最上面的一根横木，高度在1米左右，断面多为圆形，直径约为6至10厘米，两端做榫交于望柱。盆唇和束腰是位于寻杖和小华板之间的上下两道横枋，断面呈方形，尺寸等于或略小于望柱。在盆唇和寻杖之间的跨空当内安装瘦项云拱，瘦项云



佛堂田心培德堂方形石漏窗



黄山八面厅木雕



余大宗祠深浮雕牛腿

拱常雕成荷叶净瓶形状，靠望柱为半个荷叶净瓶。单勾栏在盆唇与寻杖间也有采用撮项云拱，撮项是指云拱下面做成束腰形状的装饰性构件，这个构件在清以后的勾栏中很罕见。义乌明代建筑中仍见有槛栏的形式，束腰和地袱之间装槛框栏板，不安大华板（如义亭陇头朱的明代官厅厢房外檐廊勾栏）。小华版也称为滴珠板，常镂空雕卷草如意纹或如意云头，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为增强勾栏的整体性，有的栏杆荷叶净瓶与蜀柱相对，并且净瓶与蜀柱使用同一根木条，蜀柱用双榫，净瓶上面用透榫，与荷叶连结。大华板又称为缘环板，是安于盆唇和束腰之间的装饰性花板，一般分作3至5当，两当之间用蜀柱分隔开，常浅浮雕缠枝花纹、卷草如意纹、梅兰竹菊或麒麟、松鹤、仙鹿等祥瑞动物图案。

靠背栏杆别名坐凳栏杆、鹤颈椅，义乌民间俗称美人靠，主要由靠背、坐凳面和拉结件等构件组成。在清末民国时期建筑中较常见。一般安装于建筑楼上或楼下的外檐柱间，用于建筑外檐廊装修。园林中在楼台、亭子、游廊或花边水榭等建筑中也常用这种带靠背和坐椅的栏杆，和古代称作水槛和坐槛者相类，可供游人坐下休息小憩。美人靠的形式按靠背部分装饰性根条的样式不同，可区分为勾片式、S形曲棍式、宝瓶式、车圆木式，这些样式在义乌民居中都有所见（如吴棋记民居的靠背栏杆）。

花栏杆的构造比较简单，主要由望柱、横枋及花格根条构成，常用于住宅、园林和桥亭等建筑中。花栏杆的根条花格样式很多，最普通的是用直根条作栏杆，称为直根栏杆，民国建筑中常见的是车圆木宝瓶式直根栏杆。除此以外，还有卧根栏杆、勾片栏杆、华版栏杆等多种。勾片栏杆图案十分丰富，常见的有冰裂纹、盘长、井口字、步步锦、龟背锦、卍纹锦、葵式乱纹等。

挂落是一种装饰性构件，也称倒挂楣子，既用于外檐装修，也用做内檐装修，有木雕、砖雕和石雕等不同种类，常用于建筑外檐楣枋、游廊柱间、垂花门上首的垂花柱间、祠堂内放置神主牌的神龛上面、戏台额枋的下面以及建筑门面的封檐、牌坊或牌楼的大额枋下面等重要装饰部位（如宗氏家庙寝堂神龛上面的挂落罩），常用镂空的根格或装饰花板做成，或者用细小的木条搭接而成，用作装饰或同时分隔室内空间。挂落一般由边框、根条以及花牙子等构件组成，有的还使用垂花柱形式，按所处位置不同，采用不同的材质。花牙子是安装在挂落立柱与横枋交角处的装饰件，通常做透空双面雕，常见的花纹有玉兰、一根藤、草龙、祥云纹等，同时在其间嵌团花或其他吉祥图案（如朱一新故居的挂落）。

#### (6) 花罩、碧纱橱

中国古建筑是按通用性设计的木骨架结构，室内空间可以根据使用要求，用碧纱橱、花罩、屏风和博古架等木装修形式进行灵活分隔，隔出的各种空间，讲究光线明暗、画堂深浅等光影和韵律的变化。

花罩、碧纱橱属小木作装修，一般用于古建筑的内檐装修，主要用于分隔室内空间，并有很强的装饰功能。除此以外，还有安装于檐柱和走廊门等外檐装修部位的其他花罩，主要起装饰美化作用。由于花罩、碧纱橱做工考究，往往集木雕、镶嵌、书画等工艺美术于一身，因此又成为室内重要的陈设艺术品。

花罩多用于进深方向的同一楹柱间，用于分间，造成室内各间既有联系又互相分隔的环境气氛，达到室内空间若隐若现、明暗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按花罩的形式分类，主要有几腿罩、栏杆罩、落地罩、落地花罩和檐罩、门罩等。

几腿罩是由槛框、花罩和横披等部分组成的，一般用于进深不大的房间，其特点是整组花罩仅有两根抱框，由抱框与上槛、挂空槛组成几案式的框架，两根抱框恰似几案的两条腿，故称几腿罩。上槛和挂空槛之间的固定装饰花板称为横披，横披的装饰题材一般与居室环境相协调，挂空槛下面多采用镂空的花牙子装饰。

栏杆罩主要由槛框、大小花罩、横披、栏杆等部分组成，在同一楹柱间安两根落地的抱框、两根边框，将进深方向划分为中间为主、前后为次三开间的形式。中间部分形同几腿罩，两边次间上面安透空的花罩、下部安寻杖栏杆，将整个空间分为前中后三楹，避免因跨度过大造成空旷的感觉。在两侧立边框装栏杆，也便于室内家具陈设布置。

落地罩形似栏杆罩，是一种室内满装修形式，富豪、官宦府第和文人的居宅用得较多，一般用于进深较大的房间。落地罩主要由槛框、大小花罩、横披、榻扇、须弥座等组成。一般在前后檐柱或金柱间立两根抱框，沿抱框内侧各安装一扇榻扇，榻扇下置须弥座。上槛与挂空槛之间安横披，挂空槛下的花罩一直向下延伸，落在下面的须弥座上。

落地花罩是一种豪华的装修形式，采用室内满装修，虽形似几腿罩，但花罩自挂空槛向下沿抱框一直延伸，落在下面的须弥座上。落地花罩一般在中间开洞门，洞门形式千变万化，除了普通的长方门，还有月洞门、圆光门、八角门、海棠光门等各种随形门。落地花罩较一般的落地罩和几腿罩更显富丽豪华。

其他花罩是指除上述几种常见的花罩形式以外，用于建筑外檐装修部位的花罩，如黄山八面厅南北边廊前檐花罩、朱一新故居廊弄门罩。

碧纱橱这种装修形式由来已久，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赠王处士》诗中有“松树当轩雪满地，青山掩碧纱橱”这样的诗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醉花阴》一词中也提到过“纱橱”，“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金元散曲中也曾多次提到碧纱橱，如元代马致远写的《四公子宅赋·秋》中云：“碧纱人歇翠纨闲，觉后微生汗。”胡祇遹的《小令·四景》中写道：“纱橱睡足酒微醒，玉骨冰肌凉自生”。明代金銮的《萧爽斋乐府》中是这样描述碧纱橱的：“碧纱橱，低映月儿明”。从上述引用的几则碧纱橱来看，碧纱橱起先不似清代一般所指的室内装修榻扇或格门，而是作为帷幃之类用于纳凉或睡眠时的防蚊用具。事实上碧纱橱在清代也非专指榻扇之类的室内装修，如清代曹雪芹著的《红楼梦》在黛玉初进贾府章回中也曾提到贾母安排黛玉睡在碧纱橱里，人民文学版的注释为：“帷幃之类的东西，用木头做成架子，顶上和四周蒙上碧纱，可以折叠，夏天张开摆在室内或园中，坐卧在里面，可避蚊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其诗《竹簟》中也提到纱橱：“七尺桃笙帖腹便，消除一日夜凉前，故乡此物非殊贵，不设纱橱恣意眠。”说明纱橱在清代仍可指帷幃之类的东西。后来由帷幃之类的东西演变为榻扇之类的室内装修，通常用于进深方向同一榻柱间，起分隔空间和室内装饰双重作用。

碧纱橱名称的由来，据考是由于古人常在格心上糊青白二色的绢纱，再在绢纱上绘画、题字，所以叫碧纱橱，或称纱隔（如佛堂新南山民居的碧纱橱）。碧纱橱主要由槛框、榻扇、横披等部分组成，每檯碧纱橱由六至十二扇榻扇组成。除中间两扇能开启外，其余均为固定扇。在开启的两扇榻扇外安帘架，上安帘子钩，可以张挂帘幔。碧纱橱榻扇的裙板、绦环板上做成各种精细的雕刻，有的还镶嵌贝雕和珠宝玉石等，仔屈用两面夹纱，上面装饰花卉翎毛、珍禽祥瑞、人物故事、博古吉祥等各种绘画或题写诗词歌赋等，装饰性极强，深得文人雅士喜爱。

#### (7) 板壁、太师壁、博古架

板壁是古建筑中最常见的小木作装修，指用于室内外空间隔断的木板墙，多安装于进深方向柱间，由边框、木板和壁带组成。有时为防止大面积木板变形，常将板壁分成若干块，做成裙板或穿壁带的障水板形式。有的板壁做工非常精致，在柱间立横竖边框，然后将整檯板壁用楞木分成若干块，两面刨光，在表面施油漆、烫蜡，钹阳字、绘画、十分古雅。如朱一新故居书房的板壁。

太师壁是安装于厅堂或公共建筑明间后金柱间（俗称中堂）的壁面装修，一般采用板壁或屏门的形式，在上面题字挂画。太师壁前陈放条几案（俗称横披）、八仙

桌、太师椅等家具及各种陈设，两旁有便门可以出入。

博古架又称为多宝格，是一种兼有装饰和家具双重功用的室内木装修，安装于进深方向柱间，多用于室内分隔空间，一般在书房使用较多，如朱一新故居书房中就用博古架木装修。博古架通高在3米以内为宜，通常上段为博古架，下为壁橱，里面可储存书籍器皿。博古架采用格板分隔成各种大小形状不一的花格，在上面陈放香炉、花瓶等各种博古器皿之类，古色古香，为文人雅士所喜爱。

#### (8) 天花、藻井、船篷轩

天花、藻井和船篷轩常用于厅堂、祠堂、署廨、寺观或戏台等重要建筑的顶棚木装修，可用于内、外檐装修。

古建筑采用坡屋顶，对于室内顶部的处理一般采取两种作法，一是不加顶棚，梁架椽望等木构架全部露明，叫彻上明造作法；另一种是加一层顶棚把梁架椽望等遮住。义乌传统民居多为楼房，室内一般采用楞木上铺楼板的形制，天花不很常见，仅见于厅堂、祠堂等重要建筑的檐廊以及戏台、寺观等较尊贵建筑的顶棚，作为外檐装修。天花又叫承尘、仰尘、平棋或平闇，有保暖、防尘、限制室内空间高度以及顶棚装饰等作用。宋代按作法不同分为平棋、平闇和海幔3种，明清一般分为井口天花、海幔天花两类。

从明清建筑实物来看，义乌民居中属井口天花用得较多，而海幔天花很罕见。井口天花是指由天花贴梁和纵横支条作为龙骨，把顶棚分为井字形，一般居中为大井口，两旁为几个小井口，再在龙骨上安装天花板，天花板上雕刻团龙、团凤、仙鹤以及四灵神兽等各种图案的作法。

有的祠堂建筑的戏台和门厅照厅顶棚采用天花与藻井配合使用的作法，戏台顶棚中央采用斗八藻井，旁边施天花，天花上仿海幔天花的形式，绘制成若干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饰彩绘图案。

藻井是室内天花的重点装饰部位，是天花向内凹进为穹隆状的装饰，常用于戏台天花中央或是佛殿等庄严建筑的佛龛上方。藻井的使用历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唐六典》正式规定：“非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藻井名称最早见于汉赋中，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器用》中记载有藻井的一些别名：“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除此以外，藻井还被称为天井、龙井、方井、圆井等。《风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束井之像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压火灾也。”可见，藻井最初除了装饰，还兼具避火厌胜之物。宋元时期普遍采用斗八藻井的形式，即由八个面

相交，向上隆起形成穹隆式顶，分斗八和小斗八两种。明清时期藻井形式较多，有方井、圆井、八角井等，且构造复杂，装饰华丽。有的藻井造型分上中下三层，最下层为方井，中间为八角井，上部用圆井或八角井，且每层之间使用斗栱，雕刻精致，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如大陈红峰村金氏宗祠戏台藻井)。有的藻井不施斗栱，而以木板层层叠落，既美观又简洁大方。

轩，也叫船篷轩，它既是一种室内木装修的种类，也是一种具有概念性的建筑形式，在本书第三章已述及，兹从略。

(9) 楼梯 义乌传统民居多为楼房，楼梯是建筑间垂直交通供上下楼使用的踏步，属内檐木装修。一般由连续梯级的梯段(又称梯跑)、平台和围护构件组成。义乌古建筑中多用木楼梯，一般由楼梯帮、楼梯踏步、梯级、栏杆扶手、平台等构件组成。按形制一般分为单跑楼梯、双跑楼梯和多跑楼梯，梯级的平面形状以直线为主，折线较少见，而曲线楼梯、螺旋形楼梯等形式是在现代建筑中才使用的。义乌民居普遍为长条形建筑，故楼梯设置以直线楼梯沿建筑长向布置为主，多设在洞头屋梢尽间，称楼梯间，两边对称设置，这也是从消防疏散的要求考虑的。其中单跑楼梯最为简单，应用也最普遍，适用于层高较矮的建筑。双跑楼梯是采用休息平台的，以双跑直上和双跑双折两种形式为主，在公用建筑中应用，民居中不太用。木楼梯有暗步式和明步式两种，踏步镶嵌于楼梯帮凹槽内的称暗步式，踏步钉在楼梯帮三角木上的为明步式，本地以暗步式最为常见。楼梯的作法有一定的要求，楼梯踏步宽约30厘米，梯级15厘米，楼梯坡度一般选20至45，以30最为适宜。楼梯扶手视安全考虑，栏杆高度不少于90厘米，靠楼梯井一侧水平扶手超过50厘米长时，其高度不小于1米，多采用直棍扶手栏杆。

### 三、建筑装饰艺术

中国古建筑向来注重装饰，总的来说，可以简单归纳为金饰、绘饰和雕饰三大类。建筑彩画比独立的绘画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木结构表面采用油漆和彩绘装饰也是为更好地保护木结构本身。战国至秦汉时期，金、玉、象牙、宝石等贵重材料就应用于建筑装饰，以至达到奢靡的程度。《管子》曾写过一篇《侈靡》论，提出“上侈而下靡”的观点，主张大量消费以活跃经济。在本书另一篇文章中就有“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财不

散”以及“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等说法，当时，美其宫室之风盛行。《汉武故事》中就有关于宫室椽头装饰的记载：“椽首皆作龙首，衔铃，流苏悬之”。建筑雕刻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中国建筑木造结构具有适于雕刻的特点，很自然地发展出建筑木雕装饰，而且历代文献都有关于在建筑中采用木雕、石雕，在彩画上贴金以提高装饰趣味的记载。当然，建筑装饰的应用起初主要在皇宫和王公贵族的府邸应用，是古代“宅分等第<sup>①</sup>”制度的一种体现。

义乌传统建筑装饰具有很明显的地域风格特征，其主要形式不外乎色彩、材料和工艺三个方面的综合运用。色彩装饰包括油漆、彩画、鎏金、烫漆、描金、勾线、粉刷、墨画等；材料装饰大体包括木、石、砖、瓦、琉璃、石灰、石膏以及金属什件等不同材质在装饰工艺上的应用；工艺方面主要采用雕刻、绘画、堆塑和书法楹联等工艺和艺术。

#### 1. 色彩的运用

色彩的运用在中国古建筑装饰中是十分考究的，而且自古就带有封建伦理色彩，是古代宅分等第制度的一种体现。义乌传统建筑在色彩装饰方面虽然有别于官式或其他地区，但同样具有文化上的特殊含义。总体来看，义乌传统建筑在色彩方面以建筑材料原有的色彩为主，人工填涂的色彩为辅。建筑物的颜色很大程度上是由材料本身带来的，砖瓦、木材、土石、石灰、金属等均各有其色，在“五材并举”的混合结构中，便自然地形成多种色彩。加之不同建筑在材料选择上的差异，很自然地就形成色彩方面的多样性。民居建筑外观多以黑、白、灰为主色调，采用粉墙黛瓦，在大块面的白色粉墙中，选择出入口、窗罩、封檐和脊吻等部位适当做一些装饰。色彩元素习惯用黑、白、灰、青绿、朱红和土黄色等诸色，色彩搭配以白色粉墙、青砖、黛瓦、青白石、墨线勾画为主，清末民国建筑也有采用彩画作为壁画的装饰形式；建筑内部多以木材的本色为基调，保持木材的原有纹理，或用桐油或清漆髹饰，一般不采用彩绘或披麻捉灰打地仗的油漆工艺。宗祠和寺庙建筑有别于民居建筑，在色彩方面往往大胆体现色彩亮丽和绚烂的风格。外墙多用土黄色粉刷，屋面铺小青瓦。有的建筑内部还采用油漆、彩画、描金、鎏金、彩塑、贴金箔等装饰工艺，在梁架上施青绿或五彩遍装彩画。尤其是寺庙建筑，在佛像和建筑梁架等部位充分运用色彩加以装饰。

当然，在古代封建社会，色彩的运用是受到封建等

<sup>①</sup>宅分等第制度始自《周礼》，后来历代均有相关规定。如《唐会要》记载：“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差。”

级限制的。例如，“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同时还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不许用斗栱，饰彩色。”（《明史》卷68，“志第四十四”、“舆服四”）。由此看来，官员府第仅限于官阶居1~2品、位居王侯或贵为三公者，才允许施斗栱、青绿彩绘，但禁用重栱，绘藻井。3品以下官员府第和庶民庐舍禁用斗栱，饰彩绘。

中国建筑的色彩文化与古代对阴阳五行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认为不同的色彩是天意或天德的象征。五行学说将金、木、水、火、土归为五行，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皆由五行应运而生，并且将五行与季节的运行、方位的变化以及色彩的分类相对应。例如，木对应春季、东方和青色，火对应夏季、南方和赤色（红色），金代表秋季、西方和白色，水代表冬天、北方和黑色。土居中央，代表黄色。因帝居中央，故黄色在建筑上受到严格限制，一般仅限于皇宫和寺庙建筑使用，民居中禁用黄色，体现帝王和神佛的庄严和辉煌。白色多用于墙体粉刷，内部装饰极少用白色，而且仅限于南方建筑中使用。除了宗教和礼制建筑外，义乌民居大概是受朱熹“大抵圣人一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的思想影响，追求平淡自然的美学理想。尤其是住宅民居，在色彩装饰风格方面体现素净淡雅的特点，比较富于理性精神。

#### 2. 材料的运用

义乌传统建筑是以木构造为体系的，由于木、石、砖具有适于雕刻的特点，因此其装饰艺术风格也体现与材料相适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木、石和砖为主要装饰材料，综合运用各种技法和工艺，将民俗文化融入到雕刻题材和雕刻图案中，对建筑的台基、屋身和屋顶采用不同的材料进行装饰，“三雕”艺术并举，形成独具浙中民居特色的装饰艺术风格。清末民国以后，一些建筑的门面和山花、封檐等部位采用灰塑、石膏堆塑等装饰材料和装饰工艺，同时在门窗等部位还采用一些金属什件装饰，如大门中用门钉、铺首、门钹、门环、海窝，榻扇中用看叶、角叶、鹅颈等装饰。

#### 3. 工艺的运用

义乌传统建筑装饰工艺主要可分雕刻、绘画和书法三大类，具体包括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石膏堆塑、彩塑、篆刻、油漆、壁画、彩画、书法楹联等工艺和艺术，同时往往又在木雕中综合运用镶嵌、描金、点彩、贴金箔等工艺，如在狮子眼睛中镶嵌琉璃宝珠，在人物雕刻的头发、唇和衣服纹饰等部位加以点彩，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描金、贴金箔往往与木雕、彩画相结合，

主要用于宗祠和寺庙建筑的装饰。金属篆刻工艺主要应用于建筑门窗部位的金属饰件，在看叶、角叶、铺首等饰件表面篆刻吉祥纹饰。

### 四、建筑木雕

#### 1. 东阳木雕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及其时代特征

义乌传统建筑在所有的建筑装饰艺术中，东阳木雕是最具特色的。这也许是因为在封建等级观念强烈的社会形态下，彩绘、藻井、斗栱等装饰形式受到严格限制，如《唐六典》规定：“……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此“装饰”应当指上述所指的彩绘、藻井、斗栱等装饰形式，而对建筑雕刻等装饰，除了对一些特别的题材和图案等有所限制外，历代似乎并无明确规定限制。而明清以后，随着市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但他们始终处于“富而不贵”的社会地位。同时，士族官僚阶层也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也潜藏着巨大的欲望。东阳木雕高雅而华贵的风格，正好迎合士绅商贾对营造高堂华宇的审美需求，同时又不违反官方的规制。因而，这些腰缠万贯家私的官僚士绅、富商巨贾在营造厅堂过程中，通过东阳匠师的刀，把自己对建筑的精神追求和所要借以表达的美好愿望，统统宣泄出来，大肆挥霍装饰。体现在明末以后，建筑木雕装饰越来越豪华，有的遍布梁架和内外檐装修，不但对门窗榻扇等小木作进行精雕细刻，还对梁、桁、楣、枋、劄牵、斗栱、琴枋、牛腿、雀替等大木也进行不同程度的雕刻装饰，形成浙中地区建筑华而不艳的装饰艺术风格。

义乌木雕和东阳木雕同属源于本地的传统民间工艺，其师承关系相同。我以为，东阳木雕冠以东阳地名，也和“东阳帮”工匠名称渊源一样，应当是指由东阳、义乌等地工匠共同创造的传统民间工艺。因历史上这些地区曾隶属东阳郡管辖，故统称东阳木雕。

据考，东阳木雕起源于秦汉时期，早在唐宋时期就应用于建筑装饰。据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载，唐大和年间(827~835)，东阳冯家楼“高楼画栏耀人目，其下步廊几半里”。此画栏我认为除了指彩画装饰外，还可理解为有建筑木雕装饰的栏杆。唐·冯宿墓（民国时期被盗挖）与唐宪宗宰相舒元舆（791~835）之墓（20世纪初被盗），均有立体圆雕随葬木俑出土，说明唐代时东阳木雕已在最初阴刻的基础上，发展浮雕和圆雕等多种技法。现见于世的东阳木雕作品是五代木雕观音立像和善财童子像，1963年出土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建造的中兴寺塔（又称南寺塔）。从造型上看，善财童子像主要采用半圆雕技法，雕像脚下的莲花座以及头上悬垂的幡幢分

别采用阴刻、圆雕和浮雕技法。雕像人物脸部表情丰满，神态祥和，衣袂纹饰线条流畅。尤其是观音立像，虽然头部和基座局部残缺，但从整个造型来看，观音像龛立于一朵盛开的莲花上，莲座采用圆雕技法，线条圆润饱满。观音脚踏莲花宝座，衣袂自然悬垂于地，观音胸前的佩饰和衣服纹饰均采用剔地起突的浮雕技法，刻画细腻生动，是早期东阳木雕的代表作。

南宋绍定三年（1230），在东阳黉门东侧重建辉映楼，“琢镂为户，文锦楹兮；丹辇引翼，翠螭腾兮”（元·陈樵：《鹿皮子集》卷1，“赋”，《东阳县学辉映楼赋》）。元代陈樵在《八咏楼赋》中，也有“兰堂丰屋，交绮疏兮”之句，此绮疏，也作绮疎，就是指刻成空心花纹的窗户。可见，宋元时期，浙中地区重要建筑中采用镂空的木雕榻扇门窗已较普遍。

明代的东阳木雕从技法的运用到工艺的娴熟，都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完整风格，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家具、陈设欣赏、宗教佛像等领域，形成东阳木雕艺术应用的四大类型。

义乌作为东阳的邻县，东阳木雕作为义乌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也留下许多存世作品。从建筑木雕的装饰特点来看，明代建筑的牛腿、琴枋、斗栱、升、门窗榻扇、荷叶墩、云头、角栱、雀替、替木以及大木的梁、桁、枋、船篷轩、劄牵、栏杆等都已具有各种不同的图案，而且讲究布局和谐统一。元末明初的何桐生民居中梁端、斗栱等部位作非常简单的雕饰，是义乌现存最早的东阳木雕建筑装饰的实例。

从工艺特征来看，明代的东阳木雕一般比较粗放浑厚，刀工有力，线条简约、圆润而流畅，图案以花鸟、卷草、蝙蝠、如意、祥云以及龟、鹤、龙、凤、狮子等为题材，也有表现山水、亭阁及人物故事的题材，但所见不多。因为“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因此，雕刻题材和图案仍受着规制的局限。义乌明代建筑，无论是宗祠、厅堂、豪宅，抑或是官宦府第，更甬说民宅了，其木雕装修图案中很少见人物雕刻，也罕见真龙真凤图案的雕刻，一般龙凤图案均为草龙、拐子龙或夔龙纹，但麒麟、犀象等图案在建筑雕刻中仍能见到，主要是石雕，木雕较罕见。如方大宗祠泮池栏板中的麒麟吐书图；明代赤岸乔亭螃蟹形山墓群的环境中，也有麒麟回首的雕花栏板。

清中叶始，东阳木雕形式由简趋繁，追求绮丽的装饰效果，内容题材不拘，是东阳木雕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工艺技术还是文化艺术创作方面都十分繁荣。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和发展，至嘉庆、道光年间，东

阳木雕发展至顶峰，出现了不少极尽奢侈豪华的、美轮美奂的“满堂雕”建筑作品，如黄山八面厅。义乌民居建筑中大量的雕刻作品都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东阳木雕的特点：①题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以及戏曲典故应有尽有，皆入画中。而且将大量神话故事、戏曲人物故事以及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与劳作场景的民俗题材，作为建筑雕刻的内容，常常把这些具有故事情节的题材作为一组，装饰在同一榀门窗或梁架中，使之更具故事情节和趣味构思，独具匠心。如义乌某民居“楼下厅”建筑的门厅和厢房榻扇采用24幅反映农村耕樵、桑蚕、织酿等农业劳动场景的民俗图案，如此全面地反映当地耕桑文化确实十分罕见；②内容丰富，讲究画面的构思和布局，造型艺术更多样化。许多工匠已摆脱程式化的刻意描摹仿制，能够根据所见所闻独立创作，由“依样画瓢”的仿制阶段发展到自由发挥创作的阶段，显示出东阳木雕在构思、造型、布局以及整体设计上极深的艺术造诣。如黄山八面厅正厅明间前檐步梁下雀替，工匠以北宋汪洙所编的《神童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作为创作蓝本，以刀代绘，用一句诗创作一幅画，这足以反映当时工匠高超的工艺水平；③更加注重精雕细刻，尤其是有故事情节的作品，更加注重细致入微的艺术表现，把人物丰富的表情、神态、衣着、服饰、发型、举止、动静等变化，刻画得惟妙惟肖；④雕刻技法更加多样，能够根据建筑物不同的部位，灵活选取不同的雕刻手法。如梁、桁、轩、天花、藻井、斗栱、升、牛腿、雀替等高处的屋架部位，设计时就注重动态造型，采用形体简明、线条粗放、镂空玲珑的镂空雕、高浮雕表现技法。而门窗榻扇等接近人体平视的近距离欣赏作品，则采用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双面锯空雕、阴雕填彩等雕刻技法加以表现。

总之，东阳木雕自秦汉滥觞，形成于唐，经宋至明，技艺臻于纯熟，清中晚期达到顶峰。从义乌现存传统民居的木雕工艺来看，体现木雕工艺发展由浑厚到细腻、由简约到繁琐的一个发展历程。至清末民国时期，建筑雕刻出现了由“雕工体”向“画工体”的重大转变，使这一时期建筑雕刻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法特点。所谓画工体，是指在传统的雕刻艺术中，融入中国画中惯用的题诗、绘画、落款、押印、着色等艺术，成为融木雕和诗、书、画、印、烫色等工艺美术于一体的、具有中国山水、花鸟、人物画特点的新式体。清末民国时期画工体装饰风格的代表作，如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朱一新故居，在榻扇门裙板中大量地采用烫漆画工艺，并盖有朱一新的印章。又如佛堂塘下洋村的敦厚堂、佛堂古镇的新南山民

居等，其榻扇门窗及走马板等处的木雕就体现了这些特点。在所有现存的义乌民居中，其中最能体现东阳木雕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有明崇祯年间的存古堂，清乾嘉时期的容安堂、攸芋堂，清嘉庆年间的黄山八面厅，道光年间的培德堂、承吉堂，清末朱店的大夫第，民国时期的佛堂吴宅、石明堂花厅等建筑。清末民国时期，建筑木雕逐渐转向商业木雕，建筑木雕应用开始逐渐衰落。

## 2. 东阳木雕的工艺特点

东阳木雕是一种装饰性浮雕，大部分作品是平面雕刻，是一种以平面浮雕为主的雕刻艺术形式。它以多层次浮雕、散点透视构图、保留平面的装饰为艺术特征，形成独特的雕刻技法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东阳木雕选材很有讲究，按东阳木雕精雕细刻的特点和显露木材自然纹理的需要，要求选用木质坚硬、质地致密、纹理细腻、木色纯净、不易变形的木材，古代东阳建筑木雕中选用最多的是樟木。在表面处理上，东阳木雕与宁绍地区的朱金木雕<sup>①</sup>相区别，它以“清水白木雕”为特色，雕刻后基本不施油漆或深色漆，有的只上清油或桐油，保留原木天然的纹理、清雅的色泽和精致的刀工技法，故又称“白木雕”。相比于其他各地的木雕工艺，东阳木雕除了体现“白木雕”的特色外，还具有刀法圆润，雕工精致、洗练、玲珑剔透，不伤整体和牢固等特点，具有质朴隽永的美感和天然的质感，堪称中国四大名雕（指东阳木雕、潮州木雕、福州龙眼木雕、温州黄杨木雕）中的佼佼者。

## 3. 东阳建筑木雕工艺流程和技法介绍

### 3.1 工艺流程

东阳建筑木雕的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取料、设计打样、剔地、拉粗坯、细坯雕、修光、打磨、装配等工序。取料是指根据建筑木雕所处的部位和造型选择合适的雕花板。设计打样是木雕工艺的第一步。在实际操作中，东阳木雕可分无画雕刻和按设计图稿雕刻两大类。前者是指事先不画设计样稿，工匠根据自己胸中擘画，直接在花板上雕刻。无画雕刻技术难度大，要求工匠对绘画、构图设计和雕刻技法融会贯通，并且有“刀刀见功夫”的精湛技艺。绝大多数工匠一般采用先按设计画出样稿，然后在花板上打轮廓线，按图稿雕刻。剔地、粗坯雕和细坯雕合称打坯，是东阳木雕的主要工序之一。打坯实际上就是工匠用雕花刀把平面的设计图稿凿刻为分层次的立体坯胎的过程，其一般顺序是先将设计图稿描画在雕花板上，以便行刀时大体分层分面，再按图稿要求，

自上而下，由浅渐深，打出基本形体，并对各局部特征进行初步处理。打坯这道工序主要考虑木雕作品的整体效果，即构图、层次、块面和造型艺术，要求工匠吃透画面中各部分之间的前后、左右、远近交错等参差关系，整体把握物象造型艺术的形体结构、层次块面和大体比例，要求做到层次分明、深浅得当、凿迹清晰、线脚平直挺括。修光是雕刻的最后一道工序，它是在打坯基础上，对经过粗坯雕和细坯雕后的半成品进一步作细微加工的过程。通过修光清除制坯时残留的疤痕和毛刺，做到“粗不留线，细不留纤”，达到作品平整光洁、线条流畅之目的。修光功在精细，意在神似，要求工匠在落刀前充分理解构图内容和处理手法，从整体到细节，对作品进行艺术再加工，使雕刻的物象形体准确，神态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打磨和装配是对建筑木雕作品进行后处理的过程。一般先用1号木砂纸打磨，去除木雕作品表面的木毛、胶痕和灰尘等，然后进行装配。

### 3.2 雕刻技法

东阳建筑木雕常用的雕刻技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浮雕：**浮雕是一种以线为主、以面为辅，通过线面结合起来表现物象形体结构的雕刻技法。按照雕刻的深浅，可分为薄浮雕、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高浮雕等，浮雕技法在建筑木雕装饰中应用最为广泛，在建筑装饰中一般视所处地位和视距变化等因素，选取合适的表现题材和雕刻内容，应用不同的浮雕技法。

**薄浮雕：**突出一个薄字，雕刻深度一般掌握在1厘米以内，画面虽薄，但通过严谨的线条刻画，同样呈现立体感。这种雕刻技术对艺人的绘画功底，特别是线条表现手法要求尤高。适用于构图简练，层次较少的题材，主要应用于门窗榻扇的缘环板等近距离欣赏的部位。

**浅浮雕：**介于薄浮雕和深浮雕之间的一种雕刻技法，其画面雕刻深度一般控制在1~2厘米之间，要求刻线严谨，以疏衬密，刀法简练，既浅又能凸显立体感，刀功要求较高。主要用于缘环板、雀替、裙板、台屏、挂屏等的雕刻。

**深浮雕：**往往采用圆雕手法，是一种线面结合的雕刻技法。雕刻深度一般在2~10厘米之间，适用于层次分明、构图复杂、立体感强的物象。主要用于牛腿、琴枋、桁条、门窗花心等部位。

**高浮雕：**采用圆雕手法来表现物象形体结构的雕刻技法。画面高出形体外，具有构图丰满、玲珑剔透的特点，主要适用于建筑中的屋架装饰，如檐桁、天花等部

<sup>①</sup>指在木雕表面涂刷朱砂丹漆和鎏金工艺装饰的木雕艺术风格。

位的雕刻。

**镂空雕：**一种多层次镂空来表现物象形体结构的雕刻技法，既要镂空深雕，玲珑剔透，又要确保牢固，适用于榻扇花心、牛腿等。

**圆雕：**圆雕即立体造型雕刻，属东阳木雕的传统技法之一，一般舍弃背景，在其前后左右各面都雕出实在的形体物象，可从四周任何角度欣赏，具有三维空间艺术特点。适用于牛腿、琴枋前的刊头等建筑构件的雕刻及木俑、佛像及人物、动物等摆件的雕刻。

**半圆雕：**介于圆雕和深浮雕之间，兼有圆雕的立体感与浮雕层次丰富两者之长，三面雕刻，构图不受平面约束，造型富于变化。适用于牛腿、十八斗、三才升以及牛腿、琴枋前刊头等三面或四面雕刻的构件。

**透空双面雕：**穿花锯空后进行正反两面雕刻，主要特点是设计时按双面正考虑，两面都可以欣赏。适用于屏风、挂落罩、落地罩、榻扇门窗格心等的雕刻。

**锯空雕：**也称拉空雕，是一种单层次的单面雕刻，它以锯空、平面刻线切刀为主，一般取浅浮雕的技法，具有透空玲珑之感，适用于门窗、横披、挂屏及船篷轩顶的雕刻。

**满地雕：**满地雕是指在整个画面满地施雕，不留平面。它是一种富丽华贵、繁花似锦的装饰性很强的雕法。题材以花鸟为主，衬以假山、流云、小草等，如百鸟朝凤、龙凤呈祥、凤穿牡丹等题材，多用此法。多用于榻扇条环板和花心、箱笼、柜等的雕刻（如上溪镇礼耕堂榻扇）。

**半雕：**半雕是相对于满地雕而言的，它是一种只对形体平面的局部进行点缀性雕饰的雕刻技法，只求图案简练、淡雅、孤清的艺术效果。适用于柜箱、橱门、樟木箱、板壁等。

**阴雕：**俗称“铲阴花”、阴刻，是一种以刀代笔，效果近似写意中国画的雕法，多用于梁头龙须梁的雕刻以及家具装饰。这种雕刻技法在梁头或清末民初建筑的外檐装修中多见。

其他还有圆木浮雕、彩木镶嵌雕、树根雕、自形木雕等多种技法，一般适于家具、陈设欣赏等类型的雕刻中，建筑木雕中极为少见，兹从略。

## 五、建筑石雕

### 1. 建筑石雕艺术的应用

建筑石雕装饰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应用于陵寝和牌坊等纪念性建筑，大约自唐代以后，随着佛教须弥座的引入，须弥座广泛应用于一些重要的宗教、礼制、宫殿建筑的基座中。义乌六都盛产青石，青石开采大约始

于唐宋年间，起初用于雕造佛像，后来也渐渐应用于建筑的台基、柱础、阶石、踏跺、散水、地袱、角柱石、腰线石、门枕石、抱鼓石、门槛、门框、门梁、门楣、门额以及山墙墀头等处，并随着人们对建筑审美的不断深化和追求，对石作中一些露明的看面如台明、柱础、陡板石、地袱石、门枕石、抱鼓石、角柱石、散水石以及门脸、墀头、漏窗等重要部位进行雕刻装饰。从建筑实物的调查情况看，一些明代建筑的正立面和正厅的台明采用有砖石雕饰的须弥座台基，在上、下枋和圭角等部位雕刻出泉混线脚或如意云纹等线饰。清代和民国时期一些考究的厅堂、祠堂建筑往往在门面的门梁、门楣、门额、龙凤版等重要部位做些雕饰，使门脸显得大气恢弘。同时在柱础、陡板石、地袱石、门枕石、抱鼓石、散水石等露明看面雕刻花鸟、麒麟、龙凤、犀象或者暗八仙、佛家八宝等吉祥图案。（如黄山八面厅地袱、柱础石雕；培德堂散水石；蓉竹公厅石雕柱础、漏窗）

### 2. 石雕技法

按照传统营造石活分类，石作可分大石作和花石作，大石作主要是指石料的起运、石材制作加工和石活安装等工种；花石作则主要负责石雕制品或石活的局部雕刻加工。大石作和花石作匠人分别称为大石匠和花石匠。

石雕就是在石活的表面上用平雕、浮雕、透雕或圆雕等手法雕刻出各种花饰图案，通称剔凿花活。按石雕技法不同可分为平活、凿活、透活和圆身等类别。

**平活** 即平雕，包括阴纹雕刻和剔地起突、但表面无凹凸变化的阳活，清以前称减地平及。在雕刻手法中，用凹线（阴文）表现图案花纹的通称为阴活，而用凸线（阳文）表现图案花纹的通称阳活。平雕既可以是阴活，也可以是阳活。

平活加工一般分为画谱子、穿、剔地、修光等几道工序。如为阴活，用錾子和锤子沿图案轮廓线穿凿出浅沟后，不需剔地，直接用凿子把穿出的纹样进一步雕刻清晰美观就行。阳活类平活则需用小凿将穿出的线条以外的地儿剔凿下去，使地儿落低一定深度，并用扁子把图案以外的空地扁光、扁平，再把凸出的活儿边缘修整好。

平雕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应用很普遍，建筑台明、地袱、陡板石、须弥座以及柱础等部位常用平雕技法雕刻花卉、瓜果三多、龙凤、如意云纹、暗八仙、佛八宝等吉祥图案。

**凿活** 即浮雕，属于阳活，按照石活表面起凹凸变化的深浅不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撇阳、浅活和深活，相当于薄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清以前分别称压地隐起和剔地起突，前者相当于浅浮雕，后者相当于高浮

雕。凿活加工要比平活复杂些，因为凿活图案并非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分为不同深浅的若干个层次，其工序可分为画谱子、穿、剔地、打糙、见细、修光等步骤。画谱子针对简单的和复杂的图案有不同的操作方法，简单图案可直接在石材表面上画，复杂图案则需先画在较厚的纸上，叫起谱子。然后用针顺着花纹在纸上扎出许多针眼，叫扎谱子，然后把纸贴在石面上，用棉花蘸着土红粉在纸上顺着针眼拍打，叫拍谱子。拍谱子前要先将石面沾湿。拍完谱子后，再用笔顺着沾在石面上的红粉印将花纹描摹清楚，叫过谱子。过完谱子后，用簪子沿轮廓线穿一道，再行雕刻。根据穿出的图案把需雕刻形象的大致轮廓雕出来叫打糙。接下来是在出糙的基础上用笔画图案的某些细部特征，用小凿或扁子把图案雕刻出来，把多余的部分剔凿干净，这道工序叫见细。再用扁子将图案边缘修光，使线条圆润流畅。实际雕刻过程中，各道工序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是交叉进行的，需随雕随画，随画随雕，并随时把多余的地儿扁光剔净。

凿活在建筑装饰中应用较多，主要应用于建筑的门脸装饰，如门头龙凤版、门楣、门梁以及门枕石、门墩石、散水石等的雕刻，另在牌坊、墓葬、栏杆等装饰中应用较普遍。

**透活** 即透雕，是指凿活的局部掏挖成透空的、更具立体感的一种石雕技法，又称过真手法。透活常施用于凿活的局部，对于整件石活仍属凿活。透活的加工程序与凿活相近，但透活的地儿落得更深，一些部位要掏空挖透，花草图案要穿枝过梗。由于透活的层次较多，因此画、穿、凿等工序往往分层反复操作。为加强透活的真实感，一些细部特征的雕刻更加细微。

**圆身** 即立体雕刻，圆身作品从前后左右各个侧面均能欣赏，适用于建筑立面的石雕狮子、抱鼓石、栏杆望柱头等的雕刻。圆身作法的操作程序较复杂，一般分起样、出坯、凿荒、打糙、掏挖空当、见细、打磨修整等多道工序。（如流夏小西湖的圆身石狮子）

## 六、建筑砖雕

砖雕是模仿石雕而出现的一种雕饰类别，是指在烧制好的质地细密的青砖上雕刻出人物、山水、花卉、动物等各种物象或花纹的民间工艺，与建筑木雕、石雕合称“三雕”，是古建筑装饰的重要艺术形式，主要用于装饰寺塔、墓葬和房屋等建筑构件和墙面。

从发展源流上看，砖雕艺术是在东周瓦当、空心砖和汉代画像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壁面装饰艺术形式，最初是在预制大型空心砖时，在湿的泥坯上模印各种图

案，这类画像砖主要用于墓室壁面的装饰。大约在北宋时形成砖雕，当时往往采用生砖雕工艺，即在未经烧制的砖坯上雕刻图案，然后入窑焙烧。元代时墓室砖雕渐趋衰弱，至明清两代，砖雕艺术在建筑装饰中十分盛行。从义乌明清建筑实物上看，一般采用熟砖雕工艺，即在烧制好的青砖成品上雕刻图案，这样可以避免砖雕艺术品在焙烧过程中因烧成温度不同等原因造成色差或局部开裂变形等残次情况发生。相比于石雕工艺，青砖质地较石料疏松，具有易于雕造的特点，且材料也较石材简便易得，因此用于建筑装饰很普遍，主要应用于房屋壁面、门窗雨罩、封檐、墀头、台明、地杵、天井、山花的悬鱼惹草、照壁心子、廊门筒子、屋脊、脊吻等部位。义乌本地砖雕多从观赏和实用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根据砖雕所处的位置，灵活采用阴雕、平雕、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圆雕等工艺，不过分追求纤细和工巧，具有造型简洁、玲珑剔透的特点。建筑立面砖雕多以平雕和浮雕为主，布局对称。内容取材于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主题，图案丰富。砖雕工艺一般需经制坯、焙烧、雕刻等工序，用于雕刻的青砖有别于普通土青砖，烧制砖雕所用的青砖要求用澄泥砖，即经过清水淘洗、沉淀之后的澄泥制作的砖坯烧制而成的耐磨砖，这种耐磨砖比普通青砖表面细腻、纯度高且粘合力好，适于雕刻。砖雕按规模大小分单块砖雕和组合砖雕，单块砖雕较普遍，组合砖雕一般用于建筑立面或照壁等大面积墙面的装饰，一般由数块甚至数十块砖雕拼合而成。砖雕工艺包括打磨、构图、雕刻、细磨、过水、编号、拼接安装、修饰等工序。

义乌传统建筑门面往往采用砖雕和石雕装饰工艺，在素洁的粉墙上，大门两侧壁面采用磨砖对缝或拼花图案，大门用石抱框，门梁、门楣施石雕，门额题青石匾，两旁相间装饰几块雕刻有各种图案的砖雕花板。一些做工考究的厅堂华宇，在盘头封檐部位采用专门雕制定烧的鸡胸檐鼓砖，并用各种形状的青砖叠涩出檐牙、斗拱、椽头、瓦当、挂落等多层线脚，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

## 七、髹漆油饰

义乌民居一般仅在外檐廊等易受风吹日晒或斜风雨打湿的部位对木构件刷一下保护性的熟桐油或本色的清漆，室内尤其是木雕构件多用清水漆，很少刷深色混水漆，这样能保持木构件的本色，具有素净典雅的风格。

古建筑修缮工程若是备料时间较仓促，木材含水率较高，木材就会因季节变化产生较大的收缩缝。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马上油饰，一般要过个夏天后再油饰，这样木材中的水分就能自然风干。否则，会使木材中水

分因外表包上油漆阻止水分散逸而导致木质霉烂。

因木材在自然风干过程中都会有收缩缝产生，油饰前一般需经刮腻子处理。刮腻子俗称打底，腻子的配方因使用的油漆而异。义乌古建筑木构件一般采用熟桐油或清漆等透明的清水漆油饰，不透明的混水漆用得极少。油饰前打底用油性腻子，有局部嵌补和全面批刮两种方法。局部嵌补法即是用熟桐油、石膏粉、颜料和水等混合调成糊状的桐油灰，局部勾抿灰缝，义乌民间多用此法；全面批刮就是在木构件表面通刮腻子，一般用于混水漆。对于大的收缩缝可先用竹片或硬木片嵌缝，使表面大体平整，小缝直接用桐油灰勾抿，使表面大体平整。再用刀将裂缝和疤节刮平、剔净，去除表面的灰尘。待腻子完全干燥后，用1号砂纸将木构件表面嵌补或批刮的腻子磨平、磨光。然后髹漆、打磨交替进行，一般需油漆2~3道工序。

#### 八、彩绘壁画

义乌传统民居具有“雕梁而不画栋，重雕而不重油饰”的装饰特点。建筑的栱扇、梁架等饰以东阳木雕，但不管雕得多精细，民居一般都不以五彩勾画，特别是和玺彩画和旋子彩画，民间极罕见。仅有少数祠堂建筑的木雕上饰以描金或青绿彩绘。不作彩绘一方面是因为受官府规制的限制：“凡庶民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义乌地区气候特点是空气湿度大，彩绘易受潮后剥蚀，不适宜作彩画。因此，厅堂民居建筑中施彩画极为罕见，后宅街道陈宅村的明万历年间建筑萃和堂，其正厅梁架的所有梁枋、劄牵、斗拱，均饰有解绿装烟琢墨旋子彩画。彩画图案用土黄通刷，箍头和找头的各个单位，轮廓用墨线勾画，内部用青绿两色叠晕。青绿两色之间，间以少量的红色和白

色做点缀。装饰所用的花纹有鱼鳞纹、豹脚纹、松木纹、云纹、蕙草纹，如意纹等，枋心空出无花纹。赤岸镇明代诒燕堂梁架也施彩画，惜已坍塌。

彩画装饰在宗祠、文庙和寺院等重要建筑中还是应用较普遍的，如义乌城中始建于唐代的满心寺“丹堦翠桷，隐显于水光山色，烟云晦霭间。”（元·黄潘：《黄学士文集》卷11，“满心寺法堂记”，第2页），可见，满心寺建筑用了丹青彩画装饰。另如上溪镇云门村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的陈大宗祠梁架装饰采用青绿彩画。彩画以暖色调土红色为基调，绘以青、绿、紫、黑、白等诸色，色彩绚丽，内容多取材表现大富大贵和福禄寿喜等传统寓意的莲花、牡丹、凤凰、孔雀、喜鹊等花鸟、动物图案，为研究清早期彩画提供了实例，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墨绘壁画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装饰形式，多施用于建筑内外墙体。壁画装饰也许是为了使黛青色的瓦顶和白色的墙面之间不至于过于反差太大，工匠们在封檐三线叠涩、门头、窗罩、照墙、影壁以及马头墙等部位勾画一些线脚和别致的缠枝花草、勾连云纹等图案，或是在建筑承重山墙内部绘出边榀梁架的形状，这种作法很独特，在义北一些清代建筑中较常见（如大陈镇马畈村邵大宗祠）。也有采用水墨画形式的，使之在大块的墙面之间，有一个黑白间的过渡，因而显得和谐而优雅，具有很好的装饰功能。如上溪南平村经畲堂、里苍黄村福基堂、井头徐十八间、寺口陈七间等建筑的照墙上均饰以精美的壁画。

在清末民国建筑中，用绘画作装饰趋于普遍，或墨线，或彩绘、或水墨画，图案也由简入繁，民国时期建筑更是融诗、书、画、印于一体，出现以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水墨画以及反映连贯故事题



材的连环人物画，如佛堂塘下洋村的敦厚堂，其照墙封檐三线叠涩部位下壁画为义乌民国时期刚建成的义乌火车站。

### 九、楹联匾额

书法艺术在建筑装饰中的运用是很常见的，是古建筑文化的重要体现，集中体现在楹联和匾额中，另外还往往与建筑木雕、砖雕、石雕以及壁画等艺术表现形式相互融合在一起，用于题诗联句或落款等，多用于建筑的门头、封檐、绦环板、梁枋等部位，是古建筑装饰的重要艺术形式。

楹联和匾额是颇得中华诗词和书法艺术魅力的传统文化，被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极能彰显一地之文化内涵，自古文人、商贾、士绅或隐君子在华堂落成之际，都会欣然命笔，或极尽所能，延请名流书家为其华堂题联书匾。文人雅士也乐于此道，或作堂记、祠记，或题楹联、匾额，视之为风雅之事，此风历数百年而不衰，故在建筑上留下诸多墨宝。

义乌素有“小邹鲁”之称，自古就讲究诗礼传家，敦教化，重人伦，把处世哲学和人生追求通过楹联和匾额等艺术形式，镌刻、镶嵌或张挂于建筑的大门、廊弄、中堂、楹柱等处，或言志抒怀、或引经据典、或写景咏物、或自喻而勉、或训示以戒……，各种形式的楹联和匾额，妇孺能诵，雅俗共赏，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每天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或家族中人们代代相传的信念或戒条。可以说，古者，凡有人居处，就有对联，它们把屋主人的文化理念融入于建筑中，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的文化内涵。

从义乌明清建筑楹联和匾额的形式和内容上看，主要有门楣石匾，祠堂楹联、中堂匾额、寺观楹联等，书体以楷书和行书为主，真草隶篆兼有。内容以反映耕读文化和宗亲意识相关的中华传统美德为主，如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忠孝节义、轻利重德、三纲五常、劝学为善、克勤克俭、雍睦敦厚、礼仪廉耻等，都可通过楹联和匾额的形式加以表现。宗祠楹联主要宣扬宗族团结、

恪守族规、光宗耀祖等内容，多镌刻在祠堂金柱和廊柱上，在义乌宗祠建筑中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如赤岸孝冯祠楹联“兄弟两尚书，父子九进士”；佛堂镇友龙公祠楹联）。寺观楹联则多以劝人积德行善和祈福祝愿的内容为主，有的颇具哲学况味。匾额分一字匾、二字匾、三字匾、四字匾，楹联则可长可短，短则五言，长者数十言。

### 十、灰塑堆塑

堆塑又称堆贴、塑贴或堆雕，是指用石灰、泥、石膏等材料塑出立体状的纹饰贴在器物胚胎或建筑上的一种装饰手法。堆塑最初用于陶瓷器物的表面装饰，义乌西周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盃、原始青瓷盂等器物上就塑贴有“S”形、双“S”形的泥饼装饰。战国原始青瓷提梁盃的夔龙形提梁、兽头形流以及兽蹄形三足均采用泥塑堆贴装饰手法。

灰塑又名堆灰，是石灰堆塑的简称，又称灰批，是用石灰在建筑物上雕塑造型的民间工艺，可能是从砖雕和泥塑两种技艺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室外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形式。义乌明清建筑中，多用于祠堂、寺观、庙庵和豪门大宅的建筑装饰。从表现形式看，有多层式的立体灰塑、浮雕式灰塑和单个造型的单体灰塑，有的还采用彩塑形式。传统灰塑工艺内容有山水、花卉、鸟兽、人物和书法等，形态各异。最常见的是用于楼阁、祠堂、寺观、戏台等建筑屋脊的鳌鱼脊吻。除有独占鳌头的吉祥寓意外，还有厌胜的作用。古建筑中用鳌鱼吞脊（鸱吻）以厌火祥。（如大陈红峰金氏宗祠戏台的灰塑脊饰，脊头人物采用彩塑装饰）

石膏堆塑常用于建筑的立面装饰，清末民国时期建筑中较为普遍，是从西式建筑中引入的一种装饰风格，多见于建筑门脸、柱头、山花、窗罩、封檐等部位，纹饰种类繁多，有缠枝花纹（佛堂三万头）、蝶恋花（吴晗故居门头）、凤朝牡丹（佛堂丁寿春民居门脸）、工农兵人物（佛堂红星剧院）、平安吉祥（丁寿春民居）等，有的还与彩绘兼用，极具装饰性。

# 明末东阳“许都之乱”探究

张宪博

明朝末年，啸聚山林举兵与官府对抗者并非全为无籍之农民，其中“或仍力田，或业商贩，甚则称诸生，大者至荐绅”<sup>①</sup>，成分十分复杂，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崇祯十六年（1643）浙江东阳“许都之乱”。许都身为诸生，又是世家子弟，属于缙绅阶层。“许都之乱”发生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领导起义的核心人物多为读书人，他们“弃青衿”举义旗，不是为了均分土地和免除赋役，而是不堪忍受地方官吏的贪贿和压榨。缙绅阶层奋起反抗贪官污吏，反映出明末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状况。探究明末东阳“许都之乱”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对认识明末体制弊端、政治腐败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学界对此事件所涉甚少，笔者梳理现存史料，去伪存真，爰成此篇，旨在引起更多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东阳诸生许都，浙江金华东阳西南怀德乡人，左都御史许弘纲之从孙<sup>②</sup>，副使许达道之孙<sup>③</sup>。许都自幼读书，及长入府学，被称为“名家子”。许仅以文学有闻于时，而且“慷慨好施予”，“受其施者多德之”<sup>④</sup>。当时有名之士金华戴叔高、兰溪郭君璧、义乌丁汝章、冯三元、冯龙友、吴魁以及东阳赵雄、赵仇、应斗、韦广、江叔

曜等均与之交往甚厚。自古义乌风气悍勇，相传项籍江东子弟，皆出其乡。由于许都负责任侠，喜结纳桀骜之士，故勇侠轻非者多也从之游。明末天下大乱，许都踌躇满志，“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sup>⑤</sup>希望有朝一日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许都出于何刚门下。何刚为几社、复社重要成员，他称许都为“忠义智勇之士”<sup>⑥</sup>，对其寄予厚望；因见海内将乱，对许都说：“子所居，天下精兵处也，高皇帝尝用之平乱矣，盍及今成一旅以待用乎？”许都欣然同意，回去后便“散财结客，招致数千人”<sup>⑦</sup>，立为“义社”<sup>⑧</sup>。几社六子之一松江徐孚远也早识许都，视其为奇才，说：“国家思破格得士，苟假都以一职，数万众可集也。”<sup>⑨</sup>徐孚远与同邑另一名几社创立者陈子龙为生死之交，陈子龙任绍兴推官，经徐孚远介绍，子龙也与许都结为好友。

关于何刚、徐孚远、陈子龙建议许都于当地招募义勇练兵一事，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徐闇公先生年谱》载：“初卧子为绍兴推官，先生引都见之，议令招募义勇，俾之杀贼，且嘱何恧人上疏荐之；未报，而东阳激变之事起。”<sup>⑩</sup>《鮚埼亭集外编》也如是说：“时寇祸急，颇求健儿侠客，联络部署，欲为勤王之备。陈公任绍兴府推官，公（徐孚远）引东阳许都见之，使其招募义勇，

①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二《议·保甲议》，嘉庆八年彝山草堂本。

②谈迁：《国榷》卷九九，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校点本。

③许弘纲登万历八年进士，许达道登万历三十五年进士。

④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康熙二十年刻本。

⑤乾隆《绍兴府志》卷四三《人物志三·名宦下·陈子龙》，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⑥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一二《殉福传·何刚》，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⑦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一《列传·何刚》，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⑧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⑨吴伟业：《缓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陈乃乾、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民国十五年刻本。

西行杀贼。又令何公上疏荐之。”<sup>①</sup>显然，何刚、徐孚远、陈子龙令许都“招募义勇”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二十日，何刚上疏，言：

忠义智勇之士，在浙则有东阳、义乌，昔时名将、劲兵多出其地。臣熟知东阳生员许都，天性忠孝，素裕韬铃，一见知人，能与士卒同甘苦，乞用许都，以作率东义、徽歙二方之奇才，臣愿以布衣奔走联络，悉遵戚继光法，申详约束，开导忠义，一岁之余，可使赴汤蹈火。臣见进士姚奇胤、夏供祐、桐城生员周岐、陕西生员刘湘容、山西举人韩林，皆忧时有心。乞颁手诏，会天下豪杰，则忠义智勇，联袂而起助皇上建业矣。

二十二日，崇祯帝谕吏、兵、刑三部：“举人何刚条奏，尽多可采。着授职方主事，即令往东阳、义乌联络义勇，练成功旅，以资剿寇之用。又允何刚奏，许都、姚奇胤作何委用，该部速议。”<sup>②</sup>《南疆逸史》卷一一《何刚传》、《明史》卷二七四《何刚传》均记有何刚上书一事，文字相近。《鮚埼亭集外编》之《徐都御史传》还强调说：“既杀（都），而何公疏下，已召之。”<sup>③</sup>另据【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载：

（许）都在吴中，何公刚素壮之，谓其才略足用，延誉甚广。当流寇横张，拟罗而致之以扞京阙。而宰执方公岳贡在松江闻其名，翰林杨公士聪傅其事，皆交章荐之，俾就东南招募，及议定，而都已就戮。<sup>④</sup>

以上材料表明，何刚等人举荐许都募兵金华的建议已经得到崇祯帝的同意，只是东阳之变突发，而举荐者在北京尚不知情。

陈子龙不仅与徐孚远共托何刚向朝廷举荐许都，在绍兴司理任上也多次向上官推荐许都，他强调“此等人用之可得其死力，不用亦能为变”<sup>⑤</sup>，但无人理会。会稽诸生郑遵谦好酒色，“昵妓金氏，金以妒杀其婢”<sup>⑥</sup>，陈子龙恶遵谦无赖，与金氏并论死。许都与郑氏为死友，急驰至越，对子龙说：“天下方有事，公奈何多杀豪杰！”子龙纳其言，郑遵谦与金氏得以免死。当许都“弃

青衿”举义旗之际，郑遵谦也准备起事响应，被其父郑之尹“扃其室不听出”<sup>⑦</sup>。后顺治二年（1645年）潞王降清，遵谦不顾已经降清的父亲反对，绝裾而去，秘结数千人于绍兴起兵，杀降清绍兴知府张慄、会稽知县彭万里并清朝招抚使，与熊汝霖迎鲁王于台州，坚持抗清，被封为“义兴侯”。清军渡江，又跟从鲁王航海转战舟山、中左等地<sup>⑧</sup>。

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都曾游于吴，客居在复社领袖吴昌时门下。时有吴中巨盗沈七、沈八久据太湖，官府多年难以剿灭。因吴昌时外甥徐某被劫，许都自告奋勇率二十余人赴“贼巢”，数日后生擒沈七、沈八。吴昌时惊异许都的能力与胆魄，视其为神人。一时间，“吴中士大夫知与不知者，皆闻都名。游侠少年或惧蹶其尘而无由入也。”不久，吴昌时迁吏部文选良中，携许都好友戴叔高、丁汝章、冯三元北上，行前遗书两浙诸津要，要求机电部待许都。官府秉承吴昌时旨意，“竟延致，务得其欢心”<sup>⑨</sup>，留杭州盘桓达一年多。当时李自成已下洛阳并逐渐控制河南，张献忠则由四川入湖广破襄阳，明军主力消耗殆尽，吴昌时显然认为许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时之士。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许都热衷于招募义勇，训练劲旅，与儿社、复社何刚、徐孚远、陈子龙、吴昌时等人的倡导有直接的关系，客观上构成了“许都之乱”的某种因素和条件。儿社、复社的核心人物，对明代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形成了一个体制变革的思想体系。如，他们主张加强、充实社会力量，鼓励世人“建业封侯”，认为国家治乱，必须有“在下之党”的支持与参与，鉴于儒学的局限性，提出“将才不宜求之于科目”，应设“文武兼等之科”以待俊杰之士，等等<sup>⑩</sup>。对许都的器重与引导，可以说是他们政治、社会实践的体现，遗憾的是明末弊政丛生，社会矛盾激化，“变故日多”，许都跃治报国未成，却酿成了一场悲剧。

①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一二《传·徐都御史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东阳许都》，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

③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一二《传·徐都御史传》。

④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⑤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⑥乾隆《绍兴府志》卷五七《人物志十七·忠节三·郑遵谦》。

⑦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三《列传·武臣·郑遵谦》。

⑧乾隆《绍兴府志》卷五七《人物志十七·忠节三·郑遵谦》。自郑遵谦举兵抗清后，金氏始终祖随，崎岖浙、闽间，顺治三年郑遵谦“为郑彩所迫投福清海中死，金氏亦赴海殉之”。

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⑩见拙文《明代体制弊端与复社名士的变革主张》，《故宫学刊》总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 二

崇祯十六年（1643年），浙江金华地区官吏由于贪污放纵而大失人心，东阳为甚。当时，东阳知县姚孙某以备乱为名，“敛士民贄，坐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恰逢有义乌奸民假借司礼监之名募兵，被逮下狱。许都与此事并无牵连，但义典史强一谦嫁祸于许都<sup>①</sup>，东阳县令姚孙某诬陷许都结党谋逆，索贿白银万两。许都虽家富，但也仅在中人之产，万两白银一时难以筹措，而县令催逼甚急<sup>②</sup>。适逢许都葬母南岩山中，参加葬礼的宾客多至万人。有不快许都者，告分守道王雄，称许都已反。王雄乃昏聩之人，未加详察，立即“遣使收捕”。许都手下冯龙友、戴法聪，“二人力千钧，皆万人帮，距使者不受执”<sup>③</sup>加之众人负气，互相煽动，于是在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甲子日（初四）<sup>④</sup>，以“诛贪吏”为名发奋举兵，当地百姓久已“怨毒虐政”，“旬日间聚众数万”<sup>⑤</sup>，几成燎原之势。起义军因许都丧母，故用白布缠头，人称“白头兵”<sup>⑥</sup>。当时江东诸城无守备，起义军所向披靡，韦广率众破东阳；吴魁陷浦江，“坐县十八日”<sup>⑦</sup>；冯龙友陷义乌，杀典史强一谦，义军进而围困郡城金华府，全浙为之大震。然而

起义军纪律严明，未尝“一有所杀掠，其所下，开门直入，都乘白舆，令从者遍谢诸长吏而已”<sup>⑧</sup>。许都入东阳，除了收缴官印，“余无所取”<sup>⑨</sup>。金华守备松驰，许都军曾与守备郑国祥、给事中姜应甲激战于金华城东孝顺街，郑国祥战死，姜应甲也败还城中<sup>⑩</sup>许都乘胜薄城，道臣王雄、同知倪祚善、县令徐调元等竭力固守，此时被削籍候勘的淮抚朱大典归金华，其子朱万化与许都为故交，“缒而下与之语”，于是姜应甲指责朱大典父子通贼。然而许都亦“以此去，不甚攻也”<sup>⑪</sup>。

许都起事后，金华地区不少无赖之徒假借义军旗帜索饷于各村落，甚至公然抢劫财物。为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许都将假冒义军者王和尚、张希宰梟首并悬于街衢，以示惩戒，由是人心大安。<sup>⑫</sup>

当时前任浙江巡抚董象恒因它事触怒崇祯帝而被逮，新任巡抚黄鸣俊尚未任，巡按御史左光先刚刚离任就道，接任者任天成尚居金陵，正值“抚军、直指皆虚席”<sup>⑬</sup>之时。由于事发突然，左光先不得不复回杭州，充任平息动乱的总指挥，一时间“治兵调发遍境内”<sup>⑭</sup>。官军“所至屠掠，东阳、汤溪、兰溪民各保乡寨据敌，官兵大败”<sup>⑮</sup>，官军本是镇压反叛，却成了反叛者与当地各乡民众共同的

①据【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载，许都起事之前有两件事被怀疑与其有关。一是崇祯十五年冬十月，为筹集军仗，许都同党应斗、郭君璧率百余人夜袭宜平县，应斗毙命，郭君璧被生擒。“廉其状，知首事者在许生，许生宜对簿，当事难之，秘不问，而都悒悒不自安。”二是“其党乃许为司礼监，走义乌。曰：‘金忠王宣奉文，如戚大将军例，召募忠勇。’典史强一谦，故京都人，疑之，就与语，不能答，乃言于县，缚而下诸狱，辞复连许生。都乃属其友求解于邑侯姚，姚难之，益惧。或劝之行，而以葬其母南岩，兼挟妓，不能决。”对这两件事是否与许都有关，【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未敢肯定。

②东阳县令激变许都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如《陈忠裕公全集·年谱》转引周欲度《客谐偶钞》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冬，流贼寇江西，都练兵自卫。令遂指都为不法，阳与掣肘，而阴实有求于都也。馈千金不能解。且曰：‘而匿吴昌时钦赃十万，是应输官。’都惧不免，同友人入辩。令怒，喝令进监。许之党羽愤怒拥入县治，执令，鞭数十，反收之狱。因封府库，聚徒众，旦夕合数千人。”与此大致相同的记载也见于《明季北略》卷二〇《东阳许都》，另外，《南疆逸史》卷一四《列传·陈子龙》也有鞭笞县令的记载。

③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④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载：“冯龙友等遽拥兵挟之为主，时十一月之甲子也。”查谈迁《国榷》卷九九，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无甲子日，应为十二月。

⑤乾隆《绍兴府志》卷四三《人物志三·名宦下·陈子龙》。

⑥这一习俗后于此地相沿数十年之久，凡山泽啸聚者率效之，人皆谓之“白头”，此许都之为始也。见【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⑦光绪《浦江县志》卷五《建置志·兵防》，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⑧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⑩据《浙江通志》卷一六一《人物一·名宦四·姜应甲》载，郑国祥曾任西陲守备。姜应甲，金华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选刑科给事中，以亲老乞养归。会东阳许都反，应甲倾家贄，募死士，迎敌于孝顺街。”

⑪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另据《明史》卷二七六《朱大典传》载，许都围城，朱万化曾“募健儿御之”，许都降后，“而所募者不散”。后知县徐调元查阅许都兵籍，见有朱万化名，“遂言大黄纵子交贼。巡按御史左光先闻于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饷。”

⑫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

⑬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八《名宦三·左光先》，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二十五年重刊本。

⑭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⑮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东阳许都》。

敌人。左光先又命杭营游击蒋若来等展开围剿，“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与贼战”<sup>①</sup>，且授权“许以便行剿抚”。蒋若来先复浦江，随后间道转援金华，台州道臣傅云龙、同知朱辂、督参将康盛爵也率军救婺，陈子龙率师复义乌。在官军的合力围剿下，起义军的实力渐被削弱，许都退守括苍山，收余部三千人于南岩立寨。此时，“海道卢若腾，督黄斌卿之兵亦至”<sup>②</sup>，许都遣使向陈子龙乞降，陈子龙“以事重不许”。及至官军会齐，分守道王雄因失察酿成激变，遭到了左光先的指责，迫于每日催战的压力，“急欲抚寇自解”<sup>③</sup>他认为山路险峻，仰攻不易，“非旷日持久不能克”，而官军已聚万人，仅有五日之粮，不如“抚之，戢兵救民”为上策。王雄的想法显然可取。然而根据陈子龙自撰《年谱》的记载，陈子龙此时仍然坚持“进剿”<sup>④</sup>。只是“方拔营”，许都派来的求降使者又至。

由于许都与几社、复社的特殊关系，又为陈子龙故交，据陈子龙说，在监司王雄的建议下，他单骑入都营以观情伪。陈子龙面斥许都：“汝罪已无生理，今惟有自缚见王公表诚信，幸得不诛，当率其徒徙江北，剿寇自贖卫。然必以今夕行，迟无益也。”许都则表示“苟明我以激反，又能为国家用，虽死无恨。”据陈子龙说，许都随子龙见监司王雄，王雄当面保证：“若果效诚款，明当毁营垒，纳兵械，悉散徒众，以二百人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sup>⑤</sup>

于是许都遣散义军，“愿散去者半”，其余者愿随许都编入官军行伍以效力于国家。然而子龙唯恐徒党过多再生变故，复令许都多方发遣，“遂制免死牌三千余面，遍给之”。结果许都仅以二百人儒服乞降，又“同朱略等以六十人入省”<sup>⑥</sup>，时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王雄与陈子龙命许都遣散徒众，仅以二百人受降，这对许

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受降后，又以六十人入省城，更是凶多吉少。许都对此不会没有察觉，他的先锋朱之彪曾告诫他说：“陈司李即不卖我辈，能保巡按不卖司李乎！”<sup>⑦</sup>许都之所以无条件地请降，目的在于表明自己实非蓄意谋反并希望“能为国家用”。而事实上，当时所谓“招降”，性质已经改变，许都解散队伍随子龙来降，与按案自首并无二致。弘光时祁彪佳在为左光先辩护时，完全否认所谓“诱降”，他说：“当日兵威所迫，贼已穷蹙，而后乞命，与阵擒无异，非诱降也。”<sup>⑧</sup>祁彪佳说的不错，的确与“阵擒无异”，但是，如果许都等人知道必死无疑，还有必要急于投降吗？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的十分中肯“（许都）感知己一言，投戈就缚，此岂悖逆之人哉！激于贪令无以自明，不得已而走险耳。使赦其死，令率所抚众渡江逐贼自贖，将必有得当以报者，而顾使梟俊之士骈首同尽！”<sup>⑨</sup>

义军去山寨后，官兵犹托名搜剿，纵火烧民居，杀人者数十里。许都等人归降后，金华士大夫必欲杀之而后快，陈子龙不得已，“以兵护降者”。押解至诸暨途中，又遇刑科给事中姜应甲，他劝陈子龙将许都“诛之于途”，子龙以“杀降不祥”而拒之。<sup>⑩</sup>抵达杭州后，官府迫于浙中二三荐绅之论，背信弃义，执意将许都等人正法。巡按御史左光先因忌子龙功，“即论杀都”<sup>⑪</sup>，陈子龙极力阻拦，左光先却说：“三城未破可受都降，今穷蹙将就擒，奈何欲受降以宽其罪哉？”<sup>⑫</sup>继而陈子龙再“请诛首恶，释从者”，也遭拒绝。有材料说“光先与东阳令善”<sup>⑬</sup>，“听孙棻言”<sup>⑭</sup>，定要戮之以绝后患，致使许都等六十余人同斩于江浙，都首则悬于杭州永昌门上。事后，左光先等在浙官员不仅不向朝廷上报许都乞降之实迹，还“尽隐孙棻之过，命之复任”<sup>⑮</sup>。几社倡盟者之一李雯在给徐孚远的信中说：“弟不怜许都而怜恚人，

①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②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二《兵垣奏议》下《补叙浙功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点校本。

③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④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⑤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⑥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二《兵垣奏议》下《补叙浙功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点校本。

⑦康熙《绍兴府志》卷四一《人物志四·名宦后·陈子龙传》，康熙五十八年刻本。

⑧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东阳许都余党复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⑨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〇《列传·陈子龙》。

⑩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⑪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〇《列传·陈子龙》。

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八《名宦三·左光先》。

⑬乾隆《绍兴府志》卷四三《人物志三·名宦下·陈子龙》。

⑭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一三《义旅二·陈子龙》，续修四库全书。

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〇《东阳许都》。

不独恚人而怜朝廷，欲用一人而不可得也。”<sup>①</sup>

### 三

分析陈子龙在《年谱》中记叙自己被委“监护诸军”，授权“许以便行剿抚”，却不接受许都乞降，后单骑入山予以模棱两可的许诺，再力阻左光先、姜应甲杀降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陈子龙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事实上，官府定策是剿是抚，决定着许都是选择抵抗还是投降；官府申明归降后生死难料的前途，均有不合逻辑之处。陈子龙如此叙述的目的有二：第一，作为监军，自己虽有“便行剿抚”之权，但并不同意招抚许都，即招抚之意非由己出；第二，在告知许都“已无生理”的情况下，许都仍坚持率部归降，实际上与自愿伏法无异，因而在“义乌杀降”这一事上，表明自己并不承担什么责任。

然而除陈子龙自撰《年谱》中的说法外，其他史籍的记载均与之大有出入，如《康熙》《绍兴府志》载：“子龙曰：‘许都尝执贖于我，一旦为山寇所惑，可招而致也。’于是向许都‘遣谕利害，苟来归，必请之台宪，假以事权，为富贵基。’”<sup>②</sup>这与陈子龙自述拒绝许都乞降完全不同。又如《徐闇公先生年谱》载：“卧子都无他，往抚之，许以不死。”《鮑琦亭集外编》云：“陈公心知都无他，乃许以不死招降之。”<sup>③</sup>《明史·陈子龙传》也未提及拒绝乞降，只记陈子龙对王雄说：“都，旧识也，请望察之。”记陈子龙说降过程，乃云：“乃单骑入都营，责数其罪，谕令归降，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sup>④</sup>“谕令归降，待以不死”，表明官府及子龙的态度十分明确，并非强调“已无生理”。从官军屯粮有限以及山寨易守难攻的局面分析，争取时间，快速平息这场变乱是首先要考虑的，不可能在许都乞降的情况下还执意进剿，监司王雄尚且同意招抚，陈子龙岂敢避易就难，坐失良机？况且进剿并非易如反掌，极有可能先入一场旷日持久的

对抗。因此根据许都与陈子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情况，陈子龙两次拒绝许都投诚令人难以置信。

以常理推之，“自愿伏法”，绝非许都乞降的目的。当时官军仅有五日屯粮，许都占据险要，备有积谷，有的地方“非悬索不能度”，且再吼有路“通台、栝诸山”，可谓“万嶂重阻，不可穷讨”<sup>⑤</sup>。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许都怎肯听信子龙一席话即“自愿伏法”，因此许都本意仍然是希望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陈子龙实际上又夸大了自己的说降作用。

事后，徐孚远对陈子龙甚为不满，曾当面质责子龙：“彼以吾两人故降，今君既负吾，吾亦负都矣！”<sup>⑥</sup>从徐孚远的话中可看出，徐孚远也参与了动员许都投诚一事。可以肯定，杀降并非陈子龙之本意。对此，李雯在《与徐闇公书》中断言：“然恚人荐之而卧子杀之，必非卧子之意也。”<sup>⑦</sup>子龙本想留许都为国家出力，不料官卑而言轻，又不能强谏，后来局面非他所能控制，致使陈子龙亦“大以为恨云。”<sup>⑧</sup>即使如此，《绥寇纪略补遗》的撰者仍于字里行间表示了对陈子龙的批评：“子龙初以国事之故，出身定变，既而怵浮言，挠众论，不能强谏以致都于死。”<sup>⑨</sup>陈子龙为了以正视听，洗清干系，在其《年谱》中对此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并强调：“夫都以书生为逆，虽降必诛之，以为后戒，亦法之正也”，只是“造隙之贪令不除，乞降之实迹复晦，世将必疑予为诡士也，故表而出之。”<sup>⑩</sup>

东阳义乌之变声势浩大，震动了朝廷，崇祯帝“深为根本虑”，十七年（1644年）正月三十日招对文华殿，鉴于“库贮不满二千”，谕户部尚书倪元璐：“目前务措百万以济边需”，倪元璐回奏：“外解未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东阳、义乌之变”<sup>⑪</sup>。于是崇祯帝“召辅臣问方略，议发诸道兵。不数旬得报功疏”。<sup>⑫</sup>许都之变发生在崇祯十六年末至十七年初，明王朝业已风雨飘摇，江浙地区一向为明廷赖以生存之根基，许都之变有动摇根本的危险。

①李雯：《蓼斋集》卷三六《与徐闇公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②康熙《绍兴府志》卷四一《人物志四·名宦后·陈子龙传》。

③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一二《传·徐都御史传》。

④《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

⑤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⑥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另一说为徐孚远贻书质责子龙，见陈乃乾、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

⑦李雯：《蓼斋集》卷三六《与徐闇公书》。

⑧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⑨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⑩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⑪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卷四，王云五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⑫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关于许都之乱，吴伟业在《绥寇纪略补遗》中对当事官员有着尖锐的批评：

其一，他认为：“夫都一书生，能得众，其才必有大过人者。当朝廷拊髀良将，曾不能有一言之荐俾知之，此浙中任事者之过。”

其二，朝廷的责任在于“纵贪令及监司之庸，且悖者以激变”，“致十数豪杰生受泉悬之惨，死蒙叛逆之名，良可痛也”！

其三，他指出，观许都“去巢穴，散徒众，束身于知己之一言，夫岂轻信子龙！诚以举事本无此心，故急余自明，庶几一有所出以赎罪。”

其四，他认为明季台谏诸人“好以文法议论挟持上下，而按臣专生杀”，特别指出如左光先，“特以兄故<sup>①</sup>，由明经拨用，庸而无断，怯而无谋”<sup>②</sup>。

其五，许都归降后，山寨被纵火夷荡，致使数十里内，“良民无聚庐焉”<sup>③</sup>。其后各路官军继续以搜捕余党为名，株连无数。数旬之内，郡邑吏仍“以军兴法自得斩刈人民”。对此吴伟业说：“造隙之贪令不除，受降之实迹不报，官军奉调后者，无所分功，则以搜余党为名，多所披抉，而官吏因缘其间，株连无算，报仇者四起。”他悲叹言：“此辈之罪，岂出反者下哉！”<sup>④</sup>

“义乌杀降”一事对陈子龙触动很大，虽然朝廷以招抚功擢其为兵科给事中，但子龙内心却“深痛负都”<sup>⑤</sup>，以祖母病重求归侍养为由，历辞不赴<sup>⑥</sup>，知道南明弘光政权成立，才又起兵科。后来他提出“收天下伪才以免乱”<sup>⑦</sup>，显然是吸取了浙东许都之乱的教训；从社会安定与人尽其才的观点看问题，这一建议还是可取的。

“东阳之乱”很快得到平息，但官府的取胜并非全在进剿，而是采用先付后杀的办法，手段未免卑鄙。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反而留下了极大

地隐患。正如李雯致书徐孚远所言：“自此以往，反侧子遂无投戈事矣。”<sup>⑧</sup>许都“以抚见杀”后，其部下人数众多，为了避免死灰复燃，当事官员“诛求颇甚”。在这种情况下，许都旧属许嘉应、丁汝章等“复纠余党入山”与官军对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再破义乌，继而夜袭郡城金华，五天后又围东阳，直到杭州把总何永勳、金良洪率兵千人赶到，才得以解围。浙江巡抚黄明俊闻便，唯恐事态扩大，亲率兵二千人增援东阳，时攻城者已退，于是命何、金二人“札邑城，分兵把守”。许都余部东山再起，震惊了南京的弘光政权，马士英“急欲发内营兵”围剿，兵部尚书张国维“力言不便，乃止”<sup>⑨</sup>。

虽然许都余部很快又被镇压，但朝廷开始追究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激变之责。八月二十日，弘光帝在给浙江巡抚黄鸣俊的奏批中说：“左光先诱杀许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动。着鸣俊即相机剿抚。”二十三日，又谕兵科：“许都初降终杀，激变遗殃事情，着在朝浙臣实奏。”陈子龙回奏言：“东阳再乱，全因县官诛求激变。”接着吏部开始查勘东阳县令，九月初三，奏姚孙某贪酷，激变东阳，弘光帝谕旨下：“姚孙某贪横激变许都，尚敢搜卖贼产，日事诛求，激成大祸，罪不容诛。左光先力庇贪令，毒流东越，都着革职拿问。”<sup>⑩</sup>因东阳“县官诛求诛累，致反侧生心，无辜骇遁，该抚按全无一语纠参，养贪遗祸”<sup>⑪</sup>，故又罢新任浙江巡抚黄鸣俊，降新任巡按任天成，<sup>⑫</sup>自此，东阳县令贪酷酿成激变、左光先杀降、县官诛求不已再酿大祸的事实终于揭示于天下，故此陈子龙在疏中说：“昨见东阳令姚孙某已为宪臣所纠，人情大快！”<sup>⑬</sup>

“义乌杀降”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无人再敢举荐或招徕豪杰之士，李雯致信陈子龙说：“亚夫知刷孟，唯

①左光先，桐城人，东林六君子左光斗之弟。天启四年由乡荐，“知建宁县，以异绩入西台，按部两浙”。见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四六《人物志·宦绩·左光先》，乾隆元年刻本。

②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③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年谱》卷中。

④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下《附纪·义乌杀降》。

⑤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〇《列传·陈子龙》。

⑥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一二《传·徐都御史传》。

⑦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三《议·诸将才》。

⑧李雯：《蓼斋集》卷三六《与徐闇公书》。

⑨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徐都之变》。张国维即东洋人，所谓“不便”，首先应指当时南京的防务吃紧，不便分兵；其次，一旦官军进剿，必然所至屠掠，株连无数，对东阳等地的破坏令其不可不虑。

⑩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东阳许都余党复乱》。

⑪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二《兵垣奏议》下《浙东兵乱疏》。

⑫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东阳许都余党复乱》。

⑬陈子龙：《安雅堂稿》附录二《兵垣奏议》下《浙东兵乱疏》。

恐吴楚先得之，恚人之荐是人，亦此意也。”又说：“贪庸之吏不能为天下爱才，而为天下构祸也，如此岂不痛哉！今山左河北为许都者不乏，弟曾上书宰相劝其招徕豪杰，所谓不利为寇利御寇者也。然此信一闻，又恐其以荐引草泽为前车之戒，当复奈何！天下事真以闭目袖手为第一义。苟一人跃治，必有物以难之，此真可叹也。”<sup>①</sup>

关于东阳之变，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无不流露出对许都等人的惋惜，吴伟业等人在记述此事时，仍称许都等受诛者为“豪杰”[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云：“悲夫，有生亦大矣！都虽任侠自恣，使其审于大义，度时观变，俟征书之责以徇国家之急，岂不与处渊争烈哉！乃行小惠，比匪人，激于所发妖梦是践，身陷大辟，祸延家国，此生人所为戒也。”<sup>②</sup>

“许都之乱”虽然时间不长，但反映出的问题确实多方面的。许都家实中产，他领导的起义并非缘于土地关系紧张或赋役沉重，而是要铲除贪官污吏，数日内即有数万民众相随，足以证明当地百姓对官府虐政的怨恨。

许都为诸生，属缙绅阶层，这场以读书人为核心的反虐政、反贪吏的斗争，显现出一部分缙绅与明朝官府的对立关系，有助于我了解明王朝走向覆灭的原因。“许都之乱”表明，明末揭竿而起者成分复杂，由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以许都为代表的读书人起事的意象并不十分坚定，常常迂回于造反与杀“贼”之间，正如陈子龙所言：“此等人用之可得其死力，不用亦能为变。”因此在是剿是抚的选择上，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决策往往失误。许都与几社、复社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和行动也深受几社、复社名士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复社实政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实践。在体制上，这一事件反映出明末巡按御史过于权重，缺乏对其必要的监督机制，因而决策失误率也高；这也是陈子龙等复社人士提出“重将权”、“并监司之权，以予太守”、“督抚之权当重”的原因。总之，“许都之乱”留给治史者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温睿临所言：“即此一事，知明之所以亡矣！”<sup>③</sup>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李雯：《蓼斋集》卷三六《与陈卧子书》。

②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治乱·许都之变》。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之《徐都御史传》强调：“既杀（都），而何公疏下，已召之”；黄节《徐孚远传》则云：“而何刚之疏始下，已召都矣”（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一《徐孚远传》，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据此可知，当是时，朝廷“征书”已下，而许都已起事。

③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一〇《列传·陈子龙》。

杨海英

## 书《唐将书帖》后

编者按：《唐将书帖》为朝鲜时代古文书《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中所收的一批书信，作者大部为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南籍东征将士，如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刘綎、戚金及一些南兵教师等。通过这些书信及揭示的背景，凸显出这场战争中南兵的特殊作用及其所具的鲜明时代特征，也可看到这场战争给朝鲜——这个明朝最重要的藩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与变化，并重新展示了这段历史的丰富寓意。在弥补中国史籍缺失的同时，提醒我们，必须注重类似保存在域外的汉籍文书乃至域外材料，以充实我们的研究，增加国际学术对话中的话语权。

《唐将书帖》为韩国保存的朝鲜古文书《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之一种，所收虽为朝鲜宣祖（1568~1608）时代著名相臣柳成龙的家族文书，但《唐将书帖》的作者却均为明代万历援朝战争期间的东征将士。

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发生在十六世纪末的朝鲜半岛及所属海域，为中、朝联军与日本之间的国际战争。硝烟虽已散去四百年，历史遗产却历久弥新。

柳成龙，朝鲜宣祖时代著名大臣，安东人，字而见，号西厓，早年从学于李滉之门，明宗十九年（1564，明嘉靖四十二年）中司马试，两年后登第，选补承文院，隆庆元年（1567年）荐入艺文馆，历任修撰、正言、吏兵曹郎、吏曹参议、副提学、都承旨、大司宪、递任礼曹判书兼同知经筵事，弘文馆提学，出入经幄二十五年，遂入相。历任刑、兵、礼、吏诸曹判书、左议政、领议政。

宣祖二十六年（明万历二十一年）“以首相独当中外机务，天将咨揭，日夕旁午，诸道奏牍，东西交集，成龙左右酬应，敏速如流。”<sup>①</sup>有追记壬辰（1592年）抗倭事实的笔记《惩毖录》行世。

《唐将书帖》总共43通，其中有确切作者的25通，署名包括明朝总兵刘綎2、戚金3；参将骆尚志3、陈寅1；游击王必迪6、吴惟忠1、李化龙1、副将游击沈惟敬1、明朝兵部标下练兵千总邵应忠与兵部原委平壤管粮委官董元1，领兵教官郑德3；骆尚志标下旗牌官张三六1、主事袁黄标下教练徐文1、吴惟林1等，余为“名别居”、“名正具”、“名不具”或“名具端束”、“名具正幅”、“名具正束”、“贱名别居”等未署或另署名书帖18通。结合书帖内容及书法形式等进行考察，尚能断定作者的有11通，余6通作者俟考<sup>②</sup>。

书信的形式分为启、拜帖、揭帖、书等几类。

①《朝鲜宣祖修正实录》（以下简称《宣修》，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41，宣祖四十年（万历三十五年）五月癸亥，1日。

②朝鲜《古文书集成》第16册，第177~264页载有《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类·唐将书帖》手书原件，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4年版。所有手书原件的摄影工作，得到本院民族和人类学研究所江桥师妹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另《古文书集成》第52册，第571~598页则是《唐将书帖》的正书体印刷本，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2000年版。按：本文研究结合这两种版本，前者称A，后者称B。正书本识读有误者在文中以[ ]标出，以下所引书帖均出自这两处来源，不再一一注明，书帖序号为原书16册中的排列顺序，以大写阿拉伯数字表示，A为手书页码，B是52册正书页码。另：根据第37通书帖内容判断作者或为管粮主事艾维新或通判张三畏，仍需确证，故作者确切者仍算36通。

时间确切的有二份。一份是万历二十二（1594）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主事袁黄标下将官邵应忠、董元致柳成龙书；另一份是万历二十五（1597）年十二月初九日游击李化龙之书。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这批书信是明朝东征军先后两次入朝（从万历二十年底至万历二十八年大部撤回，即1592~1600年）期间的数年内产生的。这些书信，翰墨淋漓，四百年后看起来依然如夕。

查考《唐将书帖》的作者，除总兵刘綎《明史》有传，吴惟忠、陈寅、沈惟敬在《明史·外国传》的《朝鲜》及《日本》传中被提到过外，其他人均无考，在相关的明史书籍中也找不到多少像样的材料，包括《明实录》在内。至于各地的方志，虽有少数提到个别人物，但文字记载寥若晨星，令人所知甚少。这些曾经名闻遐迩的抗倭将士，至少已经寂寞了四百年。

通过数年的查考和走访，结合柳成龙的文集以及其他朝鲜及中国官私史籍的记载，现已可知这些书信作者的大致情况，粗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南兵“三营将”——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之书；二是南兵教师（包括邵应忠、郑德、徐文、张三六等人）的书帖；三是其他作者，包括著名总兵刘綎、中日和谈的首席谈判官、译员沈惟敬、总兵戚金、李化龙、陈寅等人。通过他们的亲历亲闻，我们不仅可以复原四百年前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珍贵场景，也可聊补国内相关史籍寥落的缺憾。以下就作简要介绍。

### （一）南兵“三营将”之一：参将骆尚志之书

《唐将书帖》中，数量最多的是南兵参将骆尚志致柳成龙之书，共有八封。除明确署名的3通（第十一、十八、四十通）外，尚有5通（第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四十二通）亦可断定为骆尚志所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是东征经略宋应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乌等处之人，与吴惟忠兵无二，虽骆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余名”<sup>①</sup>——骆营所属兵将数600余名，成为一个鲜明的标志——这六百名或应视为亲丁<sup>②</sup>。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府（慈溪县今横河镇洋山岗村）人，以钦差统领浙直调兵神机营左参将率

兵入朝，膂力绝伦，能举千斤，故号“骆千斤”，“体甚肥大”，凡事躬亲，“造车之时，亲持其役”，虽然性急但“为人表里如一”<sup>③</sup>。未署名的第二十八通书曰：

径读。敝营官兵原额六百余名，除阵亡、病故等项，见在不满五百矣。所费行粮，较之别营一日之需，可济我兵十日之用。今奉文撤兵回国，闻得前路驿站，钱粮不敷，有碍进发。倏想敝营官兵自守义州及破平壤，东至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为国除氛，颇有尽心之效。但兵少贼多，不能如愿悉扫为恨耳。今因给散关内解来坐粮，故停缓一二日，准拟初十日官兵先行。烦念久戍之劳，乞先发一文或差一官于前途，如开城、平壤诸处，预备大米百数包接济，足彻始终之盛德，何如？如何！否则，各营人马将至矣，恐不能普及，千乞吹嘘于户曹，速赐预图之，不惟生之感佩，足见贵国少分优劣之阶耳。冯妇多端，弗嗔幸甚。名别具冲。（二十八/A234~235/B589）

从“原额六百余名”可断定此书为骆尚志所作。他谈及所余兵士不满五百，经历从义州、平壤、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战守，“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的情况，也与南兵营的历史实际相吻合。再从时间上判断，当是万历二十二年初接令回国之前，恐撤归路途断粮，希望朝鲜相臣柳成龙早作预备。又未署名的第二十四通书曰：

正适闻荣登贵国首辅，诚贵国有幸，砥柱中流而永赖矣。果不负苍生之素望也。曷胜庆贺庆贺。今生与贼为邻，操戈无息，变出不常，何时是了？自南原拒贼之后，而营心设备机宜、劳工修造，将竣而调赴大丘、八莒，与刘总府合营防御。正采寨木，将完而欲成栅，又为庆州报警，率兵急奔救援，动辄人先，官兵怨苦。溪岷鸟道，极目边涯，暑往寒来，经年旅邸，征人莫不惨伤。及诸营到后，方据山立寨，或木或土，成坦俱草苫栖止。生因执木调度，被树节偶伤左腿赚脊，俄尔成疮，形如小碟，动履艰难，痛不可忍。饮食俱废，勉强支持，在此陪臣无不知见。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里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复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荡，延至安康，离庆

<sup>①</sup>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9，《移本部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台湾华文书局据万历刊本影印本，第769~770页；参见卷4，《撤薊辽等七道及艾主事》（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81页。

<sup>②</sup>按：朝鲜方面的记载都谓骆部有步兵“三千”名，如申钦：《象村稿》卷39，《韩国文集丛刊》，法人财团民族促进会1991年刊本，第72册，第370~371页、《朝鲜宣祖实录》（以下简称《宣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34所载《天兵各营领兵数》均同。

<sup>③</sup>《宣录》卷29，宣祖二十五年八月庚子，13日；卷36，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己未，4日。

州北数十里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诘料贼众漫山寨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至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叹。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二十四 / A222~225/B585~586）

此书当略早于前书，当书于万历二十一年底。其中提到南原战后，与刘总府、吴游府共事，采木修城，且“所部不满六百”者自为骆营无疑。骆尚志还曾亲自执木调度，被树所伤，成疮难行，这与他凡事躬亲的个性特点也相符合。文中提到十一月初，日军六路连营袭击安康，骆营担任守营后应之责，而前往拒堵的吴营军士则颇有损伤，但最终守住了庆州这个“各县运粮通衢”，也是不小的战绩，这不是骆氏自夸，也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认可：“庆州得免丧败，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县，尚未瓦解者，实此一战之功也。”<sup>①</sup>

在骆尚志的所有书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一通：

……近因倭奴畏成效顺，让还朝鲜，退回日本……既而送还尔国储君，并被掳居民及剃发为倭者，一一还之，是亦□□之意也。今闻贵国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恐彼反怪无情，谢□不杀之恩，有言回去之说，又恐尔国法度森严，归则既付法曹者有之，是皆处之无可奈何耳？为今之计，理宜与诸公陪臣议之，何不将计就计，宥其既往之愆，原其来归之意……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复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待不来，待吾有以待之。何如？军务纷纷，草草布达，此亦富国强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乐业，岂不美哉？骆参将。（十一 / A204/B579）

在这则署名书帖中，骆尚志建议柳成龙将曾经降倭的朝鲜人组织起来，教习操练，增强实力，防备将来再犯的日军。柳成龙立即接受其建议，上书朝鲜国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箠筩、长枪、用剑、鸟銃、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

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完全引用了骆尚志的原话。

柳成龙的《西厓集》集中，颇有记叙与东征将士往来的文字。其答骆书曰：“前日老爷所教操练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为切要。虽孙、吴复起，其为小邦谋不过如此矣。……近于城中召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数十，伏愿老爷先下营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阅歌舞者之依趁节奏，择城内房屋闲旷之处，逐日训习，以试其成否如何？所选四十余人，其中十余人乃炮手，其余枪、剑、箠筩、阵法，随其所习，无所不可。又已令京畿诸道，挑选习斗骁健者，各数千余人，以相传习，千万怜察而指挥之，使小邦生灵永蒙老爷之恩，以有辞于万世也。”<sup>②</sup>至此，朝鲜兴起练兵之事——人数虽少却级别甚高，初在汉城的数十人，均住南兵营中，与南兵同吃同住，“南兵一人主教一人”，由南兵手把手地进行教练，除了专门学习火炮的十余名炮手，其他枪法、剑法、阵法等各有专人教习，还有京畿诸道“各数千余人”，等待“以相传习”。

与柳成龙共同负责练兵事宜的还有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他曾建议：“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并试于科举以变沈痼难改之习，恐不无利益。”国王答语有“前在关西，予力言火炮训练[练]之事，曰教一以教十，教十以教百，为有司小不动念”。<sup>③</sup>《纪效新书》是逝世于万历十五年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所作的练兵书，此时被东征将士带到朝鲜，引起了朝鲜君臣的注意。

在朝鲜尚未馨动之时，正是东征经略宋应昌及南兵营将骆尚志等及时倡议并具体指导朝鲜君臣的行动。宋应昌认为：“朝鲜士卒虽柔脆难用，而鼓舞有方，调度得法，即弱可使强，寡可使众。”万历二十一年八月，他正式移咨朝鲜国王：“亟行全罗、庆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选膂力精壮军人，以多为善，即使陪臣管辖，尽发副将刘綎、吴惟忠、骆尚志等营……令其所服衣甲与南兵同，所执器械与南兵同，令各营教师训练起伏击刺之法与南兵同，不数月间自与南兵无二。倭来则助我兵以与战守，由此渐渐增加，渐渐熟练。”<sup>④</sup>这样的“三同”

①[朝鲜]李好闵：《五峰集》卷13，《吴游府惟忠前揭帖》（癸巳），《韩国文集丛刊》第59册，第521页；参[朝鲜]申灵：《再造藩邦志》卷2，《大东野乘》七，朝鲜古书刊行会1971年版，第569页。

②[朝鲜]柳成龙：《西厓集》卷9，《答骆参将尚志书》，《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第193页。

③《宣录》卷48，宣祖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庚申，11日。按：《宣录》所有“训练”均当为“训练”，以下不一一改。

④《经略复国要编》卷6，《与参军郑同知赵知县书》（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第461页；卷10，《檄朝鲜国王咨》（同年八月初四日），第805页；另八月八日《移咨刘綎谕帖》（821页）、八月十二日《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838页）也都提到类似的话语。按：文中“副将”之称概为筩统称呼，不确。

训练法，是将明军战术精髓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朝鲜军队。其所谓的“各营教师”，仅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所报标下就有“教练把总一员，段胡；南兵教师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贵、金忠、龚子义、丁言、娄虎、何元贵、社其、张子龙”<sup>①</sup>等。

朝鲜正规军的训练就此开展起来。此前，承平 200 年的朝鲜王朝“对国防和军备没有采取过适当的措施”，“军队未能很好地训练”，“国防设施没有任何效果”<sup>②</sup>，面对日军的侵略，除了分散、自发的义兵抵抗外，并无多少像样的作战。朝鲜国王也曾训示：“备边司自前处事弛缓，经贼二年，未尝炼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俟贼退，无乃不可乎？……予意别设训练都监，差出可合人员，抄发丁壮，日日或习射、或放炮，凡百武艺，无不教训议议处。”<sup>③</sup>其中提到“经贼二年，未尝炼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俟贼退”的基本事实，是很难被否认的——明朝“天兵”的作用，不仅直接体现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在训练朝鲜军队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因日军退出汉城，集结到釜山一带，明朝舆论转向撤军息战，和谈使沈惟敬等数度出入日营，穿梭联络。朝鲜国王急急传教政院：“经略言留兵之将，尔国可意之人请之云云，骆参将并请如何？非此人，恐无以学习、训练。”<sup>④</sup>对于留防将领的人选问题，朝鲜方面属意南兵将骆尚志<sup>⑤</sup>、吴惟忠、刘綎等共留，并以大臣尹根寿、韩应寅、李德馨等大力周旋于经略宋应昌及提督李如松处，却未得同意，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等于次年正月前后均撤归国内<sup>⑥</sup>。

撤归之前，骆尚志致书柳成龙：

正汉城匆匆话别，且承贵国主厚待，多方冗费，皆公等推爱所致，言莫以谢。其各项防御炮火、阵图、进止及武艺、御敌机宜，生势不及久居教演，已托委官闻愈等代生以为授受之勤。倘或略有次第，即当遣发归来而莫迟滞，感感。余情缕缕，使回冗夸，不及详裁，幸弗深罪，谢谢。书吏金彦希勤劳，亦希拔擢。谢谢。贱名别具。慎余。（二十七 /A232~233/B588）

此书亦未署名，但“委官闻愈”直属骆尚志营，在柳成龙的文集中有明确的记载：“都城八方操练之事头绪渐见，此乃闻、鲁二子体奉老爷吩咐，尽心纲纪之效，敝邦之人方以为幸，不意相继沦逝。”他回忆道：“癸巳四月……骆公来访……仍言练兵备倭及他守国之要甚悉，余于是募得京中人七十余名，令军官二人统之，分为二队，送于骆公阵下，请学南方技艺、鸟銃、筏筩、长枪、用剑等事。骆公拨营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亲至卒伍中，手自舞剑用枪而教之甚勤。余以其事驰启行在，此我国训练之所由起也。既而骆公还中原，余请留教师数人，公临行在西郊，为留闻愈、鲁姓人而去。二人体公之意，二年在国中训士，昼夜几尽成才，且教营阵之法，不幸相继而死，槁葬城内。至是，二人姓亲来护丧柩而去，时骆公在薊州，寄书于余，请护送其丧，余答书云云。”<sup>⑦</sup>骆尚志等撤回之后，委官闻愈等继续留居朝鲜，助其操练军兵。

闻愈其人，“尝与戚启[继]光同事，其作《纪效新书》也亦同参云”<sup>⑧</sup>。作为戚继光的亲军老将，闻愈到朝鲜时的身分是“千总”，他不仅“谙炼火炮制度”，且为人“甚温雅”。与其同事者还有骆尚志中军贾大才，“各

①《经略复国要编》卷 4，《报石司马书》（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293 页。

②以上未指明出处者见[朝鲜]李清源《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宣传省 1955 年版，第 25、33、4 页。

③《宣录》卷 41，宣祖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庚子，19 日。

④《宣录》卷 39，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庚寅，7 日。

⑤按：骆尚志曾考察过朝鲜汉城宗簿寺基、宫城废墟等处，认为形势甚好。其“亲戚”周元谓李德馨：“我欲以管下兵留此习阵，以教贵国。而各军虚费粮料，顿无遣归之意。我若先送，则诸兵亦相继而归。我兵撤回后，若得换来南兵五千或三千，使我统领，而不受他人节制，则庶可小伸已志。且我回还之后，你国咨奏请留我，则我当只率手下数人，轻装还来。”虽难以断定是否另有私意，但依常理判断，多少还是表现了骆尚志欲留之意。参见李德馨《骆总兵周览正殿遗墟启》（载《汉阴文稿》，《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版，第 8 册，第 275 页）。

⑥《明史》卷 320《外国传·朝鲜》载：“（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倭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时师久暴露，闻撤，势难久羁。应昌请留刘綎川兵、吴惟忠、骆尚志等南兵合薊、辽兵共万六千，听綎分布尚之大丘，月餉五万两，资之户、兵二部。先是发帑给军费已累百万，廷臣言虚内实外非长策，请以所留川兵命綎训练，兵餉令本国自办。于是诏撤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谕朝鲜世子临海君肆居全庆，以顾养谦为经略。”包括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等三营将在内的南北兵大部撤回，仅议留刘綎兵，后亦撤。

⑦《西厓集》卷 9，《答骆总兵书》，第 194 页。

⑧《宣录》卷 48，宣祖二十七年二月癸丑，4 日。

样武艺妙绝无双”，当时为了留下这两位“必有大益于国家”的人，朝鲜君臣还颇费了一番心思。<sup>①</sup>闻愈、贾大才等南兵教练，不仅武艺了得，还各具才干，身怀绝技，被朝鲜君臣视为成就“大事”的适合襄助者。

与闻愈同时留下的另一教官名叫鲁天祥<sup>②</sup>，他们成为朝鲜新成立的军队训练机构——训练都监中的第一批南兵教练，为训练朝鲜军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两人几乎同时逝世于汉城，或是遭遇疾疫不及医治？时为东征大军撤回的最后期限。柳成龙答书，点出了骆尚志及所属南兵教练对朝鲜的意义，为训练朝鲜军队作出的贡献与牺牲——朝鲜军队的重建和训练，首先得益于明朝东征军的教导和南兵将、南兵师的艰苦工作。

闻愈死后，“闻愈手下”的胡汝和与王大贵等继续留任教官之职，与中军贾大才等一起训练朝鲜官兵。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朝鲜兵曹启：“今者天将及教师相继卒逝，而千摠，中军俱被论，群情不无解体。故今日臣大会各军于南别宫东门外，且请王大贵、胡汝和点阅试才，其中最为成才者略给赏布，而不勤教诲哨官，则随轻重施罚，使之警勅勉励，逐日练习，以待贾中军回来。”<sup>③</sup>不仅显示出自然条件的恶劣导致明军将士和教练相继卒逝，明朝国内的矛盾和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居朝鲜的军士教练。但即使在遭遇时艰之际，南兵教练依然训练朝鲜军士，坚持不辍，显见成效。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朝鲜国王见训练院炮手，具

备“我国数百年所未见之军容。其貌样、服制一依天兵，各知部伍，虽不试才，揣见其可用。”<sup>④</sup>次年四月，朝鲜国王检阅练兵场：“观今日习阵，则我国所无之阵法，且似已熟习。此由领相平日勉力之功，予甚嘉焉。”<sup>⑤</sup>大大表扬了柳成龙、李德馨与天朝教师劝奖教练之功。

这些朝鲜军队的早期训练师，除经略宋应昌所派教师，如“宋侍郎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处”<sup>⑥</sup>外，大都出自骆尚志营中：如朝鲜郎厅派人往质于“骆参将留营之人骆尚忠”处，他是骆尚志的“亲属”，属官闻愈、中军贾大才及继任者胡汝和、王大贵等。他们前赴后继地训练朝鲜军队，在朝鲜这块土地上贡献出自己的才华甚至生命。

这些训练师无一例外均属南兵将。无论是骆尚志及其亲族、属官及“最晓阵法，人物亦甚温藉”的金文盛，还是在军中教练朝鲜军士的刘綎等，均为南籍人士。东征军中的南兵师和南兵将，训练出一支朝鲜军队，这在历史上是一件不能忽视、影响达数百年之久的大事：“令总兵骆尚志等，选我国丁壮，教演浙兵技艺，设训练都监，以都体察使柳成龙、刑[兵]曹判书李德馨董其事。”<sup>⑦</sup>尤其是对朝鲜来说，“成龙去位，皆废不行，独训练都监仍存，至今赖之”<sup>⑧</sup>。这个机构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末期被日本占领之前，为朝鲜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骆尚志等南兵将和南兵师的启蒙作用和功绩，尤其不可被忽略和忘记。惟以题目所限，将另撰文详探。

## （二）南兵三营将之二：游击王（楼）必迪之书

①《宣录》卷47，宣祖二十七年一月辛卯，12日。参见李德馨《请留贾大才闻喻两人教练火炮启》：“骆总兵手下深于各样火炮及剑枪之技者三四人留住教兵事……各兵俱有归思，总兵难以强留，从自愿留。……有中军贾大才，各样武艺妙绝无双，千总闻喻，自戚继光在时从事于行阵间，熟谙火炮制度，两人甚温雅而才又如此，留之必大有利益。臣令通事李亿礼从容闲话于此两人，以探其意。闻喻云老爷令吾等就校场教演数三日，此非造次成就之事，尚书因欲愿留，则我姑退行为留一旬云，教兵大事，机会不可失，若措辞移咨于总兵，恳请留此二人，则总兵不无勉从，而渠等亦必以此事为重。敢启。”（《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8册，第275页）可见，闻喻[愈]等人起初并无长留朝鲜的打算，只以骆尚志所令及应柳成龙、李德馨之请，暂抑似箭归心，欲“就校场教演数三日”，未曾想却永远长眠此地了。

②《宣录》卷49，宣祖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三月癸未（5日）朝鲜国王传教于政院：“闻千总[名愈]既逝，鲁天祥又歿，非但警[惊]惨，国事不幸如此，训练之事不可一日而弛。”参见《宣录》卷75，宣祖二十九年五月丁卯（1日）训练都监启：“闻俞天将也病卒之侄继皋、鲁天祥之兄天伦，今当护柩而归，骆总兵抵臣等书帖，有路远资乏语。闻、鲁两人，尽心于我国之事，客死异域，亲党委来，扶柩归家，情事极为矜[矜]恻。前日王大贵、胡汝和即厚待而遣还，此人等不可以生死异看。即夕，继皋等贻书于都监又如此，二人功劳回咨磨炼时详细叙报，其遗下对象，亦详问于洪允申等，作一印文，给送不妨。观此书帖，则渠又恳望路费。闻继皋银十两、鲁天伦银五两并礼物，令该司题给慰送何如？”传曰：“依启。”

③《宣录》卷49，宣祖二十七年三月癸未，5日。

④《宣录》卷46，宣祖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戊辰，19日。

⑤《宣录》卷50，宣祖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庚申，12日。

⑥《宣录》卷43，宣祖二十六年十月丙戌，6日。按：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4，《报石司马书》（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提到的标下“教练把总一员，段胡；南兵教师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贵、金忠、龚子义、丁言、娄虎、何元贵、社其、张子龙”（第293页）等11人，到后来只剩金文盛等7人，估计也是牺牲了。

⑦《再造藩邦志》卷2，第558页。按：此处的刑曹当为兵曹之误。

⑧《宣修》卷41，宣祖四十年五月癸亥，1日。

《唐将书帖》的作者中，署名游击王必迪的量多居首，共有六通，另有2通无署名者亦当为其所作。如：

期服生王必迪再拜。……今我南兵驻守庆州，与贼伊迹，兵寡力疲，不堪屡战，况日夕哨伏，无时休息。毋论先后阵亡将四百人，感病物故贵国者已二百余人矣，俱系良家子弟应募而来，望博功名，今踵籍而死，莫非皆贵国累也！昨承惠布，骆爷兵四百余人，每□得分布二疋，本营三千官兵，除各死亡外，见在二千三百余人，五六名不得分布一疋。彼此均系南兵，共成一营，而受惠有厚薄之殊。官兵多有愤闷而不平者。庆州天将，吴、骆、泊[洎]不佞止三人耳，地方官供应馈送之类，每每厚薄有无不一，同为贵国而分等第，别厚薄，恐非所以服人心也。不佞扶病奔驰，将已半载，更二舍侄，均病死于此异域，征夫每为伤感，贱恙转增，即不佞惧不能自保时。每欲乞归而大马倒死，苦乏骑坐，动辄艰难，每有不可愆者。（三/A184~185/B573~574）

这是一封报告驻守庆州南兵状况的重要书信，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一年夏。王必迪，浙江义乌（今义亭镇王阡村）人，号吉吾，以军功授金华所千户，历任蓟镇崔黄口守备，升北京神机营游击转中路游击将军<sup>①</sup>。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与游击楼大有等领兵渡过鸭绿江，前往朝鲜抗倭。<sup>②</sup>此信为其入朝半载后所作，报告营中现状，自平壤战役后至驻守庆州期间，其所率三千南兵阵亡400余人，病故200余人，已减员20%，其中包括他的两名侄子<sup>③</sup>——王营军士的原数是3千名，在此得到印证，可见朝鲜方面的记载也不甚可靠<sup>④</sup>。必迪往往自称“侍生”，或“期服生”，年纪较大<sup>⑤</sup>，资格亦老，个性鲜明，说话几乎

从不拐弯抹角，对与同驻庆州的其他两营（骆营、吴营）南兵的不同待遇提出抗议。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之战，是明朝东征军大部入朝之后，与日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主要运用火炮优势，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辉煌战果。王必迪率南兵1500名参加了战斗。柳成龙致王必迪复书有二，其一为癸巳三月所作，表彰了王必迪所率的南兵功绩：“老爷总统南兵，自平壤之战，异绩尤着，表表在人耳目。远近之人以及稚童贱妇，莫不以老爷为依归。……诚以南军之宣力最多，而老爷之诚心惻怛，所以怜悯小邦者，特出于寻常万万故耳。”<sup>⑥</sup>明军光复平壤、开城后，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也告恢复。但因随后提督李如松以少数亲随在碧蹄馆与日军遭遇、受挫，明军主力撤回平壤，日军也退往釜山一带，明、日进入媾和阶段，明将李如松、宋应昌等撤回国内，“只留游击将军王必迪守开[城]府”<sup>⑦</sup>。

柳成龙曾有一个总结：“平壤战后，李如松退回，留王必迪独守开城。至四月初七日，提督还开城府。十九日贼兵弃城南去。二十日，提督大军入京城。先是余贻书王必迪曰：‘贼方据险固未易攻，当进驻东坡、坡州，蹶其尾，选南兵一万，从江华出于汉南，乘贼不意，击破忠州以上列屯，尚州以下之贼，疑天兵大至，必望风遁逃，京城之贼归路断绝，必向龙津而走，因以后兵覆诸江津，可一举扫灭。’必迪击节称奇策，拨侦探军三十六名，驰往忠清道义兵将李山谦阵，察贼形势，时贼精兵皆在京城，而后屯皆羸疲寡弱。侦卒踊跃还报，云不须一万，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将，是役也痛抑南军，恐其成功，不许。”<sup>⑧</sup>在此，柳成龙透露在日军退出汉城后，曾与王必迪商议，欲抛开

①熊人霖纂：《义乌县志》卷10，《人物表·武职表》，崇祯十三年刻本，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希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7册，中国书店2006年版；参程瑜、李锡龄等纂：《（嘉庆）义乌县志》卷12《武职》，民国十八年灌聪图书馆石印本。

②参《宣录》卷33，宣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己亥，13日。按：此处未言明王必迪所率人数。另《宣录》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11日丙寅所记《天兵各营领兵数目》曰王必迪“领步兵一千五百名”，但这应该不是其原领有数。

③按：王必迪出身于将家子，其父（即温廿六公）为随戚继光入闽抗倭将领，兄弟五人：必进、必遇、必周、必达、必迪。二兄必遇为钦授把总，四兄必达为福建哨总，均阵亡于福建，称“双烈”，其本人亦以战功得授金华守御所千户，并随戚继光镇守长城北边。其在朝鲜阵亡的二侄，或为长兄必进次子大猷（钦授中路城子岭千总）、四子大成（钦授西路千总）。参见王懋德《贺吉吾将军荣擢崔黄守戎序行球九十一》，载王梦松撰：《（义乌）铜峰王阡楼氏宗谱》卷16《赠序》及卷2《世系图》，光绪丙午重修本，第75、76页。楼氏旧谱共有23册，包括光绪卅二年丙午本（王梦松撰）、民国九年庚申20卷本（骆益三撰）；民国廿四年乙亥本（楼柄文撰）、民国卅六年丁亥本（楼松涛撰）等，内容以光绪丙午本为多。本文所引义乌籍各兵将谱书，得到义乌方志办吴潮海、张金龙先生大力协助寻访而得，特此致谢，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④《再造藩邦志》卷2载：“副总兵王必迪领南兵一千……咸统于世爵。”第492页。

⑤《铜峰王阡楼氏宗谱》卷5，《世行传》载：“温廿六公之五子，球九十一讳必迪，吉吾，任蓟镇三屯营统领南兵正总兵官，袭金华守御所千户……生于嘉靖二十年辛丑七月初十日寅时，卒于天启元年辛酉三月三十日。”（光绪丙午重修本）可见当时王必迪已年52。

⑥《西厓集》卷9，《答王游击必迪》癸巳三月，《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第190页。

⑦《再造藩邦志》卷2，第513页。

⑧《西厓集》卷16，《记壬辰以后请兵事》，第310页。

北兵，单独利用南兵一万名<sup>①</sup>，一鼓作气，对日寇横扫穷追，王必迪亦派兵侦探，并与忠清道的朝鲜义兵将李山谦取得联系，探讨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但被明军高层、统帅李如松等制止。

朝鲜君臣对南兵的期待和倚靠表露无疑。柳成龙有个经典的解释：“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幅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sup>②</sup>南兵的身形、面貌，尤其是着半臂五色衣很值得注意——看来他们没有统一的军服，冬天穿羊皮大衣，不喜欢小米，生活习惯与北兵完全不同，却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柳成龙的看法，代表了朝鲜君臣的意见，他们往往只认可南兵。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朝鲜李好闵在《请兵粮奏文》中也斩钉截铁地说：“复破此贼，非得浙兵不可。”<sup>③</sup>朝鲜人所称的浙兵，只能说是狭义的“南兵”，还有江南、福建、两广之兵，而总兵刘綎所领西南地区的苗兵，包括云贵川等地的土兵、狼兵等，在中国史籍中往往被称为西兵，他们也应包括在广义的南兵范围中。

南兵驻守开城期间，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还曾目击：“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士兵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僉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僉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sup>④</sup>这里显示的明军内部矛盾非常具体，主要集中在平壤战役之后，王必迪等所率南兵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事先许诺的奖赏也不到位，尤其是李如松仅率近卫先锋驰往碧蹄馆，陷入优势兵力的日军包围，失利后“挫气而退”不愿再战，必迪

所云道出南军不满以及南北将帅之间的不同意见，而作为东征提督的李如松被当众揭短，自然尴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银子息事宁人，但对南兵将领的意见显然没有采纳，东征军中的南北矛盾相当尖锐。

在明朝与日本酝酿第一次媾和之际，王必迪等所率南兵移住庆州，遭遇时艰，基本生活也发生困难。如：

……本营客戍已久，数月以来，风雨暴露，俱患伤寒痢症死者接踵。感事兴悲，不胜□惋。乞垂念官兵之苦，有盐酱惠赐一二，感当何如？（十 / A201/B578~9）

此书无名，据内容、书法推断当为王必迪所书，显示当时援朝明军在吃、住、医药等方面均很匮乏，生活条件艰苦，兵员无法补充，损耗极大。柳成龙有万历二十一年八月《答王游击（必迪）书》，就解释了朝鲜方面进行调度的困难，并“谨将鹿紬四端、茶食二百叶，奉呈行橐，而盐六包，略备营中支給之需”。<sup>⑤</sup>结合《朝鲜实录》中“刘綎、吴惟忠等兵留防岭外，有食而无盐菜。”<sup>⑥</sup>及“骆总兵、吴游击时驻庆州城中，军粮乏少，已曾累次启闻，近来放粮之际，蒸米交杂，或继或绝。当日则骆总兵部下四百余名，仅以黄豆支給，他余军卒，自明日更无可支之米”<sup>⑦</sup>的记载，可知明军不仅遭遇断粮，即使有粮，也往往无盐无菜，东征军士生活普遍困难，但各方都在极力克服，共济时艰。

尔国遭此大难，又兼兵马蹂躏地方，居民困苦，不忍见闻，良为叹息。承惠牛八只，又返其原价，足彻大义，谢谢。查得应付驮载军器四十余只内，有无主跟随者十一只，皆瘦弱不堪，以八只留犒三军，三只完璧，希查收发票为照，其余牛只，通候事完之日发还，特此示知，见存牛四十五只。谨具云履壹双，绶帕贰方，侍生王必迪拜，奉申芹敬。（三十四 / A248~249/B593~594）

王必迪此书反映的就是困难之中，朝明双方互相体谅、同舟共济的情形。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明将也没有放弃战备。王必迪致柳成龙书中，也谈到安康战役中本营的状况：

期服生王必迪再拜启。昨寓八莒，具尺一申，候谅登记室矣。十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里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

①按：一万应是当时入朝南兵的总数，正是总计南兵三营将所领南兵的数量。

②《西厓集》卷10，《答金士纯书》癸巳二月，第206页。

③《五峰集》卷12，《请兵粮奏文》（册封天使李宗城逃遁后奏请文丙申四月），第501页。

④《宣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乙巳，20日。

⑤《西厓集》卷9，《答王游击书》癸巳八月，第191页。

⑥《宣录》卷39，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壬辰，9日。

⑦《宣录》卷46，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戌，1日。

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贼寇，久戍于此，祇增汗颜。皮箱、顺袋已收，另跟役褙物件尚未见掷，已差役走领，虔此布谢，不尽惓惓。外上好大样花席乞代多寻数条，其价容奉偿也，特恳。（二十二/A217~218/B584）

万历二十一年十月的安康战役，参战者主要是驻守庆州的南兵三营将。当时，日寇数万分六路直扑安康，此为朝鲜运输军粮、接济大军的必由之路，如果失守，半岛南北陆路交通面临断绝危险。在庆州府治30余里处，朝鲜兵使高彦伯、朴毅长等，各率精兵，连日血战，“抵敌不住”，南兵三营将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商议之后，“抄发诸营兵千数百人，出城迎战，杀伤相当，毕竟贼势浩大，难以赌胜，官军颇有损折，而贼亦力疲，经夜遁归”，虽然此役三营将出战兵力达千余人，仅王必迪营阵亡兵丁即有216名（外加丁壮多人），但“庆州得免丧败，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县尚未瓦解者，实此一战之功也”<sup>①</sup>维护粮道安全，保障未来作战的基地，其功蔑微。

王必迪归国的时间为万历二十二年春三月。其致柳成龙告别书曰：

期服生王必迪顿首拜谢。不佞滥竽贵国，业已阅岁。多辱雅情，感不自己。足下学裕经纶，才堪振起，国虽残破，而爱养元元，光复旧物，不过一转移之力耳！不佞虽别去，亦全权有厚望焉。脱如妖氛未靖，声势孔棘，必宜再请天王，同室有斗，谅能披发缨冠以揀也。初三日渡江，军冗猬集，百尔私衷，不尽辞缕。季春朔后二日，迪生再顿首。（十五/A207/B580）

王必迪东征归国后，仍领蓟州东路南兵驻守马松之地——当为蓟镇东路马兰、松棚两个驻守点的合称。在《铜峰楼氏宗谱》中，尚存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敕书一份：“皇帝敕谕署都指挥僉事楼必迪：先该兵部议令南兵分为二班，以南将统领回浙。上边三年一换，近年俱不更番，常川驻守。令特命尔充游击将军，统领蓟镇东路南兵驻扎马松地方。务要督兵登台，昼夜了望，遇警极力堵剿，无事照常操练，不许需求科敛，生事害人，听蓟镇总督、抚镇官节制。尔持廉奉法，正己率下，以副委任，毋贪得残僨事，自取罪谴，尔其慎之，故谕，救命。”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证以《明神宗实录》万历

二十二年九月所载“以原任游击王必迪为蓟镇南兵营游击”<sup>②</sup>，可见家谱资料的真实性。

需要注意的是，王必迪在方志中被称为楼必迪，因其“旧从王姓。”<sup>③</sup>，该《楼氏宗谱》尚有一通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复姓本》，称曰：

欽差蓟镇中路南兵营游击将军署都指挥僉事臣王必迪等谨奏，为比例陈情，恳恩复姓，以明世系，以重伦纪纲事。臣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民籍，祖系楼姓，高祖浩五生长子楼澄二，次子楼澄三，即臣之曾祖也。因姑亲全一无嗣，出继为子，从姓改名王珪一，后王全一续娶张氏，有二子珪六七、珪十六，是王氏宗支仍然有在也。自臣曾祖楼澄三以及至臣等，凡四世矣，皆以草莽氓未敢奏请，末由复姓。伏思臣以一介武夫，荷蒙皇上拔居重地，日思捐躯报效之未及，又安敢私家之自便。顾木本水源，忍忘所自？矧今王姓流裔繁衍，反置楼氏于不祀，臣心又何安也。臣伏睹大明会典内开一款：凡官员人等过房乞养、欲复本姓者，具奏改正，钦此。臣又查得戊辰进士叶懋中，系臣族叔也，先世亦因出继母舅叶芳为嗣，寄籍江都县，传历四世。自懋中登第之后，具奏改复楼懋中。臣与前例相同，伏乞皇上俯念下私，敕下该部，将臣等准复本姓，承接楼氏宗支，庶世系不泯而存歿，永沾浩荡之恩于无穷矣。为此除具奏，蒙通政司取二姓保给宗图外，理合具揭，禀知须至揭帖者。<sup>④</sup>

可见，王必迪是在东征归国之后请准改姓归宗的——因其曾祖楼澄三因姑亲王全一无嗣，过继为子，改名王珪一，已传四世，至必迪立功异域，请准恢复原姓楼氏，遂认夏演楼姓为祖。若不知其中曲折，欲在义乌找到王必迪，还真是缘木求鱼。

王必迪还有一事值得注意。万历二十八年七月，翰林院编修成宪在《赠楼将军晋阶副元帅序》中有透露：“南兵自戊子（万历十六年）鼓噪以来，气愈骄，行愈横，最难束也。将军不苛不纵，有恩有法，故其卒之事将军也，若子弟之戴父兄，将军之使其卒也，如心膂之役手足。操纵指示，罔不效顺。罗文之战，首先诸军，征其素矣。任久而德崇，功高而望重。乃晋将军以副元帅之阶，协守晴岗，李将军暨一时同事者荣焉。”提到自万历十六年以来就经常发生南兵鼓噪事件，但楼必迪约束有方，在安抚南兵过程中颇有表现，故得到提升副总

①《五峰集》卷13，《吴游府惟忠前揭帖》（癸巳），第521页；参《再造藩邦志》第569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77，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刊本，第5127页。

③崇禎《义乌县志》卷10，《人物表·武职表》；参嘉庆《义乌县志》卷12《武职》。

④《铜峰王阡楼氏宗谱》卷1，《复姓本》。参朱之蕃《贺吉吾楼将军请复姓序》，卷16《赠序》。

兵的奖励。文中提到的李将军，如果是指李如松的话，则其与李家将自朝鲜战役以来的紧张关系当有所缓和，原因何在，仍需解谜。

不止一人肯定了同样的事实。同年十月，翰林院检讨孙如游亦序：“往年倭夷震邻，守戍不足备戎行，又举募南兵度辽而征。既奠属国度支艰经费，撤幕归农，有饥而哗于伍者，至烦萧斧。时中路南营佐将楼公简阅有方，凡省几万金，军中帖然，而备亦不弛。兰台使者上最，以廉称优叙，复总计酬勋加今官。……楼公在南营者七年，所以圣天子加官而不移镇，欲士卒服习，纯于教也。余守在史籍，不能历行阵睹楼公所教何状，而其门下士持牍而来乞言为贺。”<sup>①</sup>明确指出楼必迪安抚的正是从属国征战归来以饥饿而哗变的南兵，不仅省万金且令军中帖然，不知所用何法，惜文人未曾细述。南兵的特殊作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此已初露端倪。

### （三）南兵三营将之游击吴惟忠书

吴惟忠也是驻守庆州的南兵三营将之一，与骆尚志、王必迪齐名，字汝诚，号云峰，浙江金华府义乌（今夏演吴坎头村）人。“幼习诗书”，“自嘉靖四十年寇扰台州，始奋志从戎”<sup>②</sup>，“以武生应募，累功授松门卫指挥，万历五年升蓟镇大毛山提调，转三屯营游击将军，升三屯[屯]参将，十九年奉旨取用，授石匣游击，转海防参将，总督南兵出边援朝鲜，论功升海防加衔副总兵。”<sup>③</sup>吴惟忠致柳成龙书云：

侍生吴惟忠拜：不佞未入朝鲜，闻公盛德，忧国忧民，常以未识刑[荆]为恨。继渡鸭江，询及鲜人，口碑啧啧，真可为鼎鼐之器也。慰甚，喜甚。见今倭奴退屯釜山，尚未下海归国，况倭奴狡猾诡谲，兼熟朝鲜道路，

则窥视之情，必不能免。纵使倭归复来，侵扰尤未可知，诚不可不豫防之也。所提防者，在冲要之地设险以御之也。但釜山东连庆尚，西接全罗，均属要害，地理形势，莫知其详，难以区画。敢伏足下，奋投查勘，自釜山东连庆尚以及大丘、善山、高灵、陕川等处，西抵全罗以及南原、求礼、头趾、阴山等处，倘别处可以御之者，又须相机处置，不可泥于此说，必择以寡敌众之地为妙耳。宜当分析要见，某处极冲，设险可御大敌，某处次冲，设险可御中敌，某处稍冲，设险可御小敌。某处有江河贼船可否通往两岸，可以制御否；某处多山，某处至某处，路程多少，及总括四面极冲要路并咸镜各道贼势，由海有无可乘之处，兼赐备细画图贴，说明白速为教之，未识尊意以为如何？……（八/A197~198/B577~578）

吴惟忠致柳成龙之书，当是平壤战役后，日军退守釜山、明日进入媾和之际所作。他以特有的军事眼光，为承平日久、武备松懈的朝鲜政府领导和军队防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所虑非细。结合方志记载及《柳溪吴氏宗谱》所载吴惟忠的《行传》<sup>④</sup>，可以清楚知道其由武生应募、从戎抗倭及随戚继光奉调蓟镇、驻守山海、修葺长城、东征援朝，最后告标回卫的经历。作为戚家军中的抗倭老将，吴惟忠曾随戚继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所附《创修溧阳驿记》即有“乃率左、右二营史君宸、马君承允、吴君惟忠诚诸部士鸠材塞外”之语，时系隆庆六年底<sup>⑤</sup>——则至其出征朝鲜，吴惟忠至少已在长城北边驻守了二十年。他先后两次出援朝鲜，是东征军中在朝鲜留下最佳口碑的一位明朝老将。

援朝战争初期，吴惟忠为钦差统领浙江游击将军，所率四千南兵，于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渡江入朝，

①《铜峰王阡楼氏宗谱》卷16，《传序》；《贺吉吾楼将军进爵副元帅序》。

②吴福梅等：《柳溪吴氏宗谱》卷9，《内纪文集》，金志宁撰《赠云峰将军分镇边城序》；吴思撰《云峰吴将军传》及李洵瑞撰《云峰将军履历功次荐本考语缘由书记于左》等，民国廿六年丁丑重修本。按：该谱今藏义乌夏演吴坎头村吴云飞先生家，共十卷，云飞先生所藏九册（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缺卷三《系图》之一部分。

③崇祯《义乌县志》卷10，《人物表·武职表》。

④《柳溪吴氏宗谱》卷4《行传》载：“棣四次子，显廿三，讳惟忠，原名涧，字汝诚，号云峰。于嘉靖四十年由武生礼授台州把总，本年四月廿七等日台州花街白水洋、小藤岭、长沙血战四捷，本年十月内调剿江西流贼。弋阳县上坊攻破巢贼，由寇功，奉左府守字二千九百四号勘合覆（方）授金华所世袭副千户。四十一年八月内授福建克复宁德县及地方救回被掳男妇二千余口，夺回原抢永甯卫百户所印二颗功，升海门卫指挥僉事。隆庆二年，奉钦依取赴大毛山提调，隆庆五年，升三屯标下右营游击。万历五年八月内，升山海关参将。七年六月内回卫。九年仍管调探营参将事务。十一年三月内回卫。兵部尚书王一鹤题请，奉圣旨行取，赴部推补三屯右营游击。二十年十月内奉出关应援朝鲜，廿一年正月内克平壤、进开城、复王京，堵草溪、全、庆、尚追寇拿对马岛。廿二年九月内功升御寇副总兵，九月到任。二十五年奉救援朝鲜。本年由寇功，命下加都督僉事，遇大将员缺推用。廿五年任钦差蓟辽保定等处地方军门标下御贼副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僉事，于廿七年奉圣旨诰赠祖父都督僉事。廿九年告标，奉旨回卫调治。”他生于嘉靖癸巳十二年，卒于万历癸丑四十一年，享81岁，出征朝鲜之年已届60，确为老将。第66、69页。

⑤戚祚国汇纂：《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0，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0页。

是最早入朝的东征先遣部队，十二日抵达义州，在叶邦荣、姜大有等督率下，同钱世祯、王问、王必迪等人明哨侦察兼护粮草。<sup>①</sup>在平壤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攻城时“中铅洞胸，血流腹肿，而犹能奋呼督战。”<sup>②</sup>战前，东征经略宋应星曾特嘱兵部主事袁黄：“吴惟忠素称名将，门下当私以鄙意，谕渠努力建功，后必首叙。”<sup>③</sup>朝鲜人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sup>④</sup>“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游击亦中铁丸，千总一员竟至殒命。”<sup>⑤</sup>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外。

第一，平壤战役之后，酬功之言久不兑现。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东征经略宋应昌亦言：“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sup>⑥</sup>说明平壤酬功事事迟缓，宋应昌希望内阁首辅王锡爵能留意此事，尽快促使事情得到解决。但王锡爵五月既已致仕，恐怕对解决此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第二，战前宋应昌曾许诺、战后也得到承认的“首叙”之功，最后归之于杨元：“门下与戚将军等冒险先登，功居第一。”<sup>⑦</sup>杨元是经略宋应昌的中军官，之所以得到特别对待，或与其论援朝之际，首倡“献策召募江南沙船沙兵，聚为精锐，退为故业”有关，故被“重授署指挥僉事充海营中军指挥官，前往召募”<sup>⑧</sup>。先入为主是否有很大关系？结果则是众论不平。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总督顾养谦言东征始末：“平壤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归之杨元，则众论不平。”宋应昌的表现颇有耐人寻味处。顾的结论是：“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sup>⑨</sup>还是道出了部分真情：平壤酬功不平导致了南北矛盾，吴惟忠成为首当其冲的政治牺牲品。

平壤酬功事件象口难测的深井，预示着吴惟忠及所领南兵未来的坎坷命运。朝鲜左议政尹斗寿曾报告：“吴则铁丸正中中心，病势危急，卧而见臣，亦为功高不录于首功，心里怏怏，以此病势尤紧。……吴、李两将病势深重，吴则至于欲得柏子棺板，屡发于言辞，大概骆、吴二将攻破此城（指平壤），功无与伍。臣闻定州染源山有柏子木，亦可为棺板，速令斫取回报便当。”<sup>⑩</sup>郁闷之余，吴惟忠病倒，病情甚至一度严重到将料理后事的地步。李德馨也曾上启：“臣见吴游击对坐款款，吐尽心曲。又出见所撰各衙门禀帖一册，前后皆是再请南兵之意……手自指示紧要处曰：‘此等说话，大触忌讳，故终被除官。官则吾不愿做，但虑时事日非耳。’仍脱衣示铁丸所中处曰：‘李提督乃谓吴某非真中铁丸，必是假作而要上功，天下安有此事耶？’”<sup>⑪</sup>看来吴惟忠后来也明白了自己一再请求参战，触犯了某种忌讳。

日军退出汉城之后，由沈惟敬主持的明日和谈行动已经展开。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日军攻陷晋州，杀军民六万。“天将骆尚志、查大受、宋大斌等及我国将洪季男等皆退次。已而刘綎遣军援南原，骆、宋诸将始与我国李薺等人守南原城。贼遂卷兵还晋州，仍归海上，复议和事。”<sup>⑫</sup>骆尚志、宋大斌等虽回守南原，却只能着眼防守。

吴惟忠却不肯专守。宋应昌就说：“骆尚志与吴惟忠同守尚、庆州，今尚志禀称乱民烧掠，而惟忠独报倭贼抢掠；尚志安守不动，而惟忠独轻率渡江深入，以致损军最多。明系贪功，咎将谁诿？……游击吴惟忠，好大喜功，寡谋轻敌，驱杀无知乱民，不足为武，伤折远戍我军，实已损威。……所当革任者也。”<sup>⑬</sup>具体损失数

①《经略复国要编》卷4，《报石司马书》，第285页；《报赵张二相公书》，第300页；《檄领兵官李芳春、房时暉、钱世祯、吴惟忠、王问、王必迪等（十八日）》，第246页；《檄姜大有、叶邦荣督吴惟忠、钱世祯等兵（二十九日）》，第260页。参《宣录》卷33，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游击将军吴惟忠领步兵四千过江。”非常接近实际数字，《象村集》卷39记载吴惟忠壬辰十二月“领步兵一千五百出来”或有问题，但丁酉“领步兵三千九百九十，六月渡江南下”则相当准确，惟《实录》记载时间晚两日。

②《再造藩邦志》卷2，第503~504页。

③《经略复国要编》卷5，《与袁赞画书》，第363页。

④《宣录》卷35，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19日。第1690页。

⑤《宣录》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己巳，14日。第1659页。

⑥《经略复国要编》卷6，《报王相公书》（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第498、499页。

⑦《经略复国要编》卷6，《与中军都督杨元书》（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第470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251，万历二十年八月辛亥，第4683~4684页。

⑨《明神宗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壬寅，第5037页。

⑩《宣录》卷34，宣祖二十六年正月己卯，24日。

⑪《宣录》卷47，宣祖二十七年正月丁酉，18日。

⑫《宣修实录》卷27，宣祖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一年）七月癸巳，初一日。

⑬《经略复国要编》卷12，《参失事将官疏》（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第1021~1022页。

字是：吴惟忠折损官兵 227 名，陆承恩下甲兵 49 名，骆尚志兵 24 员名，提调马禹卿、李为瑚下官兵 27 员名。此役吴营的损失，与驻守庆州的王必迪军旗鼓相当，但后者却不被注意。“癸巳九月，（吴惟忠）同骆尚志、谷燧等连营在庆州。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盖其时尚志戒勿轻战也。”<sup>①</sup>南兵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出于对保存实力的不同考虑（如骆尚志原本六百名，折损之余存四百），但当事者“好大喜功”的意见恐别有居心：吴惟忠承担了明军失败的所有责任。对此，利害攸关的朝鲜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至以安康大举之贼为我国叛民，而则吴游府以贪功轻战，竟至隳职。此岂非小邦天亡之秋！”<sup>②</sup>

《宣祖修正实录》也记载：“倭兵掠庆州安康县，天兵战不利。倭久屯海上，以完和事为言，而时出抢掠、收粮谷。刘綎移书行长责之，行长答书‘此贼倭之所为，非我所知。’至是，焚荡安康县，取仓谷累千石去。高彦伯、洪季男等不敢击，但钞零贼献级而已。时天将吴惟忠、骆尚志、马禹卿在庆州，出兵千余人，阵于城外，见倭兵少，长驱直进，发炮杀贼数十。既而倭兵舞剑突前，天兵不能抵当，一时溃退。背有大川，争先涉水，衣甲尽湿，不能运步，贼自后乱斫，死者二百余人。贼初畏天兵，自是意甚轻之，我人亦无所恃。”<sup>③</sup>这里提到明军死者仅 200 余人相当不确：仅王必迪营中死者 216 员，吴惟忠军折损官兵 227 名，加之骆营及他营损失，明军安康之役至少折损南军官兵 500 余名——若以出兵千余比例论，则已伤亡过半——明军固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保持了粮道畅通，这一点《朝鲜实录》的编者却没有提到，反曰日军“意甚轻之，我人亦无所恃”，完全是自灭威风之语，聊长他人的志气，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也许明朝高层考虑的是要保存实力：“今议留兵，原为朝鲜修设选练，本部节行，但欲保守无事即为有功……惟忠为将已久，不审事机，轻率渡河，贪冒功级，

致伤军兵。……姑行申饬。”<sup>④</sup>但若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挑衅也视而不见，那也枉为“天兵”了。吴惟忠积极迎战的态度违背了“保守无事即为有功”的原则，被点名批评，充当替罪羊，固然不令人意外，但实在是不公平。

吴惟忠归国之前，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与三营将骆尚志、王必迪等，同受到朝鲜国王接见。惟忠不平曰：“朝廷以俺安康之战，为捕杀乱民，乃至参劾亏官……此则小不挂念。但边报阻拦之事，俺甚痛惋，须以贼情详报朝廷。”<sup>⑤</sup>很显然，他忿忿不平的不是自己个人的遭遇，而是边报被阻、实情被瞒的现状，这与当时明廷中枢倾向议和的战略意图相一致，与此相违背的，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朝鲜国王也替吴惟忠打抱不平：“实是先锋，身中铁丸，功冠诸营，非徒不蒙赏典，反以我国之事至于被参亏职，不胜悲愤，直欲吁天而无从。”唯以送礼表示慰问而已。<sup>⑥</sup>

首次归国与第二次出征之间，吴惟忠曾被“革任提问”——其履历单上亦无记载，成为一个谜团。《柳溪吴氏宗谱》卷九：“（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内，功升御寇副总兵，九月到任。”<sup>⑦</sup>此说升职与朝鲜国王所说“被参亏职”恰恰相反，或许是升职在前，亏职在后。同年十月初三日，辽东巡抚李化龙有疏：“查得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兵数，前者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募募兵银内，或即于台兵内抽补，令驻扎山海、石门等处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sup>⑧</sup>奉旨议行。这则材料因有残缺，未能显示吴惟忠的职衔。但首次东征后，吴惟忠所领南兵撤回辽东，驻扎山海关、石门等处，守台操练，并陆续募足 3700 名，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可见入朝参战的吴惟忠部确有近 4 千兵员，虽在第一次朝鲜战争中有所损失，回国后又募足原数，需银 8800 余两。

但是，吴营近 4 千南兵，三年后已不足 2 千。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兵部有一题本：“原议调发蓟镇南兵二千名，今招募未集，部伍不敷，照议增一千七百八十

①[朝鲜]郑琢：《龙湾见闻录》，《宋经略书》，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藏本，第 67~70 页。

②《五峰集》卷 13，《兵部差官周基处书给赠帖（癸巳）》，第 522 页。

③《宣修》卷 27，宣祖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亥，1 日。

④《经略复国要编》卷 12，《檄刘綎》（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 994~995 页。

⑤《宣录》卷 47，宣祖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二年）正月癸巳，14 日。

⑥《宣录》卷 47，宣祖二十七年正月乙未，16 日。

⑦《柳溪吴氏宗谱》卷 9，《内纪文集》，李洵瑞撰《云峰将军履历功次荐本考语缘由书记于左》。

⑧李化龙：《抚辽疏稿》卷 1，《募补浙兵疏》（按：原疏有残缺，此处暂按疏意加目），明万历刻本，载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69 册，第 17 页。

五名，并台兵共足三千七百八十五员名。……今议原任副总兵吴惟忠堪领浙兵，杨元堪领辽兵。查得吴惟忠先经革任提问，杨元革任听勘，缘事未结。但系紧要用人，责令立功赎罪，应如所议，各以副总兵职衔，令其领兵前往效用，合用旗牌，照例请给，俟有功之日，一体议叙。”<sup>①</sup>证实吴惟忠确实“原任副总兵”，但被“革职提问”；同时也显示吴营减员幅度极为惊人：蓟镇吴营南兵原近4千，何以2千也凑不足数？其中的蹊跷需要一明确解释，吴又因何“革职提问”？

或许前引李化龙所疏吴营募兵所需行粮月费共8800余两银子的事实，是个重要肯綮。16世纪末17世纪早期，“募兵年饷银为18两”<sup>②</sup>是通行的标准。正如宋应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乌等处之人，与吴惟忠兵无二，虽路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余名，以上各官兵俱系远戍，似宜一视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将官、千、把总等官廩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sup>③</sup>算下来则是年薪43两余，比通行标准高出不少，实因出国作战“饷银必须加倍”<sup>④</sup>，且副、参、游、都一日支廩给米五升，廩粮银一钱；千总一日支廩给米三升，廩粮银八分；把总一日支廩给米三升，廩粮银五分；管贴队军丁一日支米五合，盐菜银三分，一日支折色总给银五分<sup>⑤</sup>。待遇还比较优厚，因此，应募东征才成为一件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另有记载：“奈何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士马尽撤回籍，刘綎兵已还四川，其天津、登莱戍守南兵俱各议罪。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人心迄愤惋，故召募鲜有应者。”<sup>⑥</sup>东征南兵撤回之后被议罪、战前许诺的攻城赏银也落空，南兵鼓噪于石门寨——这正是吴惟忠军驻扎之所！至此，吴营南兵被杀的事实浮出水面。朝鲜人则曰：“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

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sup>⑦</sup>时间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被杀南兵人数达3300余人。前后两条记载的人数虽有参差，但南兵索要钱粮、鼓噪被杀之事显然不虚。

《明实录》的相关记载是：“加京营游击陈云鸿游击职衔，与原任游击季金，统押防海南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继叙“时防海南兵鼓噪，既已命将押回，兵科给事中吴文粹等复恐首恶未必正法，撤留未必宜合，欲勅兵部严饬该镇将，将解京首恶务得真正主谋，回南各兵官军加意防范，俱毋苟且纵容，兵部覆请报可。”但御史马经纶复言“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然向来鼓噪止协众要恩，今则渐成逆乱，若复过为姑息，不行尽数驱逐，貽患必深”<sup>⑧</sup>，主张从严处理，将南兵从“要恩”鼓噪的一般群体事件，升级为“逆乱”性质，为屠杀埋下了伏笔——如此对待浴血奋战、以性命博取酬金和功名的东征将士，实在令人心寒。

朝鲜人卢稷观察到：“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怼者，拿致提督之旗牌（官名）数罪梟首，故提督以为乱兵，介介麀刘。”李德馨也提到：“以月银不给事，人多怨詈。而李提督以我庆州安康（属县名）之战败，归罪于南人，罢斥吴惟忠。惟忠将罢归乡里，孙军门劝惟忠留军门云矣。”看来主将吴惟忠被削职，也是引发南兵愤慨的导火线。石门仓或石门寨同为一地，吴惟忠兵即驻扎于此，而“都督必杀石门仓”意味李如松也与事件有牵连，“杀害南兵之事，天下莫不怨骂石尚书、李提督”<sup>⑨</sup>，看来兵部是后台。

总兵王保在屠杀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兵鼓噪本非仅见，但“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亦有滥及居民者。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交章论之，言南兵以要赏结聚，本无逆谋，及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台，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且传言杀

①《宣录》卷86，宣祖三十年（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己卯，19日。

②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4页。

③《经略复国要编》卷9，《移本部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第769~770页。

④《经略复国要编》卷7，《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第593页。

⑤同上，卷4，《檄蓟辽等七道及艾主事》（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81页。

⑥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卷4，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90~291页。

⑦《宣录》卷69，宣祖二十八年（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戌，30日。

⑧《明神宗实录》卷290，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乙丑，第5381页；卷291，十一月己巳，第5383页。

⑨《宣录》卷84，宣祖三十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丁未，16日。

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惨，何可胜言。”<sup>①</sup>明朝实录的记载也显示：南兵不过以要赏结聚，而蓟镇总兵王保挟淫威滥杀无辜，是惨剧的主要责任人，戴士衡、汪以时曾请严勘；但被马文卿力阻，罗织“南兵之大逆者有十”，而为屠杀者戴上“早见密谋、转危为安者有三”保护伞，兵部据以覆请免行勘覆，上如部议。

可见，围绕南兵鼓噪事件，朝廷舆论颇有分歧，前台御史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背后的斗争也峰回路转，而兵部则站在南兵的对立面，支持严惩舆论。至十二月，“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凌迟斩首有差，仍令梟示各边镇”<sup>②</sup>。滥杀无辜的王保等人得到姑息，一个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就这样被轻易抹平、放过了。吴惟忠部损失半数以上，戚继光北戍长城的南兵精锐几近丧失，狡兔未死而走狗已烹，出现这种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感叹当事者的短视外，也说明部分文臣武将对国事轻重完全不以为意，他们的个人素质直接影响到国力兴衰、边防御固。时论有曰：“臣闻曩者南兵之变，盖帅臣统驭失宜所致，又闻朝鲜苦我兵骚扰特甚，皆缘诸将不能禁戢。今宜亟返故辙，抚臣孙矿虽当移镇，总督尤宜慎择一大将，往领各处募兵。”<sup>③</sup>这代表的不仅是个别闽籍官员的意见，实在是历史的要求。

无可否认的是，屠杀南兵事件，从根本上说还有制度的缺陷。因经济矛盾引发军纪问题（如王必迪曾向李如松索要赏银，及马经纶所言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明代财政制度的缺陷，一直是军队的软肋，兵饷支付体系久成问题，如南方数省军队的“供给方法是在抗倭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sup>④</sup>。援朝期间所需的军费，很大部分来源是太仆寺的马价银，宋应昌调兵伊始，则从山东布政司借支“泰山香税银或登州府库贮民屯银共五万两”<sup>⑤</sup>，依时价召买粮料供应军前，而召募水兵——江南沙船沙兵的经费，除动支太仆寺马价外，尚有“南京兵部车场租银”<sup>⑥</sup>一项，因此，替军队找钱成为任事者不得不承担的一项职责，粮

饷供应不及时或拖欠现象屡见不鲜。

为害最烈者自然就是拖欠军饷，索要赏银或钱粮的士兵正当行为，却使当事大臣动了杀机，尤其是对备尝艰辛的东征撤归南兵，问题尤显得不简单——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兵，或许是被当成了难以摆脱的包袱，以为天下太平再无可利用之处，将其以武力押送，强行解甲归田。虽“兵部以倭封就绪，议撤沿海水陆官兵，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回天津议撤。督抚报：蓟门与天津冲缓不同……况各兵弃农从戎，归无所依，一概撤回，健士可惜。部据以覆：除愿归农者，厚给资饷，令归；愿充兵者，查台操见缺填补，未尽补者，责成新任游击李皆春加意操练，陆续候补，从之。”<sup>⑦</sup>更了解实情的督抚与兵部之间意见分歧，虽兵部表示愿充军者可补台缺，愿归农者可“厚给资饷”，从结果看，显然是没有做到而导致惨剧发生。从吴惟忠军募足原数就需近万两银子看，军饷问题实在是一个令筹饷部门头疼的大问题。但问题不能不解决，在此也需要格外关注明代财政大臣在这个时期的努力。

东征善后处置失宜引发恶果，还说明明代军制的变革过程充满艰辛。南兵的主要来源是募兵，他们的积极性和果敢能战性，在《唐将书帖》中已有生动的表现。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实行的募兵制，虽已颇有时日，但运行起来仍不顺畅，尤其是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体系支援的情况下。即使同为南兵，不隶军籍者也“所在多有”<sup>⑧</sup>，如何妥帖处理东征各项善后事务，合理疏导来源不同、身份不同的南兵归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关系到明代军制变革成败的大局，断不是一杀即可百了的事。更何况日军还在朝鲜沿海地区虎视眈眈，撤兵和谈本来就在朝廷引起极大争论，若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讲，无疑是个错误举措，而处分东征将士、甚至屠杀南兵，更是错上加错，使艰难的军制变革过程雪上加霜。

吴惟忠前后二次东援朝鲜，留下极佳口碑，甚至是众口一词。“丁酉来驻忠州，性清严，与士卒同甘苦。前后出来将官，无不克减饷银，而独无（下转第59页）”

①《明神宗实录》卷291，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第5392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92，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辰，第5403页。

③黄华秀：《预防倭患疏》，载张冲等撰《皇明留台奏议》卷15，《兵防类》，台北广文书局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印，第41页。

④其特点是所有资金由地方筹措而非户部管理，额外征派，独立核算，来源极为多样化，如嘉兴府的五总陆军中有募兵一总，军兵和民壮各2总，另外还有水军一总1500人，其中募兵为“耆舵”，军兵为“贴架”，迟至1597年，所以的战船都是租来的，兵饷则出于嘉兴府库。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七章《财政管理》，第382~384页。

⑤《经略复国要编》卷2，《移山东抚院咨》（万历二十年十月十九日），第147页。

⑥《明神宗实录》卷251，万历二十年八月辛亥，第4683页。

⑦《明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己丑，第5358页。

⑧《明史》卷91，《兵志》三；参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上册，第四章第四节“明代中后期军事制度的变化”的有关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547页。

丁颖生

## 明朝御倭援朝史纵横谈

明朝时期，中朝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明朝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明朝称臣，朝鲜国王需要通过明朝天子册封，朝鲜向明朝进贡耕牛、马匹、纸张和苧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但这时的朝鲜宫廷，斗争异常激烈，屡次发生政变，国内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三百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

万历十年（1582），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同年，日本中部尾张国（今爱知县西北部）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他的统一事业。丰臣秀吉以大阪城为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初步结束了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丰臣秀吉是蒙元以后蔑视中国氛围熏陶出的一代枭雄，在日本天下未定，他还是织田信长的部下时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后来他在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惟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从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丰臣秀吉人心不足蛇吞象，一直想征服东亚。加上他派遣很多武士间谍到中国调查，发现明朝国力衰弱，朝纲不振，是个一展宏图的机会。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在当时航海技术较差的情况下，丰臣秀吉要想侵略中国须借道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丰臣秀吉一不做二不休，在第二年把统领全日本的关白（摄政）官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

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于当年四月偷渡朝鲜海峡，从釜山、庆州、金海三路攻入朝鲜内陆，如风卷残云，一路攻陷王京（首尔）、开城、平壤，加藤清正进军到中朝边境图们江北岸，朝鲜几乎全部陷落。“于是，秀吉进驻朝鲜王京，行长占平壤，清正驻安边，倭军沿途屯兵，互为联络，其意为犯辽东而直下北京。”朝鲜国王李昞狼狈逃到中朝边境的义州，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

中国平常视日本为倭岛小国，这时大军汹汹，属国被占，边庭告危，主战主和，争持不下，朝廷犹豫不决，直到很久没上朝的万历皇帝意识到唇亡齿寒“无贻他日疆患”，才拍板“宜速救援”。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增派4万余东征御倭援朝兵力。李如松从宁夏平定哱拜之乱胜利归辽后，尚不及休息即率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万历二十一年初明军兵临平壤城下。守平壤城的是由小西行长指挥的日军18000人（日第一军及第二军部分兵力），加上投靠日军的朝鲜伪军5000人，共23000余人。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毡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和地形险要的牡丹峰。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义乌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平壤攻城战

开始。明军投入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倭军首次领教了明军火炮的威力。朝鲜史料记载：“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火光冲天”，“倭铙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日军战斗力也很强，装备大量射程远的火枪（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阻击明军攻城。战斗非常激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六十多岁的游击将军吴惟忠率领戚家军攻打平壤地势险峻的牡丹峰，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左军指挥官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提督李如松的坐骑被流弹击毙，都置之不顾，冲锋陷阵，愈战愈勇。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防守薄弱的城南芦门，接着含毡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看大势已去，乘夜自东南方向突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又击毙数百日军。明军取得了平壤大捷，共毙伤俘日军1万余人。此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至四月下旬，在中朝军民英勇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大部分日军渡海回国。至此，御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明朝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延了三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明朝断然拒绝，和议最后破裂。

万历二十五年（1597）夏，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朝鲜，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为经略，率领杨元、刘铤、吴惟忠等人的部队渡过鸭绿江南下，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到后来，明军主要受困于粮饷问题，朝鲜当时战乱，导致本来不发达的农业更没什么粮食，明军只能从国内运往，千里迢迢，后勤保障无法跟上，战争就僵持下来。此时，日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应不足，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日本国内普遍对丰臣秀吉怨声载道，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于伏见城。临终前忽又张目嘱咐左右：“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日本人怕军心丧乱，对丰臣秀吉的死讯秘而不发，却在暗地里撤军。十一月，加藤清正率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鲜著名

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七十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数百壮士，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中弹而亡，垂危时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海军。日本陆军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回国。

至此，御倭援朝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粉碎了丰臣秀吉妄图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在这之后，日本看到了自己跟明朝的差距，三百年不敢再战。朝鲜国王则尊奉明朝为母国，等于帮其复国了。

这时期，中日综合国力对比，分三个方面来谈。

经济方面。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一代名臣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扭转了明朝颓势。当时，户部管辖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也增加了三倍。当时，明朝GDP占全球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一亿六千二百万左右，这个纪录直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即清朝康熙王朝后期）才被刷新，人口高峰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兴旺（但人均GDP未能提高，贫富差距增大）。经过十年的积累，万历年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为万历二十年前后进行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创造了物质条件，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几场大战，将明朝的财政积蓄消耗了大半。御倭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因为战场朝鲜损失惨重，朝鲜人家庭劳动力有的被虐杀，有的被俘，有的被绑架到日本做苦力，此外还被日军掠夺了很多粮食、物资、文物等等，援朝明军的粮食、物资、军火都得靠国内运过去，甚至还要支援朝鲜，所以，明朝的财政积蓄消耗甚多，仅用于援朝的军饷支出就约二千四百万两白银，尚不包括马匹、机械、火药等费用。按当时比价，每一个中国人要推到一石米的负担。

当时，日本人口不到一千万，经济总量与明朝相比，更不是一个等级的。日本长期以来诸侯各据一方，内战频发，封建社会集权水平比较低，不能很好地整合国家资源，更是因为国家资源匮乏，对外贸易不兴，经济水平一直不高。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经济经过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的发展，GDP也只有当时清朝的四分之一。

政治方面。万历二十年以后，官场中党派林立，门

户之见日甚一日，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互相倾轧不遗余力，一直持续至明朝灭亡之时（1644年）。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牒者，不曰苏脉、浙脉，则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面言耳。”然而，更严重的是此时神宗开始怠于临朝，除内阁大臣很难见到他，奏疏大多有去无回。明朝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明朝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以后，一直不曾好过。外患严重，内乱重重。这些内乱，总而言之，是昏君奸臣与贪官污吏所逼出来的。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努尔哈赤乘此大好时机已经崛起，于万历十一年取图伦城，十六年取完颜部，十七年取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取长白山部，二十七年取哈达部，至四十四建国称汗……

在日本，因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向各大名要补充兵员和粮响的数量逐步升级，造成日本国力衰微，民众负担惨重，以至于最后九州的岛津氏领内家臣们都造反了。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吉阵营树倒猢狲散，曾信誓旦旦要辅佐丰臣秀赖的“五大老”“五奉行”互相对立，都抛弃了丰臣秀赖而去，丰臣秀吉原来的得力臂膀，“五大老”的首席德川家康最后彻底消灭了丰臣秀吉的残余势力。丰臣秀吉的众多妻妾包括正妻“北政所”在内，也都抛弃了丰臣秀赖和淀君，离开了大坂城。丰臣秀吉遗下的孤儿寡母最后也在德川氏的逼迫下，双双自杀身亡。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

军事方面。当时明朝拥有一百多万军队。明朝前期的军队建制是卫下辖千户所，在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建制不受卫的约束，通常情况下一卫统辖五个所，兵员5600人，总兵力220万左右，扣除锦衣卫等等不上战场的，编制在200万左右。嘉靖以后正规军数量已经大大萎缩了，明末的时候，守关军队在30至50万，内地驻军在90万左右。当时，明朝将领的军事思想比较先进，已敏感地预见到了热兵器在战争中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十分重视热兵器的研发工作。1524年在北京铸造出佛朗机炮，1553年造出铜火铳（滑膛式），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类似地雷），1598年赵士禎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及使用方法。东征御倭援朝作战时，明朝军队给同样装备了大量热兵器的日本军队狠狠上了一课。明军攻克平壤城正是靠着火炮的威力，采取先炮击然后攻城，故意让出一个城门让敌军逃跑，悍勇的骑兵再一路追杀的战法，大破日军。日军的援军来救，远远听到明军火炮声被吓跑了。

日本从1192年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治，这给日本遗下了深远的“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祸根。日本军队经历长期内战，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在亚洲，是仅次于大明帝国的第二军事强国。装备方面，当时，日本军队的装备已经十分先进。战国时期，为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到战国后期，日本已拥有大规模的火枪部队，火枪数量已经达到30余万只，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1575年，日本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发明了“三段击”战术。日军火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铳，但日军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没有远大抱负，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空谈误国，就会被那些虎视眈眈的侵略者钻空子。

二、虽然你爱好和平，但是侵略者的搅局会拖你下水，空耗你积蓄，阻碍你的发展进程。

三、强国必须强军，明朝东征御倭援朝时的国力远胜于日本，但丰臣秀吉仍敢挑起妄图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如果没有明朝将领先进军事思想，没有强大的武器装备，恐怕很难打败侵略者。

四、663年、1592年、1894年、1937年，日本多次挑起侵略战争，特别发生在近现代的两次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葬送了中华民族两次复兴的机会。现在日本又挑起钓鱼岛争端，安倍晋三及其阁僚在修宪、历史、防卫等问题上右翼言行不断。尽管如今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战争的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一定要以务实态度，扎实地做好军事斗争的各项准备，再一次粉碎日本的侵略野心。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回忆抗战时期的倍磊大成小学

朱锦相

我是义乌市赤岸镇上吴村人，倍磊是我的外婆家。由于当时家境比较贫困，1938年就在倍磊读书。1940年春，倍磊办起大成小学，我就到那里读四年级，一直读到1942年的上半年，日寇侵占义乌，家乡沦陷，学校临时解散为止。

倍磊是个大村庄，有一千多户人家。村民大多姓陈，另外也有金氏、王氏等等。1939年以前，倍磊全村分别办了三所规模不等的学校。校舍都设在祠堂里，老百姓就按照习惯把它们叫做“德三公”、“小祠堂”和“九如公”。其实他们都有校名，如我就读的“九如公”，其校名就叫“南屏小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的合作有所改善。1938年10月，吴山民出任义乌县县长，在义乌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气象。如创办了《大成日报》，宣传抗战；改国民党的抽壮丁、抓壮丁为动员参军，创办了“义乌营”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倍磊也将原来的三所学校合并成一所，取名为“大成小学”。

倍磊大成小学，创办于1940年春季，是一所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校址设在倍磊上街头的陈氏大宗祠内。大祠堂规模很大，分为四进五楹。一进是大门；二进为仪门，中间有朝北的戏台，两边的厢房改作教室；三进是正厅，当作学校的大礼堂；四进是寝堂，两边的房屋也改作教室。祠堂东面的附房，也改作一、二年级的教室。祠堂后面的一块空地，做成学校的操场。

学校的学生人数很多，以倍磊本村人为主。也有不少是邻近村庄和外村人。我的同学就有寺口村人、平望村人、毛店村人、何店村人，不过他们在倍磊有亲戚或是老师的亲属。

学校开办之初，就编写了一首校歌。在周一的早上，全校师生都聚集在大礼堂，先唱国歌，后唱校歌。其校歌的歌词是：

双溪秀毓，六石灵钟，大成勋绩，为世尊荣；  
外歼倭寇，内除匪凶，威震四海，复兴明封；  
光复华夏，先建铁血功，奋斗杀敌，后生责任重；  
抗战建国，必胜必成，诸生努力，向前冲。

（根据记忆整理，个别文字可能有出入。）

建校时，学校聘请了当地的知名民主人士陈景开为首任校长。一年后，校长去世了。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胸佩白花，列队前往灵堂吊唁。并写了一首悼歌，同学们在灵堂上齐声哀唱：“安眠吧！先生。用您的心，造成一座伟大的校，这是一个非常时，痛哭许多贤者的死。”同学们的哀悼歌声，寄托着对校长离世的悲痛心情，也感动了在场的众多人流下了泪水。（注：歌词也是根据记忆整理的。）

学校十分重视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在1940年上半年学期结束时，各班级都开展了评比优秀生活动。当时我在四年级读第七册，被评为优秀生第一名，奖励我免交一个学期的学费，并在下半年，免我再读初小第八册，跳级到高小五年级就读。

学校里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紧紧围绕当时的抗战形势，开展各项教学活动。

在学校里组织了童子军。虽然在当时学生做不起统一的校服，却给每人发了一顶写有“中国童子军”五个大字的笠帽，外出时，大家统一背在肩背上，也觉得十分精神。体育老师还教大家操练“大刀舞操”，边操练边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学生们练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唱的。学校还在学期末印发

了歌曲的封面，大家统一装订成歌曲的专册。

在学校举行的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毕业班的同学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其他同学齐唱《送别歌》：“看，太平洋的风云，瞬息万变……期待着你们，有最大的成功带转……”气氛十分热烈。

学校有时还举行文艺会演，学生们演唱《九一八小调》：“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慰劳伤病员》等歌曲和文艺节目，搞得有声有色。

在一段时间内，学校里曾出现了一股“大刀热”：音乐老师教大家唱《大刀进行曲》；美术老师上课时在黑板上画了一把大刀，教学生在纸上画大刀；劳作老师用木片教大家制作大刀；体育老师教大家作“大刀舞操”的操练。这就成了“唱大刀”、“画大刀”、“制大刀”、“舞大刀”的一条龙教练活动。

学校还组织部份师生对外作抗战宣传，在村东北的佛堂方向、村南的寺口方向、村西的埠头方向的墙壁上，写上抗战标语。如在“七十五祠堂”的墙上，写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在村南的蜡烛塘凉亭的墙上写有“好男要当兵”五个大字，等等。

学校十分注意增强学生们的体质，体育运动搞得非常活跃。除了日常的体操、跑步、跳高、跳远等项目外，还经常组织踢毽子、大刀操、爬山等比赛。每年还要组织春游活动。1940年春游目的地是蜀山。其路线是“北出南归”。出发后经王门岗到塘下洋村，从塘下洋方向的北面上山，到半山腰时，组织向顶峰冲刺的爬山比赛。蜀山顶上有一座小庙，庙里塑着一个朱相公像（金威将军朱礼）。看过之后，再从南面往下走。山的南面有很多岩洞，大家都爬进洞穴游玩，然后再经过蜀墅塘堤坝，从塘西村回校。

1941年的春游是登塔山，其路线是：“南去北回”。去时经过田心、剡溪，从塔山下村上山，游览了塔山寺和白塔，并在山上寻找各种颜色的萤石。从西北面下山后，顺便又去游览双林寺，经过佛堂回校。这一天从早到晚，步行数十里，虽然觉得有点吃力，但大家还是玩得有滋有味，眉开眼笑。

学校还经常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如在大会上讲抗战形势，使学生们都知道：日机为什么天天到金华等地轰炸？因为杭州已经沦陷了。特别是1941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廿一日），日本飞机在佛堂丢炸弹，炸死120余人的消息传到学校后，大家都悲痛万分。因此，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

当时的大成小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出色，这是和教师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分不开的。这个情况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在解放以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省计委工作时，在一次会议上，偶然碰到当时任省丝绸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的吴谟同志，听她的口音是义乌同乡，互相谈起以往的经历时，才得知我们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在倍磊大成小学时的师生关系。她当时在倍磊任教时已是共产党员。义乌沦陷时，倍磊大成小学的共产党员，都遵照党的指示，撤退到义西去打游击。倍磊大成小学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在解放前也跟他们出去打游击，解放后都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干部。

弹指一挥间，从一名小学生，成为耄耋之年的人。今将储存在脑海中的记忆，整理成文，供有关人员参阅。

（上接第54页）所取。在岭南，多露处野中……故能得军心，号令明肃，所过不折一草。虽瓜菜之微，必出其价而买之，岭南一路皆立碑颂之。沿路之民避大兵于山上，闻吴军之来，则必下来尽力供顿。”<sup>①</sup>留下了东征军中的最佳口碑，为南兵及明朝东征军增光不浅。吴悬《云峰将军传》亦言：“其才敏而练，行直而廉，法尚严明，令先抚养，甘苦直与士卒同，勤劳每以一身倡。料敌知

彼知己，行师有正有奇，出征秋毫无犯，行己权毫不避。横戈四出，收捷万全；南复西清，东恢北靖；筑长城、防山海，朝鲜号为铁面，日本称为神仙。”<sup>②</sup>还提到吴惟忠所率子弟孙侄有数十人入朝参战，最后惟忠虽论功升海防加衔副总兵，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升都督佥事，但次年即因老病被免职回家，隐居义乌夏演乡间。

（未完待续）

<sup>①</sup>[朝鲜]郑琢：《龙湾见闻录》，《宋经略书》，第67~70页。

<sup>②</sup>吴悬：《云峰吴将军传》，载《柳溪吴氏宗谱》卷9，《内纪文集》。

# 莲塘村小百货老加工户的回憶

刘俊义 整理

义乌兴商建市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有恢宏成就，有非凡创举，有华丽变身。作为土生土长的义乌人，在感慨、惊叹之余，总想细究历史关头的每个抉择。

作为市场的两个策源地——廿三里、稠城小百货市场，分别于1981年、1982年先后整顿和得到认可。这是当代义乌社会巨变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条，谁的心里都已确认。

在这一巨变过程中，义东“敲糖帮”的生意经，从以物易物（小百货换鸡毛什肥）的时代，跨入了小百货买卖时代，成千上万走南闯北的货郎中间，开始分离出一部分外出采购小百货的批发商贩，开始向敲糖帮小量批发小百货，同时也做零售生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廿三里的小街小巷、大队晒场逐步聚市贸易小百货，成为越做越大的自发市场。

在廿三里以及后来的稠城街头，北苑的莲塘村加工户加入了半公开从事小百货批零的商贩队伍，并无固定摊位，大多提篮叫卖，篮子里只装几件样品，货物多藏在附近居民家，以减少货物被市管人员没收的风险。这种提篮叫卖的地下生意，北苑街道莲塘村的许多村民都亲身经历，他们步步从那个年代走来，蓦然回首，道不尽其中沧桑辛酸。

从莲塘村以下5份创业者的回忆中，我们不难发现，廿三里小百货市场的起源和壮大不是无缘无故的，莲塘村小百货加工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5份平凡的叙述，来自六七十年代的生意经；

这5份回忆的出炉，也许会对一个市场的兴起增加更多的解读。

金景良，85岁

记得46年前（1967年）我就开始手工制作铁（铝）产品。第一年做针指箍和木钻，夫妻俩一晚可加工200个钻子，按批发价2厘5一个算，可卖5元钱。后来用铝线做过儿童手镯。做手镯是老婆出的主意，但因为初期做的手镯没有花纹，销路不好。老婆就叫我做上花纹，

第一天就卖了十多只。后来还学会做针夹、响铃等。当时加工的小产品都由老婆送到廿三里市里去卖，记得当时廿三里市场是自发的，只能偷偷卖。很受敲糖佬欢迎，他们都到市里来收购，用来换鸡毛鸭毛。我们村许多人都到廿三里市日卖，开始是提篮叫卖，后来就到集市边农户家租来门板摆起地摊。所以廿三里市场兴起，很大程度上是输入了莲塘村手工制品。“文化大革命”期间莲塘村被戴上了“地下工厂”的黑帽子，上面工作组几次到莲塘村打击取缔“地下工厂”，强制没收加工工具，我还差点被开除党籍。后来谢高华书记时我们村才真正扬眉吐气，放手大干。

朱尉昌，70岁

我是1970年开始制作加工小百货，做的最大的是洋火枪（也即钢丝枪，利用废旧的独轮车车轮钢丝制作）。是全村钢丝枪加工大户，一年能卖出1.5万把以上。当时成本很低，制作一把只要1分钱，售价大约5分多钱，农历十二月热销时可卖到8分到1角一把，所以一年下来净赚七八百元。当时要挑到义亭、佛堂、诸暨安华、浦江白马桥、金华澧浦等地方去卖，一担千把只枪，重50多斤。每逢市日，总是先把货藏到农户家，再提着篮子去集市叫卖，市管会看到要没收。后来湖清门市场开放，有了证，开始摆摊经营，38元一个月的税。1982年12月开始到天津进时装美术扣袷，不再卖自制的产品，因为厂里的货优质低价，比较赚钱，10件扣袷，可赚1元钱，头一个月就赚1000多元，生意很红火。

朱关海，70岁

我1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16岁到稠城公社农机厂做学徒，做过车工、出纳，工资很低。3年后，姐姐劝我，家里人养不活，还是回家务农。1968年，我开始手工制作铁制品，先后做过几十种产品。最早到朱店街摆地摊，查得很厉害，先后移到北门街、湖清门等地摆地摊，后来湖清门市场开放，才有了正式摊位。眼界开阔了，信

息多了，就直接到厂里进货，不再加工铁制品。1982年前10多年内，我村加工户加工过的小产品有：一类铁制品，如针指箍、针夹、洋油夹、眉毛夹、猪毛夹、头扣、勾钻、方钻、空心钻、带刀刨、带圈刨、钢丝枪、勾针等，一类是铝线制品，如儿童手镯、项链、耳环、耳朵挖等，一类玻璃制品，如玻璃珠项链、头珠等，还有塑料制品，如小虾、小鱼、头扣等，还有一类泥制品如小青蛙、小乌龟、小鸟等泥哨子。

朱冬兰，60岁

那是1968年，看到朱炳荣家生意好，父亲朱启荣（今年87岁）和同村朱关海羡慕得很，就学着办起家庭加工作坊，做些针指箍、眉目夹、头扣、手镯、黄瓜刨等小制品。逢稠城市日（农历逢双日）上午拎着篮子去卖，下午回家干农活。我先后在朱店街口、湖清门、北门等地摆过地摊，出售家庭加工产品。当时在朱店街摆地摊时，只有本村四五人，到湖清门摆地摊时，才开始有廿三里人来叫卖小百货。当时市管会要来赶，就马上一呼弄跑掉，他们走了再回来卖，有几次被抓到就会没收。当时生产队男劳力10分工分，分红只有5~8角，女人更少6分工分，分红4角8分，收入太低依家养不活，做加工明显挣钱多，全村几十户依家日日夜夜做到鸡叫，

辛苦是辛苦，但比农业要好多了。记得一天可以做3~5元钱，比工人工资要高。莲塘大队成了全省有名的“地下工厂”，上面工作组几次到村里“割资本主义尾巴”，强制没收加工工具。这种事，到谢高华做县委书记时才放松。

朱炳荣，1915年生

朱世良（朱炳荣儿子）回忆：父亲朱炳荣，14岁时做打铁学徒，以打铁为生，擅长打制竹节锁，也招揽锄头等农具生意。后来洋锁兴起，就不做锁了。到1969年起开始打针指箍、针夹、洋油夹、眉目夹、黄瓜刨等铁制品，由母亲杨小妹拎到稠城市日去卖。基本上都是几分钱一只，利润很薄。母亲沿街提篮叫卖，有时来收市管费2角，但多数时候被打办追得到处跑，抓到了就被全部没收。我到十六七岁专制梨瓜刨，后来妻子加工儿童手镯（铝线制），送到廿三里卖，先在老街卖，后到廿三里大队晒场卖，一般逢廿三里一四七市日才去，下半年农闲去的最多。当时廿三里市场还没有开放，都是自发形成的。全村到廿三里提篮摆地摊的有二三十人。因为交通条件差，大家都是凌晨二三点出发，走到廿三里刚好天亮开市日了。后来县城湖清门市场发证经营，我父亲营业执照为第7号。

义乌市北苑莲塘村第一批小商品加工经营户名单（部分）

姓名	出生年月	加工种类	最早经营年份	经营地点
朱世良	1956.03.18	针子箍、针夹、黄瓜刨	1966年	稠城
朱关伦	1946.01.10	泥哨、手镯	1976年	稠城
朱关海	1944.02.19	眉毛夹、针子箍等几十种	1968年	朱店街
朱金碧	1960年	小孩手镯、头扣、耳朵挖、钩针	1974年	湖清门
楼桂莲	1949年	眉毛夹、泥哨子	1968年	湖清门
刘美娟	1949年	牛筋虾（挂钥匙用）、照片	1968年	湖清门口
朱尉昌	1944.02.18	塑料喇叭、洋火枪、黄瓜刨、手镯、针子箍		县前街、朱店街十字路口
金景良	1929年	手镯、洋火枪	1968年	湖清门
朱冬兰	1954.10.15	黄瓜刨、眉毛夹、手镯、火药枪、发夹	1967年	朱店街与湖清门交叉口
朱关金	1943.10.28	木钻、洋火枪	1968年	朱店街
朱蔚森	1946.10.01	洋火枪	1978年	东风饭店门口
朱兴福	1948.11.01	钢丝枪、木钻、黄瓜刨		湖清门、北门街
朱蔚云	1937.12.28	木钻、针夹	1970年	湖清门口
朱福奶	1957.07.25	木钻、针子箍、铁刨	1968年	观音桥

（表格由莲塘村两委提供）

# 义乌以数字命名过的学校钩沉

金佩庆 整理

校名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学校定名的时间久了就会积淀出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越是名校其校名的无形资产越不可估量。而且，校名还具有社会文化功能，一所学校的校名或许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变迁。文化的力量具有潜移默化、影响久远的特征，不可小觑。比如，稠州中学创办时名叫城南中学并沿用了14年，后二易其名，2003年改称现名，但40岁以上的市民、家长提起这所学校脱口而出的依然是“城南中学”！所以学校的命名、更名都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须慎之又慎。随意更改会出现思想混乱甚至会留下尴尬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之前，我市一些公办学校曾被官方以数字命名。

## 一、小学

今稠城一小：初名“义乌官立绣湖高等小学堂”，简称“绣湖小学”。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绣湖滨的绣湖书院旧址（今百大有加利位置）上设立。她是清末县政府设立的第一所也是义乌县唯一的一所官办西式学校。民国初年县政府将其改名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84年改现名。

今实验小学和绣湖小学：二校同源，民国元年（1912）由西门陈氏家族创办，初名“私立绣川初等小学”（绣湖古时别称绣川、华川），简称“绣川小学”。1952年土改完成后改公办，1984年改名“稠城镇第二小学”。1985年改县属、定名“义乌县实验小学”。2000年学校一分为二，在江南新址创办的仍称实验小学，在原址扩建的学校改称绣湖小学。

今稠城三小：1956年合作化办学的高潮中创办，初名“车站小学”。1984年改名，全称为“义乌县稠城镇第三小学”。

民国2年（1913），民国县政府创办了4所县立高等小学，依次以数字命名。

“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简称“县立二小”，今廿三里一小、廿三里初中的前身。

“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简称“县立三小”，今田心小学前身。

“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简称“县立四小”，今上溪小学前身。

“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简称“县立五小”，今苏溪一小、二小以及苏溪镇中前身。

## 二、中学

1956年，农村合作化，掀起办学热潮，国家接办了私立大成初级中学等几所私立初中。政府接办以后，曾对原有的学校及新创办的初级中学以数字命名，1959年又取消数字命名。

“私立大成中学”：更名为“义乌县第一初级中学”，简称“一中”（今大成中学前身）；

“私立树德中学”：更名为“义乌县第二初级中学”，简称“二中”（今义亭中学前身）；

“私立江南中学”：更名为“义乌县第三初级中学”，简称“三中”（廿三里中学、今第六中学前身）。

1956年，县政府还创办了几所以数字命名的初级中学，主要为戴帽子初中（在小学里设的初中班，像是一个人身子是小学的，头上却戴了顶初中的帽子，以后这些戴帽子初中逐渐从小学中分离，单设初中）。

——“义乌县第四初级中学”，简称“四中”，校址在赤岸村冯姓祠堂，即1998年并入大成中学的赤岸中学前身。

——“义乌县第五初级中学”，简称“五中”，校址在苏溪区中心小学对面。今苏溪中学前身。

——“义乌县第六初级中学”，简称“六中”，校址在后宅市基（后宅中学前身——此中学为高中，非今日之后宅中学；1996年，以该高中为基础创办今义乌第三中学）。

——“义乌县第七初级中学”，简称“七中”，校址初设在上溪村。1959年，迁址乔山并改称上溪初级中学。1970年设高中班更名上溪中学，1984年改办职业学校改名上溪农村职业学校，1995年更名上溪综合职业学校，2002年恢复上溪中学校名，2012年恢复为普通高中性质。

——“义乌县第八初级中学（筹）”，1958年筹办时称“八中”。校址在东河与井头徐两自然村之间。次年改校名为东河初级中学。1970年设高中班更名东河中学。1993年5月学校改制并更名义乌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1996年并入义乌市城镇职业学校，原校址给东河初中。



## 尹庚的坎坷人生

楼益圣

尹庚原名楼宪，后名楼曦。1908年出生在现在的福田街道十里牌村。1923年毕业于省立第七中学（校址在金华），成为义乌籍理论家何家槐的高一级同学。义乌籍著名作家王西彦是他的表弟。1925年考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系，与著名画家潘天寿一起学习绘画艺术。校长陈望道给他们讲授艺术理论，陈望道专门辅导尹庚读了鲁迅翻译的《走出象牙之塔》。

1927年，尹庚大学毕业，开始自谋职业，无奈到处碰壁，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从上海流浪到杭州，住在一位早年同学那里，一间很小的房子，只能放下一铺床、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两人同睡一张床，合用一个煤炉烧菜煮饭。同学去大学学习，尹庚没有工作，就睡在床上看书。有一天，看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再也睡不着觉，一口气看完了，立即起床伏案疾书，仿照《狂人日记》之风，把满腔的愤慨一古脑儿诉诸笔端，写完后心情异常痛快，但没有想去投稿。室友回来读了很激动，竭力鼓励尹庚去投稿。于是寄给《杭州市报》，不久，居然发表了。去领稿费时，编辑问：“你做什么工作？”答：“无事可做。”这位编辑当即请尹庚当助理编辑。从此，尹庚当了三年《杭州市报》文艺版的编辑兼记者。这期间，尹庚有条件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

尹庚凭着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和热情冲动，敢于见义勇为，利用记者的身份，进出监狱了解情况，发挥一支笔的作用，协助营救上海天马书店第二任编辑叶以群出狱。叶以群出狱后，留学日本。

翌年春，叶以群返杭寻找“左联”组织，先找尹庚，尹庚通过沈从文找到了丁玲，在丁玲那里找到“左联”负

责人冯雪峰。冯雪峰与叶以群商定建立左联东京支部。

1931年，尹庚怀着富国强民的愿望。应叶以群之约，留学日本，参加了东京左联组织，担任“留日学生会”执行委员，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总同盟”。“九一八”事变后，他因积极参加印刷、传递秘密刊物《文化斗争》，成为日本警察的跟踪对象，从东京返回上海。尹庚回到上海后，立即去拜访校长陈望道。陈望道对尹庚说：“你喜欢文学，那就参加‘左联’吧！”不久，叶以群也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左联”组织部长，就吸收尹庚加入“左联”，分配到闸北区负责组织工作。参加“左联”，就成了危险分子，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但尹庚无所畏惧。此时，尹庚翻译了日本进步作家中野重治的小说《老铁的话》，托叶以群转交给鲁迅校阅指教。鲁迅先生看过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尹庚根据鲁迅的意见认真作了修改后出版。有一次，叶以群邀尹庚去拜访鲁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尹庚喜出望外。鲁迅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亲切交谈。鲁迅听说尹庚是学艺术的便拿出一本自己编选的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苏联版画《引玉集》送给尹庚。这次极为平常的会见，留给尹庚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尤其送给书本更为激动，为尹庚从事文艺创作坚定了奋斗的方向。尹庚遵循鲁迅的教诲，参加“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研究会”。在闸北支部工作期间，尹庚与支部成员何谷天（后名周文）、丘东平等编辑《文艺》杂志。杂志出版后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

1933年秋，尹庚参加了冯雪峰负责组织的“国际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会后，在去辅导工人读书会的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34年，在党的营救下出狱，继续从事左翼文化运动。

1935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行文化“围剿”时，尹庚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那时，上海天马书店因为出版《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而名声大振。当第一任编辑楼适夷和第二任编辑叶以群相继入狱后，尹庚接任第三任编辑。他拟定主编一套丛书计划，寄给鲁迅请教，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这套丛书命名为《天马丛书》，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丛书终于出版了。其中收入鲁迅先生的《门外之谈》、叶籁士的《拉丁化概论》、悄吟的《商市场》、丘东平的《沉寂的梅城》、聂绀弩的《邂逅》、吴奚如《叶伯》等左翼作家的重要著作，为传播革命文化，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6年，尹庚又同白曙同志编辑《现实文学》杂志，发表了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重要著作。并为我党一些著名理论家、文学家瞿秋白、曹靖华、邵荃麟、聂绀弩、唐弢等发表文章。他本人也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长篇小说《战争》等，为新文学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37年，日寇铁蹄踏破华北大地，尹庚在上海《群众新闻日报》任总编辑，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在发表东北义勇军抗日消息时，报头套印红字。这在当时“言抗日者杀”的形势下，确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七七事变”后，他率领了上海职业界青年战时服务团奔赴烽火连天的东南战场，宣传抗日救亡，他任团长兼任编剧和导演。创作和演出了宣传抗日的多本哑剧。1946年，尹庚又前往光复后的台湾省，曾任《和平日报》副总编辑、总经理等职。参加了“二二八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首杀的黑名单而被军警追捕。他只得逃回大陆，在海滨从事进步文教活动。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编印了《光的热》丛刊，为应惟邨印行杂文集《石下草》，为莫洛《马骅》发行散文集《生命树》等，以斗争迎来了全国解放。

解放后，在上海市担任泥土出版社总编辑，不久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先后在第三野战军台湾干部训练团、华东军区外语学校、中央军委外语院校担任教员和教研主任等职，为部队培训了大批人才。1954年，转业到内蒙古支援包钢建设，在河套陕坝中学教书。这一年，突然厄运降到他的头上，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受到牵连，被捕审查。1958年又错划为“右派”，送到农场、矿山劳改。“文化大革命”中，又“黑七类”、“美蒋匪帮大特务”等“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折磨，并一度

致疯，沦为乞丐。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给尹庚平了反，安排在巴盟文联工作。11月，他又被推荐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幸福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聚一堂，会见了阔别数十年的老作家老战友。1980年，国家公安部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任内蒙古文联委员、巴盟文联顾问。年逾七旬满头银发的尹庚，一面医治身体上创伤，一面抱病著书，写出了大约几十万字的《鲁迅先生的风趣、风度、风格》、《鲁迅先生及天马丛书和现实文学》、《关于〈鲁迅日记〉的补遗、注释》、《关于〈鲁迅书信集〉校注》、《朝着鲁迅先生的方向知难而进》、《鲁迅先生言行散记》、《推陈出新录》等著作。以前的主要作品有：翻译作品《中野重治集》、《战争》、《老铁的话》写作知识《写些什么，怎么写》、报告文学《吓，美国吗？》、少年读物《鲁迅的故事》，此书经补充、修改后在1983年改名《鲁迅故事新编》再版。他还创作了《锄头就是武器》、《总是打胜仗的游击队》、《冲过封锁线》、《艺术家与小丑》、《奇遇》、《草原烽火》、《过关》、《毛主席万岁》、《拾送书》等十多个哑剧，有7个曾经在报刊上发表，有4个演出多场。成为中国哑剧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夕阳无限好，夜尽见光明。眉飞万重山，海涵一片心。”尹庚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在获得新的生命后，又踏上征途的豪迈心情。可是身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坏了，不能写出更多的作品。1997年病逝于北京，时年90岁。

#### 参考资料：

《我区“左联”作家——尹庚》，原刊《内蒙古日报》1980年7月12日，作者李荣、叶祖训。

《鲁迅与义乌人》2004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鲍川著。

《作家尹庚传略》刊《枣林》1982年8月20日，作者方竟成。

《耿耿难眠泥土情》刊《浙江日报》1985年10月27日，作者方竟成。

《别具一格的哑剧及其作者》，《枣林》1983年3月号，作者王正华。

# 楼杏春印象

骆华桂

楼杏春，字芸皋，讳启宇。清道光十年（1830）出生于苏溪殿下村，“幼聪颖，性不羁，恃才傲物，好戏谑，同仁多忌之”。16岁成秀才，28岁中举人，在当时义乌是一位佼佼者，工书法，善诗词，清同治辛酉年曾自编一部《恋花集》记其狎邪游、名胜题咏及“青楼杂咏”。并请朱凤毛先生作序，朱先生对其赠女校书之作赞不绝口，说其“红绡寄泪，锦字减愁”、“禅榻鬓丝，谁醒扬州之梦”。朱怀新则借人之口（集句）以赞赏。楼杏春自己用集温庭筠诗句的形式作序，来表达自己对《恋花集》的爱。但未知何因而未付印。今存之《梨花馆诗词》各一卷，是黄侗先生收集整理，并出资影印的。当时有人提出卷中多忆妓之作，有伤风化，不足表率。黄侗先生坚持说：现集中除“青楼杂咏”外，还有忆内、哭子、避乱及江左诸友朋之酬唱吟和之作，范围比原集更广，不能仍以《恋花集》名，故改为《梨花馆》名而刊印。

年轻的楼杏春，倜傥、狂狷，在《采桑子》中自豪地写道“奇字能通，属对偏工，前辈揄扬夸圣童”，同时觉得自己“少年意气凌霄汉”、“浪暖春风欲化龙”。在《泰山嘲云》中豪迈地唱出“云起云灭何时已，金屋玉堂亦如此”，还不屑地说“秦皇汉武一蝼蚁！”后赴京赶考时，留恋烟花柳巷，写了大量与校书（文化妓女）打情骂俏的诗词“郎卖合欢带、休问妾腰围，妾身郎惯抱，纤依郎自知”“昵郎欲郎怜、笑郎太无赖、恰依枕手眠、偷解罗香带”等一些香艳脂浓的诗词。我觉得这些诗词，在人情世态的描述上，有其独特的视角，比较丰富生动地再现了清朝一般士大夫的生活，“以浅语达深情”。

但是一试不中后，他开始尝到人情冷暖的滋味，开始思考人生，并对世事有些彷徨，同时决心改变人生规则，尽量做到合时宜。在寄给朱一新的诗中表示“誓将划尽风魔障”，“明年同向东风开”。但还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心有不甘。“有才无命何须怨”、“孙山落榜兴思归”、“我题此诗歌当泣，掷笔仰天长太息”。同时还借描歌女的心态“多惹娇态多惹愁，最无情处最风流”来宣泄内心的不平。归家后发愤攻读，准备三年后再入考场。

在第二次赴京应试的路上写的《一剪梅》中，用“如许奔波，何苦奔波？浮名浮利困人多。未醒南柯，且梦南柯！”用以宣泄未谙世事的惶恐和不安心情。但是二试依然失利，使楼杏春尝尽世态炎凉；“诸公袞袞风云会，肯与山人赐酬唱？”。与落榜者的会聚时，写道“四座黯然同饮泣，不知谁是断肠多。”感叹自己如“一叶飘零大海东”。从此他对科举有些失望，在《水调歌头·题孔家码头》中写道“堪破一场梦，拍手作狂歌”、“只为虚名角，个个害风魔”，并对那些疯狂追逐考场名利的人们提出“富贵让公等，我已醒南柯”。

在失意归家后，娇妻亡，爱子丧，加上“老父骑鹤去”的多重打击，在《初三夜梦亡内》中写道：“梦中领略娇模样，已是前身隔世人”。在哭瑛儿十章中写道：“回首当年浑是梦，乾坤何日醒南柯”、“赐鞦那堪劳父执”、“连霄苦雨警残梦”、“离乱生涯百事哀”以浅显的语言饱含深情的笔触倾诉丧妻失子之痛。接着太平军攻占义乌，由于他家是小康，属于打击对象，故楼在《贼犯》词的序言中写道：“自辛酉八月，贼入义乌后，余家高祖而下，被杀或被虏或病亡、连伤40余人，今日旋里闾里无人。”并在《红林擒近》里大声呼喊“问何年投笔，风烟迅扫，国威重振千亿元”。对于两江总督何桂清“贪生怕死无意抵抗，慌忙逃入上海，更可恶的还纵兵奸淫肆掠，害甚于贼”，他在《水调歌头》中“那有辛毗仗节，翻自武乡带汁，免脱乱奔波，藩镇尽如此，谁奏凯旋歌”的悲愤控诉和责问。在《念奴娇》中写道“尸陀遍野，南北兵威挫”，“听残更鼓、那堪心事振触”的深深叹息。在左宗棠部先锋蒋益礼带兵克复婺州时，太平军败退尚有数十万人窜入诸儿，但楼杏春还是感到婺州是浙江门户，婺州复，全浙肃清太平军指日可待，喜而赋《满江红》：“八婺山川余劫灰，万家子女啼新鬼”，“待整中兴新事业，已恢故国残基业”。

在经历了国难家仇后，楼杏春改变了原先放弃赶考的念头，重新入京赶考。这时的他不象上二次那样，去写“柳腰酥乳”之类的香艳之词，在一次与文友们去北京沙帽胡同德风堂与女校书听弹唱时，并没有“情丝一缕系情场，引入花丛作睡郎”，而是在灯红酒绿之下，见到的是“万般折磨在风尘，剩下多愁多病身，何日与卿征吉梦，替卿长作护花人”。对于上二次交欢过的校书们，对她们或死或伤，或被卖作妾的命运发出深深的叹息和同情：“谁知造化无情甚”、“欲诉君们隔九重”。在梨花馆诗词

里我做了粗略的统计，楼杏春曾为之赋诗题词的女士有29位之多！还不包括述其事，而未具其名者。其中给一个叫小卿和另一个叫云仙的，各写了四十多首诗词。写十首以上亦有三四位，这些蘸满浓情，饱含清泪，写得哀婉凄切的诗词，真让人有“临风一读一神伤”之感。如“枕边密誓枕边泪，梦回时，依旧凄清”、“恨荒店鸡声催梦去，惊醒也，声声雨。听尽也，更更鼓。”等等，每个字都能让你体会到他灵魂深处的心浪与悸动。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只能又在《摸鱼儿》词中写道“君不见，银墙珠户皆尘土”、“愿贝叶重翻，莲花不染，休再等闲度”的无奈劝告。其实从历代的词人看，有许多大节凛然为官清正者，也曾遗下许多极香艳的小词，凡此种种并不损害他们整个人格和伟大。所以“梨花馆”诗词，保存一些“青楼杂咏”亦是无伤大雅的。

在经历二次赶考失败后，45岁的他，第三次终于考



楼杏春书法

中了进士。他少了前二次赶考时的急迫与期待，而是勾起多年苦读的回亿：“一家生计一身肩，屏档无资刷可怜，茹苦慈亲悲歉岁，恒饥稚子病残年，豪情未便因穷损，苦节还须遇挫坚、敢谓诗书真误我？誓将铁砚再磨穿”而多了为苍生做实事的责任。在上任的路上“捧檄出门去，肩舆赶进贤，白蘋铺雪海，乌桕醉霞天，落日罗汉渡，秋风钓子船，西山回望杳，清景自肃然。”沿途所见的却是“树被雷轰留塔影，崖经轮碾划箫波，鸟喧晴竹喜冬暖，鼠瞰长灯搅梦多”。但到了任所，当地乡绅深知来了一位风流县太爷，向其进献了一双“短短春衫兼短袖，不矜装束也风流”的十五六岁的雏妓作为恭贺之礼。楼杏春并未笑纳，而是深情地写了“髻龄更已别家乡，命薄如卿枉断肠，可惜如花双姐妹，年年沦落富家庄”。后在楼的主持下，配给了当地穷书生而传为佳话。由

于在任内，不因循守旧，用其智慧改变了一些陋俗，开创当地的一些新风，取得一定的政绩。

在进贤至弋阳的路上，见到了“城郭田庐多被漂没，晚禾歉收，一入官仓，存者无几，深可悯也”后写道“愿停奉檄催租吏，且听荒村打稻声，寄语长官勤抚字，好培元气保升平。”

当地有迎神求雨的习俗，楼杏春有些看不惯，就口占一绝“虬髯赤面气雄哉，幢盖全无冒雨抬，笑尔形骸已土木，为谁仆仆去还来？”用朴实又诙谐幽默的语言，揭示出迎神求雨之虚妄，这在封建社会的确有与众不同处。建昌县，素称难治，楼杏春到任后，“整葺书院，勤课士子，文风既正，民俗渐驯，地方称安谧”。

对奔波争斗的仕途生涯，他从旧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进行了审视，深深感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我今顿悟穷通理，反复必须较物情”。对民众遭灾，深表同情，但又无可奈何“浮尸已遂，鸱夷化，披发谁招鱼腹魂。剩有孤嫠多饿口，何时加赈沫君恩”。并以描写抒情笔法，借写大风而透心声“尘世枯荣太不平，天公亦作不平声”，“孤魂更有离群感，愁绝长空征燕声”。对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他只能“为触乡心邀好梦，偏睁醒眼过残更”。

对于自己任职，他既有自豪“万家生佛诚无添，两袖清风亦自豪”，亦有希望“关心残月迎新月，回首西风转北风，劲草偏能霜后翠，晚花犹傍日边红”，更有惋惜和忏悔，“中洲已悔全消铁，孤注何堪再掷金，明月双溪归去好，章江烟雨莫再寻”。由于任石城知县时，因当时国家财政支绌，苛捐杂税遍及乡里，石城素贫瘠，民不堪受其苦。楼杏春多方奔走想为石城减税，而不成，最后积劳成疾，卒于石城，当地举城而哀。

总观楼杏春一生，倜傥狂狷，风流儒雅，是一位有个性，有才学，又有侠义心肠的人，曾为无故被冤者，打抱不平而给其出面打官司，被人私下称为绍兴徐文长。由于其诗词书画具佳，求者甚众。他对那种附庸风雅者不屑一顾，而对不识字的老太太，无偿书写雅俗共赏、令人看后忍俊一笑的楹联作品。偶尔会耍弄点小聪明和恶作剧的清代绅士，以现存六、七百首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能用朴实的语言，淡雅、幽默的笔调，写出刻骨铭心的爱和恨这一人生真谛。特别是他写的词，把那种不能诉之于诗、文、曲的情绪，淋漓尽致的倾泄出来，作品写得既婉约含蓄又情真意挚，极具清旷骚雅又哀婉凄迷之妙，是义乌历史上少有几位写词高手之一。

# 王培根与“包产到户”

施章岳

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进入农业生产合作化开始，到80年代中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包产到户这个精灵，一直牵动着上至共产党的最高层，下至农村最基层几亿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心。一些与农民休戚与共的基层干部，曾冒着风险向高层进谏，建议实行包产到户，可是却招致厄运。在素称“鱼米之乡”的浙江，就出现了被毛泽东严厉指责批评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其中两人是义乌的冯志来与杨木水。此后，两人屡遭磨难，成了受人敬仰的农村改革先驱人物。而这场顺乎天理与民情的改革浪潮中，敢于弄潮儿的代表人物不仅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1956年义乌王宅乡副乡长（主持工作）王培根，就是与冯志来、杨木水一样，挺身而出，鼓吹包产到户，后来又亲自实践包产到户的一个历史功臣。

## 地委党校被搅得炸开了锅

时光倒回1956年10月，时任义乌王宅乡副乡长的王培根，背着行装，兴冲冲地前往金华地委党校参加全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管理培训班。

当年，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浙江省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义乌出现了创办高级合作社的高潮，全县高级合作社发展到507个，入社农户8.4万户，占总农户的91.7%。由于发展过快，管理过严，不少地方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强制入社、强制升级的现象，至使相当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不善，财务混乱，分配不合理，干部作风不民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队长乱派工，社员磨洋工，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好看不管用，一天只半工”，便是一些社员对管理混乱的合作社的评价。

此刻，王培根这位亲历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种种真相，耳闻农民种种不同呼声的年轻农村干部，多么渴望能得到上级的指示，求得一方医治合作社病患的灵丹妙药，把合作社经营管理中的矛盾解决好，把农业合作社办好。

所以，一到学校，他就热情认真地投入学习，且担任了义乌组的组长。对于农村合作社经营管理如何搞，王培根心里自有“小九九”。这个来自农村，1952年由县政府推荐参加金华地委干部学习培训班，因成绩优异被招干分配回义乌的年轻干部，几年来一直在县政府工作队从事农村、农民工作，对农民的心思最明白不过了。他深知，农民对土地改革所分得的土地是有深厚感情的，耕者有其田之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展以换工、帮工为主要内容的生产互助，以解决农民各自因缺资金、农具、耕畜等种田的困难，是自愿互利，发自内心的。而在创办起初、高级农业合作社之后，刚分得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劳动、收益、分配都在集体领导下统一经营，农民是为集体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使得建筑在小生产水平的、低下的物质基础上的农民私有心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思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抑，有的出工不出力，干活马虎，有的只求工分，不管质量，有的则试探着私底下搞一些既集体又分散，有分散又集体的法子，如一些农活集体干，一些农活农民自己包着干，结果是那些农民包了的农活，效果出奇的好。由此，王培根认定，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采用责任制的形式，实行按件计酬，提倡包产到户，是提高农民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而在分配上，让农民交足“皇粮国税”，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留足种子之后，剩下的应全部归农民自己。

王培根把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在学习小组上亮了出来，得到了义乌代表的一致赞同。讨论结束后，参与义乌学习小组的班主任老师十分欣赏王培根与义乌小组的看法，特地把王培根叫去，要他好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有义乌全体代表的支持，王培根一口应承了下来。

这一天，来自全地区五六百个乡的乡长，齐刷刷地坐在地委党校的大礼堂内。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农村基层

干部，与王培根一样，热切地期望能找出农村合作社经营管理的好办法。因此，人人态度诚挚，观点鲜明，热情有加。第一个发言的是浦江县的代表，他们认为，农村合作社经营管理，应该走集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阳光大道，而包产到户是单干独木桥，是个人发家的资本主义回头路。紧接着发言的王培根，则与浦江代表的观点针锋相对。他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解决当前农村合作社管理混乱的最好办法是实现包产到户，并且针对浦江代表对包产到户的种种责难，有理有据地列举包产到户的十大优越性。王培根的发言，不时得到与会代表的掌声，可是也戳到了一些代表的痛处。未等王培根发言结束，浦江县的代表就站立起哄，高喊决不允许单干走回头路。素来刚正耿直的义乌代表立马与之相辩。一时间，台上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台下唇枪舌剑，争包产到户的是非，情绪激动的还你推我搡，互不相让，更有甚者还向台上摔凳子，会场顿时乱了套。会议开不下去了，王培根未讲完十大优越性，就愤而退出了会场。他想起学校的规定，此次学习培训，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抓辫子，打棍子，搞批判，可眼下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在此学习什么呢？未等培训结束，他就卷起铺盖，不辞而别，提早回到了义乌。

谁知回义乌不久，地委组织部就派人到义乌对王培根进行调查，说王培根鼓吹包产到户，煽动代表吵架，地委要对他进行处理。所幸当年义乌县委、区委领导对王培根知根知底，百般为其辩护。说他工作好，能力强，他的发言也代表了义乌农民的心声，好说歹说，总算让他逃过了一劫。

### 两只猪肉一早就被抢买净光

王培根带着不能亲自带领乡亲们实施包产到户、发展农业生产的遗憾，在农村基层又走过了20余年。但是他心头那份遗憾，尤其对包产到户的那个信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它反而象一颗种子，吸纳了20余个春夏秋冬的阳光雨露，聚集了四面八方的精气神气，在他心中膨胀、壮大。当历史的滚滚车轮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初，王培根心中这颗种子，终于在经历了被压抑的不满当中破土而出，成了义乌农民率先摆脱贫穷、打开致富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经历了经济困难的煎熬和“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这次会议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即使在此次会议之后的二三年时间里，在被唤醒的希望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反差。以“包产到户”而言，1980年，中央还不允许农村实行这个办法。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中

提出“多数地方不适宜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只宜极少数贫困山区‘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实行”，对包产到户限定了条件。义乌县委对许多生产队自动调小规模、自发分山坡地种春粮的方法还派工作组下乡进行纠正。在“左”倾顽症的禁锢下，包产到户这个匡世济时、医治病患、摆脱农村贫困的灵丹妙药，依然被打入冷宫。

而于1979年10月调任徐村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培根，却偏不受“左”的思想影响。他的想法是：包产到户在中国走上集体化的初期，就受到农民的欢迎，并在一些地方出现过气势非凡的潮头，说明是顺乎民心的。如今，中央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号召，农民又有迫切需求，就应该为农民着想，付诸实施。秉性的耿直刚正、坦荡无私与大无畏的精神，促使这位当年就仗义执言，敢为农民鼓与呼的农村干部，在20年之后又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在了践行包产到户的前头。

1980年春，徐村公社的田野里，还看不见繁忙的春耕生产景象。发黄的麦苗急需施肥，生产队长却派不动社员，绿肥田需要翻耕了，紫云英却随着春风依旧在田中舞动，上贾宅，东山头，塔下洲……一片片的农田都荒芜着。上贾宅大队不少社员贩小鸭出门未归，季节不等人，人却不见影。公社驻队干部一个个跑到王书记跟前讨办法。王培根想，人误地一季，地误人一年。种田不仅事关农民的口粮，还关系到国家的征购任务。“皇粮”国税完不成，国家事业要受损，农民岂不喝西北风？决不能让历史重演。迎着早春的寒意，王培根又一次向盘踞在绿色大地上“左”倾阴影冲去。他没有开党委会进行研究，因为没有文件依据，没有尚方宝剑。但现农民荒着地不种，是与“集体”消极对抗。或许是他太爱农民，太钟情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了，那就让农民从“集体管理”中脱离出来，包产到户，让他们自己当家作主。

前车之鉴，也曾在他的心头掠过一阵忧虑。但是他很快就横下了一条心。干事业总要冒风险的，挨批评，受处分，由他一人承担。于是他果断决策，对于有要求的生产队，采取大包干的形式，把土地承包到户。主意一定，随即让东上大队去实施。驻队干部当天赶回东上，与大队干部一道，一家一户分配核定，当晚就把方案告知全体社员。

第二天一早，驻队干部兴冲冲地来到王培根的房间，大声说：王书记，你快去看看，东上的田野里，只缺红旗了。掘田的，耕地的，人来人往。天未亮，请得动的亲朋好友都被请来帮忙了，徐村集市上一个肉摊的两只猪肉，一早就被东上人抢买光了。平时，一天买到

晚还不见得卖得掉呢！此后，一个个生产大队纷纷跟着效仿。

这就是真理的力量。

一天，不脱产的县委委员，西陈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大琦急匆匆跑到公社，硬拉着王培根，要他到西陈把田分掉。西陈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当初，依靠集体力量，劈山造田，溪滩造地，平整土地，农业生产走在全县的前头。对这个县里的先进典型，要不要推行包产到户，王培根心里也掂量过，但陈大琦说：王书记，土地再不分掉的话，我们这个先进可真要倒霉了。现在队长派不动工，社员出工少，连施肥浇麦肥料也没人挑，更不用说绿肥田翻耕了。王培根还是觉得事关重大，向区委领导作了汇报，在得不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又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听听效果是很好的，对外就不要去宣传了，也不要说到我这里汇报过，可是王培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搬起铺盖，住到西陈大队，走村访户，听取社员意见，连着三天，挨家挨户落实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而此时此刻，在义乌绿色的田野上，包与不包的拉锯战还异常激烈地进行着。徐村乡部分生产大队的土地上，广大农民却已在为脱离贫困大展手脚了。

### 改变农民贫困是我的权利

从1956年在地委党校上挺身而出为包产到户叫好，到1980年在徐村乡自作主张推行包产到户的王培根，比起当初那些为包产到户呼叫、呐喊而被冠以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撤职、开除、下放乃至逮捕判刑而荒谬镇压的那些先驱，他所走过的道路，还算是平坦的，他的人生也还是幸运的。

王培根不是先知先觉者，他出生于义乌江湾崇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裁缝，大伯当长工，三叔是个箍桶匠，四叔当学徒做麻饼，五叔被抽壮丁当了兵。父辈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贱者。他的信念，他的举动，不过来自长年累月在农村的日常观察思考，他看到了身边农民在合作化初期积极性和经营自家小块自留地的热情与效果，因此，他讲出了农民的心声。而对“左”的路线和政策，很多干部包括王培根本人，也曾经有一个盲信盲从、半信半疑到回归常识理性的过程。如对历史的经验，前人的教训，他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警觉。在九联大队落实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他把大队靠公路边的

40亩土地留给集体，以便到时候上面来检查时，可以找到一点托词：这里还是队里派工，集体干活。但在他的骨子里，他与最底层的亿万农民脉搏同跳，命运与共。在鼓吹、实践包产到户的整个过程中，他具备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不怕风险的勇气，他认定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他最了不起的。

当“左”的思想被改革开放的阳光日渐驱散时，1981年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总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义乌县委领导从中领会了中央的精神，1981年夏收夏种后，县委专题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8月，县委又召开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交流落实生产责任制经验，并让王培根在大会上介绍徐村乡包产到户的经验。与历史惊人一致的是，王培根的发言，与20年前一样依然引来阵阵掌声。不同的是没有了起哄声，有的是初尝甜头的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拥护与赞美。前山头生产大队一个农民，全家7口人，一个正劳力，一间半房子，包产到户前，一个人天天拴在集体土地上，白天、晚上没日没夜干，40多岁的人累得如同干柴棍，依然是年年缺粮超支。包产到户后，劲头可大了，全家老少齐上阵，农闲时节还搞点副业，一年下来，没有一分超支，经济状况很快好转。他说：包产到户接着干，他家就要造房子了。此次会议后，县委还把徐村公社九联大队前山头自然村的经验整理成文，印发6000份给全县每个生产队，在全县广为宣传。1981年9月，金华地委召开全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地委书记厉德馨作报告。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在必行。会后并下发了关于专业承包、责任到人的政策规定。经过20多年的折腾，党中央清醒了，广大干部也清楚了。至此，包产到户这场持久进行、马拉松式的拉锯战终于见了分晓。义乌农民求包心切，热情高涨，加上冬种季节紧迫，有的生产队为抢种大、小麦，仓促上阵，用一个夜晚或半天时间就完成分包任务，有的因承包期未定，合同也没签。到1982年春，全县落实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6959个，占总数的99.5%，承包大田面积占总面积的97.46%。

一场彻底改变农民贫困命运的经世伟业，由此开始了壮丽的远行。而王培根20余年的坚守，则令人信服地见证了他始终如一履行“改变农民贫困”这个神圣使命的一个共产党人的一片忠诚。

王稼秀

# 王国良——民国时期研究长城第一人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闻名世界的壮丽景观。它历经上下二千年，是自春秋至元明无数中国人坚强毅力，聪明智慧，血汗辛勤，费尽移山心力，修筑而成的伟大工程。然而，长城悠悠万里，纵横古今数千年，但真正有人开始研究长城，不过百余年。作家雷雨<sup>①</sup>在《家在楚国长城外》一文中写道：实际上，对长城开始较为

系统的研究，始自晚清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而晚清地理学家杨守敬等在其《历代輿地沿革险要图》中，对长城也都有所考证、标注。民国年间，研究长城的代表性学者为王国良、寿鹏飞、张维华。王国良著有《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秦鹏飞著有《历代长城考》，张维华则在中华书局出版有《中国长城建置考》。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被视为研究长城的第一本著作，深入细致，多有创见，而且敢于怀疑先人之见，如顾炎武认为长城起源是“废井田，开阡陌，车变为骑，寇钞易而防守难”，王国良则以为说，“阡陌之制，决非在战国初叶各国还没有创筑长城以前，就通行于中国的，顾亭林以废井田、开阡陌为创筑长城的原因，未免稍涉疏略了。”“至于‘车变为骑’为长城的起点一说，亦未为是。何以呢？因为车变为骑，起于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实际上各国建筑长城，多在赵之变法之先。”

当看到雷雨的文章时，我怦然心动，因为王国良正是本人的祖父，我也知道父亲手头有《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发行）这本书。雷雨先生对笔者的祖父王国良高度评价，称他为研究长城的代表性学者，肯定是有充分根据的。由此，我开始搜寻祖父的相关资料，从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中国长城沿革考》确是民国以来系统研究长城的第一本著作，其成果经常在研究长城的论文中被引用，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而祖父本人亦被长城研究学界视为民国时期研究长城的第一人。那么祖父王国良是怎样一个人呢？

王国良(1897~1966)，浙江义乌佛堂田心村人。字楚材，号帆影，曾用名谷梁。天资聪明，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中学就读于浙江省第七师范学校，毕业后赴严州教书，因酷爱绘画，弃教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自动退学，考入北平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攻读文史。据义乌文史资料记载：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祖父王国良与义乌籍在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求学的学生楼良相、冯泽芳、周拾禄、杨效春、刘文革、何兆骥、龚景川、缪启悟、金祖懋等人一起组成“俭德社”，后改为“健社”，以砥砺品德、热心公益事业为宗旨，是爱国的学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共，屠杀进步人士，“健社”受威胁，被迫解散，社款两百多元购书赠义乌中学。另根据刘文革先生撰写的回忆录：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义乌后，王国良、楼良相等创办义乌县立中学于稠城，王国良、朱式欧、黄国

<sup>①</sup>雷雨，一级作家，出版专著多部，刚出版《折角的页码》，撰有《诗人帝王》、《吴梅村》、《龚自珍》、《翁同和》等。

铭等先后任校长。<sup>①</sup>

大学毕业后，祖父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八中学、第六中学；杭州女子中学、省立杭州初级中学等。抗战时期，先后在省立联合高级中学、省立联合师范学校任教并兼任教务主任，1941年离开浙江去重庆，在中国农民银行总行任职。1945年随中国农民银行迁南京，1948年调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

1949年初自动辞职回义乌，先后在义乌中学、义乌师范任教。1950年10月当选义乌县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sup>②</sup>；1956年5月，在县一届政协第二次常委会议（扩大）上，祖父王国良被任命为县政协文教卫生组副组长；1957年4月被任命为文化教育组组长。<sup>③</sup>

1958年上半年，祖父因代表文教组在政协鸣放会上发过言，提出过批评和建议，于反右运动后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下放辗转于廿三里中学、江南中学、赤岸中学任教，最后来到东河中学。值祖父七十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右派早已摘帽，但在一所乡校，他首当其冲被揪斗，戴高帽、挂牌游街、罚跪示众，并令他每天厕所掏粪，打扫卫生，受尽屈辱和折磨，苦不堪言。他忍无可忍，据理力争，任凭打骂，宁死不屈，被视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招致更为凶残的批斗和折磨，最终将他逼到绝路，于1966年9月23日晚上坠水身亡。

祖父攻读文史，师从黎锦熙、吴承仕、白眉初等著名教授，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学术功底深厚，大学毕业即撰有《中国长城沿革考》，此书当今仍被视为民国年间研究长城的第一本著作，而祖父本人亦被视作研究长城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广泛采纳和应用。

祖父打小喜欢画画，有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学历，在南京工作时与画界名流傅抱石、陈之弗等均有交往，切磋画技。在重庆工作期间，画作较多，曾先后参加过几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作品也曾被美国画商收藏。他的画作继承了“四王”（王翬、王鉴、王时敏、王原祁）的风格，立意高雅、构图严谨、用笔细腻，其基本功和画技绝非一般可比。可惜，其画作及收藏留传下来甚少，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掠走，不知所踪。父亲将侥幸留存下来的一幅转赠与我，是一幅临摹龚半千的山水画作，挂在书房，早晚仔细端详观赏，与

我在南京看到的龚半千真迹相比毫不逊色，其浑莽洒逸的气韵跃然图上，真可谓如龙驭风，如云行空，隐现变换渺乎于不可穷。

祖父亦有创作文学作品（书名不详）和诗集（《双桔轩诗集》），但由于身处战乱时期，未能出版面世，且手稿亦不知散落在何处了。祖父的古籍收藏颇丰，据父亲回忆，记得起书名的有：《十三经注疏》、《说文古籀》、《佩文韵府》、《春秋繁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周语》、《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管子》、《墨子》、《孙子》、《吴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文选》、《临海集》、《杜工部诗集》、《方望溪诗集》、《王右丞诗集》、《百香山诗集》、《章氏遗书》、《饮冰室文集》等一大批线装古籍。祖父为了向党和政府表示自己的赤诚之心，将这些宝贵的收藏连同书橱一起都捐献出去了，一本也没有留下。

祖父的一生跌宕起伏，命运多舛。但我以为，他的一生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比如说，祖父的求学经历就堪称楷模。由于家境贫寒，尽管天资聪明，但要靠自身一己之力，读完大学实属不易。又比如他的治学，由于一生当中经常处于战乱和动乱年代，加上晚年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大大抑制了他聪明才智的施展和发挥，但毋庸置疑，他还是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教育培养了四个子女（其中有两个大学教授，且均入选义乌名人录）；他参与创办义乌中学并从事教育数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作为民国以来研究长城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和创见至今仍为中国长城研究学界所推崇和肯定；他的画作，他的未经面世的文学著作和诗集，也给我们这些后代子孙留下了精神财富。

往事如烟，祖父离开我们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是：时过境迁，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社会，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定幸福。当年东河中学的那些红卫兵现如今也应该是年过花甲了，盼望着你们也能与陈小鲁、宋彬彬等人一样，为“文革”中迫害老师的行为道个歉，这也是还历史债的一种善举啊！

①《义乌文史资料（第一辑）》刘文革，“二十世纪前期义乌教育概况的回忆”。

②《义乌人大志》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③《义乌政协志》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届委员会”。



# 后宅风景旅游开发前景看好

——净居寺、西岗寺、乌龙殿一日游有感

骆族法

11月28日，天空晴朗，我们几人步行完成了从净居寺到西岗寺、到乌龙殿的旅游，感到这是极佳的既适合团队也适合散客，更适合家庭的一日游线路，从这一天的游玩也深深感受到后宅风景旅游的无限前程。

## 一

上午九点半，我们到达净居寺。净居寺已经面貌一新，完全不是我十多年前到过的那个模样了。这个寺从2004年开始按照总体规划除天王殿和厢房未建外，其他七个大殿都已基本建成，真是气势雄伟，排列有序，装饰考究，使人耳目一新。在捐款碑上有二行条幅：“净居宝地坐镇华夏第一财神，乌伤俊主缔就世界最大商埠”，既准确地表述了义乌人民创造华夏第一市的丰功伟绩，也表达了全市人民要继续站在改革发展前列的坚强决心。大雄宝殿内部正在抓紧施工，其余项目也在筹建之中。我相信，这个景点全部建成后，一定会成为义乌朝拜、观光旅游的一大胜地，不会辜负唐朝就始建的这座古刹的盛名。

## 二

我们沿着石板路向前行上山，石板路在密林中蜿蜒上升，不久到了山脊，沿山脊远远看去石板路似乎通到天边，在那石板路的尽头，也就是那最高的山峰之巅，矗立着一座崭新的亭子，像一把指向天空的宝剑在灿烂的阳光闪闪发光。看着通向天空一样的台阶，我们没

有望而生畏，而是奋力向前，终于上到了宽广的平台，站到了光亮的亭子面前。举目四望，真是一览众山小，极目义天舒啊！在平台上向东看，义乌主城区、国际商贸城、荷叶塘、苏溪镇尽收眼底，向远看廿三里、东阳依稀可见；向南看后宅、北苑一览无余，稠江、城西依次远去；向西看，已基本建成的高铁线路宏伟壮观，永宁塔与亭子高程相当，遥相呼应，塔身宛如银装素裹的金刚，昂首挺立；向北看青山水库正在施工的大坝清晰可见，再远处山峦连绵一直到浦江、诸暨……这真是一个绝佳的义乌观景台，我相信所有人一旦登上这座山峰，一定会感到心旷神怡，一定会有恨来晚之感；在广阔无限的大自然面前，一定会感到个人的渺小；而一旦放眼四望，看到繁华的都市、雄伟的建筑群，也一定会感到由众多人组成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在这里你似乎会感到，只要跳一跳就可以碰到天空；有云的天气，你也可以在云海中遨游。我们看到这个亭子还没有名字，纷纷要给它起名；如观天亭、望天亭、摩天亭、通天亭、全景亭、观景台等。我认为还是建议用通天亭或观景台比较合适。两边柱上可用对联“慈航载福驶五洲，创新硕果通天庭”，寓意是：义乌市场通向全球，造福世界人民；国家级试点的成果将惠及全国。

## 三

离开通天亭下山，一样是整齐的石板路。我非常敬佩后宅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和工程建设的同志。他们把石

板路设计和建设得如此完美，如此人性化，可走可坐可观赏，图案不断变化，中间还嵌镶着整齐的大小相当的各种花纹的鹅卵石，即使不看周围的风光，光欣赏脚下的台阶就十分赏心悦目了。我们穿行在深山密林中，周围似乎都还是原始森林，枯枝落叶散发出一种原始森林特有的香味。在这里行走，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有如世外桃源，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天然氧吧。虽然沿途都是浓密的树林，但隔段路都建有石板凳，随时可坐下休息。我到过全国许多森林景区，但很少有看到如此完美的林间道路，由此可见建设者的独具匠心。

在密林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眼前突然开朗起来，原来已经到了那巍然屹立在犁壁山峰上的永宁塔脚下，登上塔的最高层，放眼四看，又是一番景致：真是群山连绵不断，翠绿中点缀着红、黄；村、镇星罗棋布，繁华而不零乱，山青水秀，景色蔚然壮观，只有站在这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境！

离开永宁塔后，很快就到了西崮寺。十五年前在市政协工作时，我到后宅风景旅游考察时曾到过这里，这个景点的面貌已完全今非昔比。从后余村过来的上山公路，当时正在建，现在比原来建时宽多了，铺了锃亮的柏油，陡坡方向已有护栏，寺前两旁已建成了二座庄严雄伟的建筑，寺后的观音殿已经结顶，东侧顺着山坡建造的二个放生池互相连通，造型高雅别致；东侧山峰上的永宁塔像金刚一样，似乎保护着这些建筑群，又镇守着这片乐土的安宁。寺后的山坡上还建有一些亭子。

寺东侧的龙王财神庙大门两旁的对联是：“普天之下均是法喜乐土，五洲四海皆为兄弟姐妹。”这不正是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照片吗！寺西侧的中天玉皇殿大门两侧的对联是：“人在红尘不著尘垢如莲华，身居世间潜心修习向净土。”这也是儒释道三家对于修身养性、严以律己的要求。已经结顶正在装修中的观音殿大门两侧将要用的一幅对联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永世垂范，向和向上崇德崇善万众奉行。”上联是对观世音菩萨的颂扬，下联则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时的讲话精神，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 四

离开西崮寺，按照指示牌沿着石板路向北下山，向乌龙殿行进。又进入密林之中，呼吸着无比纯净的空气，人格格外舒畅，真是天然的绿色生态休闲地，途中不时碰见上来的游客。经过下山、谷底、上山这样一个“V”字

型的路程后，我们突然被正在施工中的青山水库大坝挡住了去路，石板路也被大坝上的泥、石掩埋，已到这里只能前进，无法后退。我们手、脚并用，爬上了陡峭的大坝，越过荒废的溢洪道，终于看到了修在水库边的经过防腐处理的木头栈道，经过栈道又是上山的石板路，不久看到了一个亭子，这时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亭上有三副对联，其中两副为：“遇事常以忍为高，能忍自安少计较”；“诚圆灵如在，盖世众欢腾”。亭子没有名字，我们建议是否可以叫“众欢亭”。沿着由两边整齐排列着树木护栅的石板路行走，如走在林中走廊里，很快看到了由著名书法家许文巨先生题名的“子孙亭”，原来已经来到了宋朝始建的乌龙殿。乌龙殿位于首岩山的一个雄伟的山谷顶部，两旁山上树木高矗，青翠欲滴，山谷朝南延伸出去，有如一条长龙，两边风景优美。大殿下方传出轰鸣的机器声，说明还在扩建中。山门殿顶上书写着“国泰民安”四个大字，两旁的一副对联是“黄蘗胜地藏龙卧虎梁代江淹曾至，首岩美景山青水秀宋朝陆游到此”，说明黄蘗山脉和首岩山在古代早已名声远扬，江淹、陆游等名人均到过此地。山门殿前已建好宽敞的停车场，停车场尽头座落着一座巨大的九龙碑，其造型的美观、雕工的精巧，使我们赞叹不已。往下走，在下山公路的左侧整齐地排列着深绿的桂花树，绵延几里路，直到马交塘村，与两旁山上的青松翠竹遥相呼应，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五

离开乌龙殿景点，已经是下午二点半。短短几个小时的游程，我们感触甚深：既游览了众多景点的名胜，感悟了其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又饱赏了大自然的优美风景，和煦的日光浴和密林中的氧吧滋润了我们的身心；既感受到了后宅街道对旅游开发的重视和支持，更感受到当地和各地群众对开发的热情和鼎力资助，从而更感到后宅风景旅游前程无限！

据查阅有关资料，1998年，义乌市人民政府以义政〔1998〕79号文件下达了“关于德胜岩风景区规划的批复”，批复中明确“一、同意你办（市旅游开发管理办公室）的规划，即德胜岩风景区规划面积19平方公里，分稠岩古胜、虎山瀑布、德胜田园、黄蘗山四个景区。”其中黄蘗山景区包括净居寺、西崮寺、永宁塔（当时未取名）、乌龙殿等景点。二、该风景区定位为市级风景区，由后宅镇政府统一开发管理。近几年，黄蘗山景区的开发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景区未全部建成，但游客已经络绎不绝，民间捐助也接连不断。我们在一日游中陆陆续续碰到上山、下山的游客，不过以外地人居（下转第19页）

写在前面：

去年四季度，经义乌市委书记提议，并经金华市委书记办公会同意，以义乌市政协主席宋英豪为团长的佛教考察团前往台湾。笔者作为考察团的一员，因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加之社会兼职多，国内外走了不少地方，但任何一次出行都没有这次台湾之行让人感触这么深，感慨这么多，说给我一次心灵的洗涤也不为过。短短六天时间，深深地被这里的佛教文化所吸引、所感染、所震撼。

## 走下神坛的佛教（外两篇）

吴潮海

在台湾，佛教仍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刚抵岛，台湾当地人就给我们介绍，台湾有“三多”，其中之一就是寺庙多。据民国 89 年（2000 年）台湾“内政部”公布的数字，全岛佛教寺庙达 4010 座，僧侣 9304 人，信徒 367.5 万人；而如今，仅仅过了 10 几年，佛教信徒增加了近 200 万，已达 548.6 万人，占全岛人口 2300 万的 23.9%，也就是说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都是佛教徒。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诗句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我们在台湾逗留期间，时值深秋，收获殆尽的田野，旷远坦荡，但这种梦境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如把台湾岛号称为“佛教博物馆”，一点也不为过。这里不仅寺庙遍布全岛，真可谓是“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而且寺、庙、庵、堂、坛、祠、轩、阁、厅、院、府、社、洞等应有尽有。

台湾的佛教，大多浓缩在建筑中，而不是写在典籍里。当我们来到考察的首站，看到历经 3 年规划，7 年建筑的中台禅寺时，感到惊诧不已，其体量之大，工艺之精，设施之全，让人惊叹弗如。该寺占地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主建筑标高 108 米，不仅恢宏大气，而且精美绝伦。寺内安装有多层电梯和先进的通讯设备，与传统禅



中台禅寺

寺截然不同。据称这是全世界最大、最现代化的禅寺。正由于传统佛教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曾获得 2002 年“台湾建筑奖”和 2003 年“国际灯光设计卓越奖”。中台禅寺可同时容纳 2000 名僧尼和 1000 名居士在此居住修行，再加上大量的志愿者和信徒。每天在这里用素斋的有上万人。这么庞大的寺庙，居然管理得井然有序。更意料不到的是，中台禅寺在台湾岛内及全球其他地区还分别设有 40 多家、90 多家精舍，所有这些分支机构的佛事活动和人、财、物均由总部统一管理。

类似于中台禅寺这么大规模的，在台湾还有慈济功德会、佛光山、法鼓山，号称为“四大佛教山头”。

与传统佛教不同的是，除了建筑设施的创新，还有弘法理念的提升。如佛光山弘扬“给人信心、给人喜欢、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教风；慈济功德会创始人证严法师倡导佛教要入世，“菩萨人间化，人间菩萨化”；北部的法鼓山为贴近现代人的社会需求，则极力推动“四安运动”，即安身、安心、安家、安业。佛教精神的人间化、生活化，不仅有利伦理道德教育，而且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宗教信仰从“庇佑”心理向精神慰藉、精神需求层面转换的趋势，譬如在佛光山寺院，不同层次社会人士都能在这里得到教育。在少年儿童活动室，灌输的是“三好”思想：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喜闻乐见的一些民俗活动的开展，更能够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如

在佛陀纪念馆可举办“倡化婚礼”、“弥月之喜”、“成佛之礼”、“菩提眷属”、“寿诞之礼”等活动。

从神坛走下的佛教，台湾几家佛教巨头其弘法理念大同小异。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深受其师印顺法师“人间佛教”的影响，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而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也是倡导“生活佛教”、“人间佛教”。为朝这一目标努力，在开山建寺之余，致力于僧才培养，接引知识青年学佛的同时，还针对多元、多变的社会现实，推行佛教“学术化、教育化、艺术化、科学化、生活化”，修行者除了研习佛法，还要广泛涉猎科学知识。同时，对社会福利、电视弘法、群众教化等，更是不遗余力。如今，他们“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为宗旨，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化”为理念，大兴教育、大办医院，积极参与公共文化事业，现佛光山拥有大学 4 所、佛学院 12 所、图书馆 20 多所、美术馆 9 所；中台禅寺也先后创办了国小、国中、高中，从而形成了“三学一贯”的办学模式，大力培养各类人才服务社会。

把佛教哲理的深度，佛教历史的厚度与现代多元文化的广度有机结合，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为佛教人间化、生活化提供了空前的活力，这就是走下神坛的台湾佛教的现状。

## 善举何以盛行

走进台湾寺庙，总会遇到不少让人感动的普通人，他们怀抱“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梦想，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默默耕耘。他们的选择与作为，自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生活会少很多精彩，台湾的寺庙也不可能平添这一股人文魅力。

在这些人当中，慈济功德会主持者证严法师是位杰出代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几乎是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同一时期，证严带领 30 多位妇女，每人每天从购菜款中节约 5 角钱，并动员每人每天多做一双婴孩鞋，将所售款存入竹筒，作为慈善基金，旨在“在黑夜里面点一盏灯，在寒冬中生一堆火”。

证严法师提出的“普天三无”理念，即“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

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深受台湾各界推崇。遵循这一理念，慈济基金会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国度。凡是需要帮助和救助的，他们都尽己所能。包括 1999 年台湾“921 地震”、2008 年大陆汶川大地震，以及东南亚海啸、日本福岛核泄漏等。

为了救济伤病员，慈济功德会自己办医院；为了关爱伤病员，慈济功德会自己办护士学校；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救济伤病员，慈济功德会建有直升飞机平台。

证严法师虽是一位普通的弱女子，但在台湾却是一个诠释爱心的符号，一股扶贫济困的力量。台湾花莲地震后，需重建 51 所学校，重建的学校要求是国际一流的，每所学校重建费都要数以亿计台币。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证严法师主动请缨。这时，不要说政府，就是她周边的法师、慈善会董事、志工、信徒都面面相觑，

觉得重建资金数额太大，难以筹集。面对大家的疑虑，她掷地有声地说出了八个字：“信己无私，信人有爱！”

实践证明，这种正能量很快得到社会的响应，爱心、善举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帮一点”、“助一点”在台湾溶化成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精神风尚，在她的影响力下，不仅重建了51所世界一流学校，而且还帮助每一所学校编纂了校史。

爱人者，人恒爱之；助人者，人恒效之。如今，慈济基金会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每年募集的资金近200亿新台币；慈济功德会有数千名慈济委员与荣誉董事、1000多万会员。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包括我们义乌，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00多个办事处，在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从事赈灾和扶贫工作。

我们义乌，理应说是一个相对发达地区，但在慈济功德会展示馆中，居然给我们看了三张在后宅、下骆宅、慈溪开展扶助孤寡老人、赈灾的从事公益活动照片，可见涉及面之广。

在展示馆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位吕姓退休女教师，她虽不是专业讲解员而是一名志工，但在讲解中却显得从容淡定、举止大方、神态端庄。正由于她是通过体验式的内容介绍，因而特别讲得生动，讲到动情处，时不时让听众潸然泪下。

她说，“救助不是施舍。诚如证严法师所时时提醒的，我们要以感恩之心去赈灾扶贫，因而，我们捐赠的物资，包括被褥、衣服、不仅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叠放得整整齐齐，在捐赠时总是以90度鞠躬姿势以尊重对方。”她看到我们迷惑不解，又继续说，“捐赠不是施舍，捐赠方与受助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您报答这份爱，就要传递之，让它在每个人的手中延续。”“一个社会即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链条，不论哪一个环节断开，都将影响整体链条的运转，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有了社会整体的共存，才可能有完善的个体生存。助人也是助己，善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受助者在物质上得到了教授，助人者在心灵里得到了净化，得到了慰藉。因此，以感恩的心态，回报给了你财富的社会，当在情理之中。”

当然，慈济的慈善事业做得这么大，是与证严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的。她对善款不仅严格管理，而且绝不乱花一分一厘，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要求志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慈济精舍在她的引领下，一直践行“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证严法师及其弟子终身不受供养，以自己的劳作维持生活，不私占一分善款，坚持清清白白做慈善。正由于这样，使慈济在台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公信力和公认度，慈善募捐能力总是力拔头筹。

到台湾虽然是来去匆匆，但给我的感受是，不仅是慈济精舍，在这里的每一处佛教场所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使台岛佛教美的表里，又富有人文和禅意。

如此可见，在台湾，善举何以盛行？因为在这里普遍认为：只要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修身践言，就会使善明和谐见，花含春意无限艳。



证严法师



慈济精舍



## 把心中的爱放大

把心中的爱放大。如今的台湾佛教界，已将环境保护与慈善事业相提并论，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认真对待。他们向全社会呼吁：“善待地球就是善待生命”“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这一口号振聋发聩。

台湾佛教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既是正面引导结果，又是反面教训使然。佛教禅意告诉我们：人类本来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自然生态与人类的活动休戚与共，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尤其是以尊崇万物敬天礼地的佛教徒，对大自然的依恋之情与生俱来，如同赤子对孕育了自己生命之躯的母亲一般，皈依山林，忘情山水。然而，曾几何时，“文明”的人们要冲破母亲的束缚，踢打出自己的天地，文明进步的同时，不经意间弄脏了母亲的身躯，毁坏了家园。如1986年，在台南市和高雄市的界河——二仁溪畔发生了一件憾事：溪两岸堆积着从美国进口和岛内收集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后将废弃物进行焚烧，结果空气中产生二恶英，地底下遭受重金属污染，未经处理的废酸液排放到二仁溪，导致牡蛎等水产品变绿。“绿牡蛎事件”引起全岛震撼。虽然壮士断腕，重膀出击，强制拆除50多家五金工厂，但光清除25万吨电子废弃物需花费20亿新台币，遑论河川复育，而当年熔炼废五金产值不到20亿新台币，教训可谓不深刻。

为此，慈济功德会提出：请举起鼓掌的双手来拯救地球。慈济基金会宗旨则从最初的募款救济逐步衍生为“一步八法印”，其中就有环境保护。创建于1989年的法鼓山佛教山城，在提倡“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同时，极力推动“四环运动”，即自然环保、生活环保、心灵环保、礼仪环保。佛教界提出的“人间净土”、“心灵环境”等号召，对台湾环境保护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今，无论是社区、学校，还是社会组织、宗教团体，都成了推动环保急先锋。

当然，作为环保的重要力量，台湾佛教界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身体力行。如今在台湾寺庙，不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而且杜绝香烛。为了做好垃圾处理，20多年前，慈济就在全台各县市乡镇小区设置回收站，

大力推动垃圾分类及资源回收工作。如今慈济已在全台建立5000多个回收站，更难能可贵的是，回收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他们“欢喜做，甘愿受”，为环保默默奉献心力。

资源再回收，垃圾变黄金。还是那位讲解员吕老师介绍得好：“据你们大陆测算，每人每天节约一张纸，全国每年可少砍18万棵树。而据我们测算，每回收一吨纸，能少砍20棵树。再加之我们循环经济做得好，能把废塑料、可乐瓶回收后，还原成塑料颗粒，利用塑料颗粒又可制作内衣、高级毛毯等纺织品。”稍停，她又说：“捡破烂，在台湾根本不是低级劳动，弯下腰捡废纸、捡可乐瓶的，说不定是个身价几亿、几十亿的董事长、总经理，大家都觉得为拯救地球出钱出力无尚光荣。”

由于环保意识加强，如今在台湾不仅注重资源回收，而且做得十分精细。“扯得破的是OPP（邻苯基苯酚）、有弹性的是PP（聚丙烯），无光泽的是PE（聚乙烯）……”慈济台北市八德回收站的资深志工萧秀珠边念着口诀，边利索地将回收资源分类。她说，只有上游做得好，下游回收再生产才能省工、省能源，如报纸、书籍，如能按油墨多寡材质细分类，生产再生纸就尽可能少用漂白剂。

倡导绿色生活模式，减少过量耗用资源，以及改变乱扔垃圾等陋习，不仅需要公权力的规范与引导，也需要社会教育。在台湾，佛教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环保宣导角色，在一些重大节庆活动，“很多慈济环保志工就趁着人潮聚集的机会，进行一场场生活环保教育课，志工们或举牌宣传，或做分类示范……”

地球是我的，也是你的，让我们向台湾佛教界学习，把心中的爱放大，举起鼓掌的双手，一起来保护地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明天：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

李邦林

## 佛堂老城区内的“塘”

就佛堂周边各村的门口塘不说，在老城区古旧的老屋群中，就有过几口比较大的水塘，有的如今依然还在，有的却因各种原因被填埋了。不知底细的人，根本不知道在某个地段会是祖先们当年日常洗涤的地方，时间把古镇的有些印象冲刷得缥缈无踪，也把老人们童年的记忆变得异常清晰。

解放初的佛堂分为六个“村”，即民主村（现老市基村一带）、经建村（现新市基村一带）、解放村（现王蒲潭村一带）、和平村（现竹园村）、联合村（现下市村）、共和村（现吴溪叶、小吴溪村）。

现存的几口水塘分别是，竹园村的上塘和下塘；新市基村的新屋里塘；头甲村的后秧田塘（季村下市、双塘李宅，东王小吴溪，湖山枸树脚等村不计在内）。

在留轩学堂内有一口精致的水塘，也可叫水池，方形的池壁，罗马柱的池栏，结实的池柱，池边栽种着垂柳和刺柏，树下安放着几条石凳，学童们可以开心安全地在池边玩耍和戏闹。公社化时期拆除了留轩学堂的前门，拆填了水池，在那一块拆除的场地上建造了公社大会堂。给如今的留轩学堂留下一个残缺。

厠塘：在原新市基雨台旁，水质不好，有些脏，但并不是用来倾倒粪便的，那时候的粪便特别宝贵，是农户最稀缺的农家肥料，有人在街弄的暗处放上只尿桶专门收集过往行人的小便，路边的狗粪也有人拾。佛堂医院迁址后，该地块实行改造，国有土地出让，塘址被填，现在农商银行与新华书店的位置。

荷花塘：在头甲村后秧田塘不远处，荷花塘路边，离建设路很近，塘中并没有想象中的荷花，只长满革命草与水葫芦，长期无人清理，无节制地往里面倾倒建筑垃圾，最终填没，现成为一块空地。

在建设路义乌皮件厂与机械厂地段当年还是一片菜地的年月，那里也有二口水塘，征地后留在那里也没用，

填了。

古镇居民区内的水塘水池的形成，有的是在原本低洼地块有意保留的，有的是根据建筑的需要新挖掘而成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水质而言，这些水塘里的水都不是人们的饮用水，他们平时只用它来洗洗衣服，收工回来了，在简陋的埠头上洗去手脚上的泥巴，擦洗一下汗渍的脊背，清除农具工具上的污秽。当年人们的饮用水都是从义乌江和蒲川溪，或者是在为数不多的水井里汲取的。这些水塘最主要的功用是提供消防用水。古镇里是一大片木结构的房屋，用火稍有不慎，就会火烧连城，那时候还没有高压水枪，更没有身怀绝技的消防队员，每个村只有一间“水龙屋”，存放着民间最普通也是最原始的灭火专用工具——水龙，几支小功率的青铜水枪，几只提水用的藤篮。远水救不了近火，一旦发生了火灾，大街小巷的铜锣一敲，人们就把这些消防工具火速抬到现场，用这些水塘里的水靠众人的力量把火熄灭。实际上，在防火的工作中先民们是一直认真地做过许多预案的，在老街的上街、中街、下街适当的地方都用“三和土”构筑了一人高的太平池，蓄满太平水；一些大户人家的厅堂（如吴棋记民居、留轩民居、张三茂民居，留耕堂……）都在天井的位置上建起两个对称的蓄水池，也有的安放两只大花缸，养上几只金鱼，摆几盆梅兰竹菊，既古朴优雅，必要时又是最便捷的消防用水了。屋与屋之间隔着一堵风火墙（马头墙），一派徽式风格。更夫巡呼时也把“小心火烛”“当心门户”当作一项最主要的提醒，可见人们在防火中是用足了心思的。

佛堂古镇里这些水塘里的水，并不象毛店、尚阳、赤岸、田心、倍磊等古村落有一泓活水从村中潺潺流过，它完全是依靠雨水集聚而来的，雨水过多时，会通过排水口排出，可奇怪的是，即使是大旱之年，这些塘水也不会干涸。象一个忠实的仆人，温顺而依恋地陪守着一代又一代古镇人。

蒋英富  
朱履生

## 商城红绿灯的变迁

红绿灯是市民熟悉不过的事物，它的变迁见证了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

1982年，我市城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系小、乱、散的小城镇规模。车站路、新马路、县前街、北门街、朱店街等屈指可数的几条城区道路又弯又窄，根本没有什么交通信号设施。交通管理人员吹着哨子，挥着红色、绿色的布旗指挥交通，就相当于现在的红绿灯。那时，境内除省道、县道部分路段设有交通标志和道路中间线之外，城区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寥寥无几。1987年9月，原义乌酒厂门前的十字路口装起了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盏交通红绿灯，交警在红绿灯下执勤，配以铁皮卷筒喇叭呼喊，指挥行人注意安全。第一盏红绿灯设施比较原始，就是在红绿灯的底座上配上电闸，管理人员不断地操作倒、顺开关以控制各方向的灯光转换。1988年撤县建市后，义乌城区拓展了原名城东路（现城中中路一段），改造了南门街、新马路，交通安全设施也逐步完善。

1994年5月，在南门街与城中路交叉口设置了由红黄绿三种颜色组成的交通信号灯。这一组红绿灯的出现，成为当时义乌轰动一时的新闻。

2002年，义乌市的机动车拥有量已达10.1万辆，小汽车进入快速增长期（每年万辆），且第三代、第四代市场都集中在城中路和稠州路之间，城区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日益严重。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市里召集各有关部门人员调研，根据辖区道路的车、人流和通行时段等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疏堵的措施。其中，在城中路和篁园路口安装经厂家特意改进的“智能化红绿灯”，有效解决了城中路的交通“瓶颈”状况，这是我市第一组智能化红绿灯，至今还默默地发挥着“解堵”的巨大作用。

1998年以前，义乌城区的红绿灯一般是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交通信号灯，路口也没有什么监控设备，三轮卡、拖拉机在市场边转悠，偏僻处的行道树上还栓着拉粪便的牛车。随着我市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规模的日新月异，机动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原有的“圆型红绿灯”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道路和车流量的需要。自2002年开始“圆型红绿灯”逐步改换“箭头灯”。如今我市城区面积已达100多平方公里，交通设施先进齐全。红绿灯也随着鸟枪换炮，什么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信号灯、人行横道信号灯、车道信号灯、方向指示信号灯、闪光警告信号灯遍布大街小巷，连停电时也有移动式太阳能红绿灯。在西城路的交警大队门口，还有被称为“

聪明红绿灯”的触摸式红绿灯，行人要过街，只需用拇指摁一下路旁信号灯灯柱的按钮，行人过街的红灯随即变成绿灯，机动车道的绿灯则变成红灯，行人就可以安全通过了。

在江东路与学院路、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建设了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连红绿灯也“下岗”了，行人和机动车更加方便快捷方便了。据统计，截止2013年3月，我市交通管理部门在全市城乡道路路口安装了405组交通信号灯，形成了“前有红绿灯、上有监控、下有交警”的立体交通管理网。



1995年的红绿灯

# 殷殷嘱托寄厚望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

3月4日下午，市政府专题听取义乌丛书编纂工作汇报，丛书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就工作进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自2008年8月市委、市政府下发《义乌丛书》编纂总体方案以来，工作进展顺利，截止2013年底，已经出版发行24部，完成古籍影印26种，单是2012年付梓出版的超千万字，其中《义乌敲糖帮——口述访谈与历史调查》荣获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送入出版社审稿的还有12部，2014年计划出版有16部。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同时也为了回笼资金，一边在媒体上刊登知识竞赛题，开展读志用志活动，一边在文博会上设立窗口进行宣传促销，同时在新华书店等处设点，一年来销售额达40多万元，全额上交财政。

听取汇报后，王迎副市长对丛书编纂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要求：《义乌丛书》是流传千古的重大文化工程，修史辑志，不朽之事，时间要服从质量，但也要抓进度，对一些行动迟缓，屡催仍无见效的，市政府或市府办可帮助督查。（毅志）

## 简 讯

▲市政协台湾佛教文化考察团会见同乡会代表时，宋英豪主席给在台的义乌乡亲赠送了由市志（丛书）编辑部编的《义乌墨韵》、《历代名人咏义乌》、《义乌旧影》、《傅大士研究》、《傅大士评传》等书籍，既节俭，又高雅，且深受同乡欢迎。

▲由义乌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主办的《义乌知联》，对《义乌市志》、《义乌丛书》予以重点推介：“《义乌市志》成功出版发行，不仅是二轮修志试点的重要成果，也是义乌人文化自觉的体现。”从已经出版的《义乌丛书》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义乌人内涵丰富醇厚的过往岁月，也可以见证义乌文化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朝实景。”

▲为尽快融入党中央打造新丝绸之路战略新举措，市政协组织专人前往陕西、甘肃一带考察。日前，根据修编《义乌市志》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史料，写成《从丝绸发祥地到丝路新起点》一文，以整版篇幅在《义乌商报》发表，这是读志用志的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关于我省“最美现象”的重要批示精神，在全省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最美”人物热潮，使最美从“盆景”变为“风景”，全省地方志系统评出了何保华等9名“最美方志人”。

▲2013年秋，天津杨氏后裔杨诒申与族弟四五人来到义乌寻根。

上世纪八十年代，天津杨家老宅院翻盖房屋，在墙的夹层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册《杨氏族谱》，谱中写道：“杨发时，浙江金华府义乌县减村人，康熙年间率子北上，初占籍天津府静海县木厂庄（现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木厂）。南开中学校史上的第二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南开中学校长杨坚白（杨诒申之父），卸任前曾到老家木厂和族人团聚，他和大家说最迫切的心愿是：“我们始祖的老家在浙江义乌，一定去找到始祖的家乡”。

在义乌寻根问祖的四五天里，经过多方查询，族谱中提到的“减村”，在义乌现有的杨氏聚居地中找不到对应的村名和谱牒依据。可能是音误、改名，抑或是几百年的历史风尘已经把村庄淹没？寻根之行未能如愿，但在先祖生活过的这片热土上，他们经受到了太多的感动，有那么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并愿意继续帮助他们完成夙愿。

日前，在各方人士共同努力下，寻根已有了眉目，其杨氏的先祖很有可能在义亭镇的视畴村，那里是一个杨姓大村，其宗谱里有记载说，清康熙初年，本村有父子三人迁居天津，是投奔兄长去的，尽管一些枝节还有些偏差，但整个事件的情节还是能够吻合的。

（陈江彬 李邦林）